



岁月留声

激情年代的中山奋斗故事

谢长贵 邱霖巧 主编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岁月留声

激情年代的中山奋斗故事

谢长贵 邱霖巧 主编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留声：激情年代的中山奋斗故事 /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98-3968-3

I . ①岁… II . ①中… III .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8090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佳音
复 审：潘 鹏
终 审：李青建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高明领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5mm×265mm 1/16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10.2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968-3

定 价：25.00 元

CONTENTS

目 录



- 001 忆谭桂明工作点滴 / 林克
- 003 延伸阅读：中山人民的好书记谭桂明
——纪念谭桂明诞辰 100 周年 / 麦文东
- 010 关于中山最早制作的五星红旗之考 / 方晓
- 013 延伸阅读：山坑里的“天文台”
/ 原“天文台”全体同志
- 016 接管城市工作的回忆 / 林克
- 021 延伸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的接管及政权建设工作
- 026 中山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 / 邱霖巧
- 029 延伸阅读：解放初中山县城乡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
- 032 往昔趣事 / 陈鞞
- 038 延伸阅读：在《战斗里成长》中连升“八级” / 王弦
- 041 中山碾米机和糖厂的搬迁 / 司徒洪
- 042 延伸阅读：解放前中山米机业的发展及其经营
/ 黄桂波 伍允成 黄栈等
- 04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山工人活动 / 孙子仁
- 050 延伸阅读：难忘文化宫欢欣岁月 / 陈慧
- 054 军管时期的船车管理处 / 关哲
- 056 延伸阅读：解放前广州石岐线的航务 / 卢坤 洪奇
- 059 中山人民医院首例外科手术 / 杨悦生
- 061 延伸阅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事业的进步
- 063 战斗在筹粮支前中 / 司徒洪
- 066 延伸阅读：筹粮工作片段 / 关震光
- 068 三角乡的筹粮工作 / 周森
- 070 延伸阅读：超额完成借粮支前任务 / 区英伟
- 074 解放初期港口乡支前剿匪恢复生产杂忆 / 李浩
- 079 延伸阅读：“同兴渡”事件 / 李泽林

CONTENTS

目 录



激情年代的
中山奋斗故事

- 081 破抢枪越狱案记 / 司徒洪
- 084 延伸阅读：从围剿变救援——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 / 司徒洪
- 087 中山土改杂忆 / 罗章有
- 093 延伸阅读：张家边八字运动的点滴回忆 / 陈惠仁
- 095 群胜乡的土改运动 / 冯永
- 100 延伸阅读：土改中的一项廉政举措 / 张汉文
- 102 一段难忘的经历 / 王树平
- 105 延伸阅读：依靠农会，在珠三角完成征借军粮的任务 / 梁平
- 108 毛泽东赞扬的中山青年突击队 / 刘廷玉
- 113 延伸阅读：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亲历亲见亲闻回顾 / 凌志坤
- 118 雨夜下乡记 / 张仕伦
- 120 延伸阅读：群策群力，消灭“望天田”——1958 年大鳌溪社兴修水利情况 / 李杰生
- 123 东风镇的由来 / 谢沛
- 125 延伸阅读：游走东风
- 127 圣狮启示录 / 刘廷玉
- 133 延伸阅读：浅谈 50 多年前圣狮集体经济的发展 / 邱霖巧
- 137 中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冯永 方宁
- 142 延伸阅读：我的致富经 / 黄新文
- 144 孙中山故居那些年的名人轶事 / 李伯新
- 149 延伸阅读：孙中山故居
- 150 霍英东与中山温泉宾馆 / 李斌
- 154 延伸阅读：霍英东谈中山温泉宾馆 / 霍英东
- 156 后记

忆谭桂明工作点滴

□林克

中山解放初期，我们入城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接收的交通工具仅有一部小汽车和一艘电船。小汽车因县领导没有使用，后来上交给了珠江专署。电船则用以支援部队解放沿海岛屿。接管拱北海关时接收的“客加路”单车 12 辆，就成了我们军管会、县政府各部门的交通工具。当时我在县政府建设科当科长，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有机会跟县长谭桂明一起下乡工作，桂明、保卫员和我 3 人就是各骑一辆单车。桂明骑单车很熟练，而我则较生疏，骑在崎岖的小道上，我往往跟不上他们。有一次我一个急刹车，竟然从车上飞了出去，然后赶快回转身来翻身上车，急赶上去。几十年来，此情此景一直是我难忘的有趣回忆。

1950 年 11 月底至 1951 年 3 月，县政府组织工作队到各区开展征粮减税工作。我所在的工作组负责五区的“征减”工作，谭桂明亲任组长，我为副组长。珠江专署派周挺带了工作队和我们一起工作，工作队共 21 人。此时，“八字运动”正在开展。因此，到五区后，区委决定成立上五区临时工委，由我和周挺负责，以三乡、崇正两个乡为主，兼顾东桂、五岳两乡。我驻三乡，桂明是县长，要照顾县的工作，虽不常驻点，但常来听取汇报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进点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我们在三乡组织了一次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上台控诉恶霸地主。减租退租工作进行顺利，征粮任务也完成了。

三乡工作是在桂明亲自领导下开展的。我在县政府工作也是由桂明具体领导的，在县政府还和他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在桂明的领导下，我们还对乡干、农干进行了摸底分析，了解到三乡干部的状况：乡长是解放前就靠拢我们的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工

作还可以，只是工作能力差些；有位搞文教工作的女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是团员；其余乡干中，有两个是中农，一个乡干受过公尝，有两个是父亲受过公尝的知识分子，有个像二流子，有个立场不稳，跟地主有联系，还有一个立场也不稳，曾暗中通知我们准备逮捕的一个坏分子逃跑（被我们迅速逮捕了）。可见乡干部队伍是不纯的，旧基层需要清理。农干只有少数是老老实实的贫雇农，如陈××是贫农，三乡工作后期我们就依靠他深入乌石四组，访问贫雇农，开贫雇农会，进行查组，登记户口，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使工作进展顺利。

桂明群众观点很强，工作注意依靠群众。在广中公路段的建设中，他是总指挥，我是副指挥。当时没有施工机械，就是在桂明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用土办法，凭双手建成了公路。

桂明爱护人才，关心干部，对我教育帮助很大。他在五桂山参加过我们训练班的整风，还给我们讲了课。1953年，中央决定技术干部归队，省里通知我和刘秉楷归队。桂明要求省里把我留下来，后来我还是要调走。离开中山前夕，桂明邀我和黄绮云到他家里去，请我们吃了一顿家常饭，鼓励我们，为我们饯行，款款深情令我难忘。

桂明调到省里工作后，由于长期艰苦工作，不幸患上肺癌，住进了广州中山医附属一院。我和黄绮云曾多次前往探望。最后一次探望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双腿瘙痒。他强忍苦痛，还关心着我，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他奇痒难当，问我可否用药膏涂擦，我说可以。看见他用药膏涂后感觉舒服些，我感到安慰，但心里难受，多好的一个领导，却要忍受这样的煎熬！最后我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没想到这竟然是生前见他的最后一面。

桂明为革命、为人民、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奋斗了一生。他南征北战，顽强战斗，光明磊落，意志坚强，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朴素，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活在我们中山人民的心中！

（选自《中山党史》2006年第1期）

延伸阅读

中山人民的好书记谭桂明

——纪念谭桂明诞辰 100 周年

□麦文东

003

今年是中山人民的好书记谭桂明诞辰 100 周年，虽然谭桂明离开人世 35 年了，但是，他为中山民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仍深深铭刻在中山人民心中，人们对他有说不尽的思念。

谭桂明是中山县崖口乡人，出生于上海，父亲是轮船工人。3 岁父亲去世后被送回崖口随叔父生活，后毕业于中山县立师范学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刻，谭桂明抛弃教师工作，毅然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亲自创建崖口党支部，发展一批中共党员。1938 年任中山县四区区委书记。1942 年 5 月后，历任中山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逸仙大队政治委员，挺进粤中主力大队政治委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第一、第三团政治委员、政治部秘书长，中共新（会）鹤（山）县委书记等职。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他坚持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注重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走狗，巩固发展以崖口为主的（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第四支队第三队政治教导员、两广纵队第三团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南下工作队队长。1949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策划下江南解放全中国，谭桂明被派回珠江三角洲工作，任中共珠江地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他在珠江地委领导下，策划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顺德、番禺独立团，为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珠江地区作

出重要的贡献。

1949年10月30日，谭桂明率领部队进驻石岐，中山宣告解放。早在10月中旬，中山县人民政府在长江乡成立，谭桂明当选为县长。随后11月，谭又被任命为中山县委书记。从此，谭桂明在中山工作整整7年。在这7年间，他和县委其他领导一道，带领全县人民为改变中山落后面貌，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为中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04

一、谋划中山国民经济的恢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新中国成立伊始，有的工商业者对新生人民政权抱有怀疑态度，纷纷结业卷资迁至港澳，导致工业停产、商业萧条、农田抛荒，金融物价波动，不少工人失业，许多农民缺少口粮、种子、耕牛、肥料。

在中山解放后的第7天，谭桂明在四强酒家（现孙文西路中山百货公司）召开会议，邀集各私营厂企行业工人200多人参加，宣传党的政策。进城后，县委领导首先和工人见面，体现中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极大鼓舞了广大工人恢复发展中山社会经济的信心。

在谭桂明的主持下，中山县委将恢复中山的国民经济，作为全县的工作重心。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结合中山的实际，制定相关措施，认真调整工商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重要行业实行委托加工、定货代销，以解决私营工业在原料来源、产品销路和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并有计划、有重点地组建国营企业，成立公私合营的广中车路公司，德兴、联生、达生、联和船务公司，以及邮电局、县贸易公司、珠江百货公司、县供销合作社，使国营企业逐步成为县工业基础。为了解决失业工人的生计问题，谭桂明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指示各级政府，组织失业工人进行市政建设，对老板弃走的厂房，由政府贷款，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活跃市场，扩大城乡交流，是促

进经济恢复的重要内容。1950年，在召开的全县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谭桂明反复强调搞好工场、市镇、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贯彻“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鼓励扶持私营商业发掘自身的财力物力开展联购、联营、联销，扩大城乡交流，活跃市场。

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谭桂明反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政策：保护农民土地财产不受侵犯，保证劳动权益，谁种谁收，保护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奖励开垦荒田，减租退押，调整公粮负担，对“大天二”（当时活跃在沙田地区的土匪）弃耕、地主逃亡而失耕的土地，“谁种谁收”，“不荒一亩田”，动员农民复耕。1950年春耕复耕5万多亩抛荒田地。同时，县政府发放了2万担（每担50公斤）农贷谷，解决农民开耕、肥料的困难。1951年春，又急贷种肥80万公斤、款项9753万元（旧人民币）、蔗贷7.5亿元。夏种贷出谷40.5万公斤、水利贷款1.4亿元和稻谷10万公斤。1947年和1949年两次大洪水中崩毁的堤围还未修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领导广大农民整修水利，谭桂明亲任县防洪委员会主任。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谭县长日夜奋战在工地上，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修复好崩溃的堤围，堵塞缺口339个，疏浚河流14条。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山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1950年11月，谭桂明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自5月份以后，全县工商业开始活跃，开业店户日渐增加，交通业和进出口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至1952年，全县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32.38%，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最高水平，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2.66%，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

二、推进各项建设的展开

1953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中山工业化，是谭桂明从小所追求的理想。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全国终于转上国

家工业化建设。谭桂明久已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着重抓了重点工业企业筹建，手工业恢复和水利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

中山是个传统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县委确定以工业建设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相应集中资金、人力，加快工业基础建设，以带动各城镇的发展。谭桂明亲力亲为，抓落实。其间，通过公私合营形式，先后建起制糖、食品、服装、印刷、农业机械、中成药、酱料、酒、印刷、造纸、造船等一批骨干企业，为中山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山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谭桂明十分重视手工业创新发展。当时个体手工业资金短缺，生产不太稳定。为了帮助个体手工业工作者摆脱生产困境，在谭桂明的主持下，县委决定通过集体合作化的形式，发展壮大手工业生产。至1955年，全县办起手工业合作社（组）160个，年产值达80多万元。这批社组后来都成为县重点企业。

对于水利建设，县委作出联围筑闸，疏通河道，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规划。1952年，谭桂明主持召开中顺大围建设会议，联合顺德，联建中顺大围，并担任大围建设指挥部政委。其间，全县兴起水利建设高潮，先后兴建中顺联围，筑起容高联围、中下南联围、三乡联围、横石联围、马新联围、丰阜湖联围、神湾联围等一批万亩以上联围，围堤长达84公里。

到1956年初谭桂明调离中山时，中山初步形成以食品、纺织、机械等为支柱行业的地方工业，1955年年产值达4973万元，比1949年增长136.13%。水利方面初步形成合力的堤围体系，为以后中山社会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稳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解放前有了明显改善，农村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耕畜、农具或劳动力不足，有少数农民生活仍然困难重重，有的甚至典让、出卖土地，靠当雇工和租种土地维持生活。1953年2

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号召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广大农民通过开展互助合作化，以自愿互利方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3年中，中山先后在四区、五区开展试点，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到年底，全县有10%左右的农户参加互助组，并办起十几个初级合作社。

1954年8月，中共华南分局召开广东省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全省到1955年2月要建立9000个合作社。时间紧，任务重，同时，有相当部分农民对组建合作社顾虑重重，有的农民不愿将自己的土地财产交给合作社。

根据这一情况，谭桂明提出以稳步前进的方针，统一农村干部思想，坚持合作化运动，保持稳妥发展的态势。他反复强调，要在当地农民原有的互助合作习惯基础上组织起来，强调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反对强迫命令。1954年10月，县委召开61个老社驻社干部会议，提出农业合作社运动要以“巩固为主，扩大为辅，扩大服从巩固”为方向，要以老带新，坚持群众自愿，反对强迫命令。1955年1月，县委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谭桂明号召全体干部深入基层，虚心学习，农业合作社分配要体现土地入股分红，按劳取酬的原则。由于这一时期，县委采取务实和稳妥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5.25%，入社农民心情舒畅，因而1955年的早造，互助组、合作社普遍增产。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谭桂明十分注意总结经验，组织人力编撰《中山县巩固农业合作社经验》小册子，发到区、乡干部，人手一册，对如何开展农业合作化提出许多有益的指导意见。1955年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了《中山县巩固农业合作社经验》小册子中所刊登的《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这两篇文章，并亲自写了按语。

四、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进城后，谭桂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县人民

政府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谭桂明和机关干部同桌吃饭，从不搞特殊。他经常轻车简从，骑着自行车下乡调查，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他对全县情况掌握得很具体，很全面，所布置的工作符合实际。有一次，他前往小榄镇检查工作，因天色太晚，又要赶回县城，临时包了一条小汽船，事后报销，财政科长说不符合制度，不能报销。谭桂明为此自掏腰包，并作了自我批评。1950年底，上级发来文件，要求彻底清理“小钱柜”。初时，县机关积存1亿多元（旧人民币，换算为新人民币1万多元），用作弥补制度外开支，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当主管同志向谭桂明请示时，他十分肯定地批示：“如数全部上交，分毫不留”。这充分体现了谭桂明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中共偏重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接二连三地开展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在这复杂的形势下，谭桂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对同志负责，对人民负责。

1951年4月，中共中央华南局决定“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进行土改”的方针。由于某些南下干部，不了解中山县民主革命时期的特点，将一批老党员视为“旧基层”“阶级异己分子”处理。其实，这批同志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由于斗争的需要，曾被党组织安排担任旧政府的乡长。当时谭桂明是县委副书记、县长、法院院长。每次开会讨论时，他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为这些被视为“旧基层”的同志辩护。他指出，这批同志在旧政府任乡长，是组织上的安排，他们以某些身份作掩护来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所在的乡政权实际上是“白皮红心”的。可是，谭桂明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当时县委主要领导采纳，在最后讨论一、三区区长袁世根案件时，谭桂明只好声明：“只要保留人头，给袁世根任何处分，我都同意”。但最终也未能使袁世根免于死。另外，谭桂明还在讨论对四区区长谢秉才，二、五区区委书记、区长刘达之给予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的处分时，也挺身而出极力加以辩护，但都未被采纳，以致这些同志仍被错误处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要记取这个教训。

解放初期，党内部分人出现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1949年5月，县委在五桂山举办知识分子和武装干部的学习班，谭桂明亲自讲课，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鼓励大家发挥作用，为建设新中山社会经济服务。部队进城后，在谭桂明的主持下，县委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委以重任，参加接管城市工作。谭桂明还亲自与这些同志谈心、交代任务，提出注意事项，勉励他们做好接收工作。1953年后，谭桂明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大家端正思想，全面贯彻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教育、团结、改造”政策，要认识到经济建设需要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在县委的统筹下，1953—1956年，中山提拔一批知识分子担任医院院长、学校校长、乡长职务，发展一批党员，还有45位知识分子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批人都为以后中山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6年2月，谭桂明调任中共佛山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同年，当选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赴京参加会议。1958年下半年，谭桂明兼任中山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正轰轰烈烈开展“大跃进”运动，上级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表彰高产先进县，要求各县上报产量。当时不少县纷纷上报高产，但我们谭书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山最多只能报亩产800斤，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山要多上调粮食的负担。

谭桂明在中山工作期间，业绩突出，为人民赤诚一生，肝胆照人，堪称楷模。他永远活在中山人民的心中！

（选自《中山党史》2016年第1期）

关于中山最早制作的五星红旗之考

□方晓

010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中山的解放也日益临近。中共中山组织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及外围组织、进步民主党派，都按照中共珠江地委的布置，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解放工作。解放大军入城接管旧政权时，需要有象征新政权的国旗。中共中山县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将制作这面国旗的任务交给了“天文台”。而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经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的宣传机构“天文台”的黄云、周磊明、欧八、潘彦等老战士回忆，当时的中山通讯设备十分落后，县委和独立团都是靠“天文台”的战士，用电台接收外界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最早从电台接收到这个消息，并记录了国旗的式样。接到制作五星红旗的任务后，为避免出错，“天文台”负责人黄云还找来刊有五星红旗样式的《华商报》，大家按照报纸所刊登的式样，制作了一面宽大的、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红旗制作好后，大家都很激动，争相在红旗下合影。当时，中山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吴当鸿与战士甘子源等3人一起合影留念。文工队战士梁田也留影一帧，并保存至今。这就是中山最早制作的五星红旗的来历。

曾任中山支前办公室副主任的甘岳雄回忆：为配合解放中山，在距离中山解放的前几天，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支前办公室召集各界代表到五桂山区长江村开会，商讨筹备迎接大军入城事宜。那时，他刚调到支前办公室任副主任。他说，那天会议是由支前办公室主任谢月香主持，山区的群众代表、石岐各界代表与

会，石岐商会也有人来参加。由于中山解放举行入城仪式，需要制作大量的五星红旗，“天文台”也派人前来参加会议，传达制作五星红旗的规格和要求，以便发动群众制作更多的五星红旗。

当时，人民群众渴望解放，对制作五星红旗的热情非常高涨。有的商人激动地说：入城时需要好多红旗，不早点做，怎么赶得及啊？还有商人建议说：迎接解放军，不能光要大的，还要做一些小一点的红旗。小一点的规格是多少也要有规定。于是又规定了小红旗制作的规格。总之，小五星红旗是什么规格，大五星红旗是什么规格，都有具体规定和要求。除了布置做五星红旗外，支前委员会还布置做手拿的小旗子，有红的、黄的等各种颜色，还把标语印到小旗子上。石岐、五桂山区等地的很多商人、裁缝都参与了解放中山所需的五星红旗的制作。

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成立由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的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解放中山的号角正式吹响。

原中山商会的工作人员李国瑞回忆说：广州解放后，中山也解放在即。此时，不少溃退到中山的国民党兵不断向商会勒索港币。在中山解放的前几天，中山独立团曾派员找到商会，要求借一批米、煤油、面、布匹等，还要求给他们做1000套军服，说明先借后还。深受国民党兵勒索之苦的商会负责人，知道共产党素来讲究信用，有借有还，他们乐意接受制作军服的任务，并预先垫支了经费请制衣业工会赶制，制衣业工会即把任务分配到石岐裁缝店。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裁缝店很快转入制作五星红旗的工作。

9月28日晚，商会理事及一些商会成员在商会后座（即今商业博物馆后座）开会。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故会议是相对秘密进行的。会议由商会的黄金藻、李鸿标主持，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郑道实作动员。会议主要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1949年9月30日重阳节（编者注：应为1949年10月30日重阳节）那天迎接解放军进城事宜，二是1950年元旦的大巡游准备工作。

当晚布置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事项有：(1) 要求石岐商会 3000 多会员在重阳节那天中午 11 时之前到华佗庙集合，迎接解放军进城；(2) 当天上午各间商铺门面都要悬挂五星红旗；(3) 解放军队伍经过时，各商铺放鞭炮，并由解放翌日起，凡穿军装进商铺买东西的，一律八折；(4) 车衣业同业工会负责通知动员各衣车店务必于 10 月 30 日一早完成 3000 多面五星红旗的制作任务，让各商铺在当天一早能领到旗子并悬挂起来。于是石岐先前承接制作军服任务的衣车店也都把手头的活停下来，加入赶制五星红旗的行列，以保证 30 日上午各商铺来取旗时能提供出来。

10 月 28 日，由郑少康率领的两广纵队先头部队抵达石岐。负责中山地区工作的珠江地委委员兼中山县委书记、县长谭桂明即派李斌率领中山独立团先头部队连夜进城与之接洽，并配合地方党组织做好部队入城会师等相关准备工作。“天文台”制作的这面五星红旗也于当晚由潘彦、欧八这两名随先头部队出发的“天文台”女战士带进了石岐城。30 日上午 9 时，“中山独立团”和五桂山区根据地人民 1200 多人扛着山区群众做的五星红旗浩浩荡荡地挺进石岐，与两广纵队先头部队胜利会师。谭桂明、黄旭、梁冠、黄乐天、谢月香等地委、县委及中山独立团的领导率领部队，穿过早已聚集在石岐华佗庙路段迎候的各阶层的代表和各校学生、广大市民汇成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开进仁山广场（现中山纪念堂公园），与郑少康部为代表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石岐宣告解放。

会师后，随即举行盛大的庆祝解放的游行。石岐城内万人空巷，人们敲锣打鼓，舞狮鸣炮，欢庆解放。周磊明、欧八、潘彦等几名“天文台”战士扛着五星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不少围观群众也高举着事先做好的五星红旗成群结队地走在街头，城内 3000 多商铺全部挂上了五星红旗，一片红旗的海洋，洋溢着军民共庆解放的欢乐气氛……

（选自《中山党史》2007 年第 3 期）

延伸阅读

山坑里的“天文台”

□原“天文台”全体同志

013

“天文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1949年9月前称中山特派室）的宣传机构，主要承担团本部的宣传编印任务，兼做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它成立于1949年6月5日，前身是甘正嵩主持的油印室。取“天文台”的代号，大体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团本部的宣传喉舌，经常发播消息；二是负责人黄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的是天文系，借用这一名字，既有利于隐蔽，又方便记忆。

“天文台”设在福获村财伯家中。成立初期，有黄云（黄建树）、袁固（袁雪芳）、林超（郭冠旋）、刘中和和财伯之子财仔5人。随后陆续增加谭深、李枚、欧宝霞（欧八）、蔡婉文（蔡九）、蔡干、李海、周磊明、周毅光、潘彦、胡笳等近20位大、中学生。

“天文台”的工作效率十分高。1949年7月28日晚，中山特派室主动出击驻崖口国民党中山保警五营谢文泉部，全歼其一个连（谢湛强连），毙伤敌军37名，俘11名。此役的庆功会尚未召开，“天文台”已编印好“捷报”，并发到中山全境，使得人心大振。通过“天文台”工作人员的双手，先后编印了战斗简讯《众报》和部队领导机构的通告，如《告中山县人民书》《告国民党官兵书》《论群众观点》《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反对自由主义》《建党建团展组须知》，以及《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大量宣传品和小册子。此外，“天文台”还负责印刷部队的臂章、胸章、征收军粮通知书、部队内部使用的纸币票证等。解放战争后期，“天文台”在五桂山的武装斗争、策反、迎解、城市接管等各项活动中，确实起到了宣传战斗队的作用。

“天文台”的宣传印刷品，发行面广、发行量大，所刻仿宋字体之工整，使敌人在震惊之余也误认为它拥有印刷机器，屡次试图搜查破坏。其实，“天文台”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印刷机”不过是木板条配屐皮（胶片），笔用的是唱机头用的针，加上小三角尺，半截钢板和蜡纸就是全部的印刷工具了。印刷用的纸张、油墨是龙惠叶、财伯等群众冒险从蒋管区购买回来的，报刊资料如《华商报》《大公报》则由部队领导提供。

“天文台”的同志大多数是刚入伍的学生，样样新鲜，事事不懂，但能做到以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刻苦钻研，进步很快。他们不但学会了刻印技术，而且使印刷质量不断提高。起初，每张蜡纸印不到1000份，不久就提高到能印2000份以上；从印单张蜡纸提高到用四张蜡纸拼成一大张，印出质量很好的大通告；从印单色提高到多色套印，使报纸的标题，鲜明夺目。“天文台”的同志们时常夜以继日地赶任务，每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累极了便伏案打个盹，休息一下又继续干活。“天文台”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一间小泥屋。屋里只有两块床板，既是工作台，又是给病号睡的床（其他人员只能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睡觉）。遇到敌人进山区“扫荡”，大家就登山钻山洞。平时，“天文台”的同志们白天编写刻印资料，晚上就摸黑到邻村办夜校，宣传发动群众，访贫问苦，组织农会；农忙时节，则到田里帮助群众担水、插秧、割禾、打禾、晒谷。为了应付敌情，每次印刷完，“天文台”的同志们都要把纸张、油墨等工具藏到预先建好的土夹墙里，并把现场打扫干净，防止留下半点痕迹。

“天文台”的工作得到山区群众的支持。五桂山区的群众，乃至小孩，从来不会向敌人泄露部队的行踪，敌人来“扫荡”时，就飞速通风报信，好让同志们及早转移。例如，“天文台”的户主财伯，不但让“天文台”的同志在他家印刷文件，而且在紧急时还帮他们收拾油印工具，清理现场。为了防止敌人“扫荡”，财伯还准备了干粮，来不及就每人给几个沙葛，让同志们带着在山上吃。“天文台”的同志常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根本无法立足；没有群众的救护，我们难以生存。山区群众对我们像

自己的亲人一样亲。”

1949年解放军入城前，“天文台”的最后一个光荣任务是制作一面五星红旗。进城后，它便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在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天文台”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战斗，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整理自原“天文台”全体同志：《山坑里的“天文台”》，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市老战士联谊会编：《中山解放实录》，1999年印行。）

接管城市工作的回忆

□林克

1949年10月30日，石岐解放；次日，我奉命进入石岐，任军管会交通科第一军事代表，后又陆续调来蔡明任第二军事代表，关哲任第三军事代表。我们3人均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州搞地下工作，由组织安排进入五桂山游击根据地。解放后入城的，除我们3人外，还从石岐调来团员杨赞光到交通科工作，后又调来谢江（管交通水利）、陈江（管电话所）、郑桂等同志。

由于我们党长期在中山坚持斗争和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广阔的游击根据地，在中山县城石岐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如发展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团结教育了一批工商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等，为支援解放大军，迎接解放，接管城市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我到石岐的第一件事是从旧政权接管了建设科。该科科长是我们打入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工作的一位共产党员赵约文。我们顺利地、完整地接管了该科的档案资料和留守的技职人员，还接管了拖拉机和1艘电船。

支前、解放中山全境和沿海岛屿

在解放中山全境及沿海岛屿中，中山军管会干部和全县人民很好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大军作战和支前等各项任务，作出了一定贡献。这是中山人民的光荣。

作为新的地方政府，大军不断来人来电话和我们联系，要民工、担架、车、船、粮食、柴草、汽油、火水等各种给养，支援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支援前线，配合源源入境的解放大军，解放中山全境和沿海岛屿。

入城次日，每天早上在军管会门前都集结了动员来的大批单

车，我们把他们组成单车队，随时接管支援大军的运输任务。

我们很快就组建了军管会车船管理处。管理处设在岐江河畔，关哲、杨赞光为负责人，任务是控制管理来往船只，随时征调他们担负军运任务，并负责签发来往石岐船只的通行证。

两广纵队后勤部派来赵科长、黄参谋和我保持密切联系，又派黄、曹两参谋随时和车船管理处联系并派一个连队配合车船管理处工作，执行封船、调船任务。（编者注：在关哲《军管时期的船车管理处》这篇回忆性文章中提到，两广纵队派来的是王、曹两参谋。）

曾生司令员有一次还亲自找关哲同志谈话，研究布置调派船只支援军运问题，除一般运输外，解放沿海岛屿更需要动员大批船只担任运输任务。

战斗在紧张地进行中。我们不断派出船只支前，派出的船只有大客船（来往石岐、广州、澳门的花尾渡），也有电船和各种船只，在配合作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汽车则由我们军管会下令随时征调使用，岐关汽车公司是很配合的。我们接管的那一艘电船也参加了配合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表现很好。我也曾多次到石岐商会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筹集粮食、柴草，供应前方，筹集汽油供给军运船只使用。解放军在歼灭了盘踞在南屏、湾仔、三灶岛的敌人后，于11月12日又解放了大小横琴岛。1950年，经过6、7两个月的战斗，于8月3日解放担杆列岛，至此万山群岛全部解放。

支前任务完成后，车船管理处工作结束，船舶管理队由地方政府航运管理部门负责。

接管邮电部门

抓支前工作的同时，我们着手接管邮电交通和电力部门，鉴于电话通讯对联系工作的重要性，12月1日我们接管了邮电部门，由我兼任电话所军事代表，先后派梁坚、蔡华同志去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派陈江、郑桂同志去集体掌管电话所的工作。解放后电话所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运作，保持市内电话与市对各区

乡电话的畅通，接管时伪所长柯祖贻继续留守工作，市内有员工40多人，100门的电话交换机6台，30门的交换机1台（长途台），设有机务组维修设备。

接管石岐电话所后陆续接管了各区乡的电话分所，派关哲同志兼任了邮政局的军事代表，他单枪匹马的先后亲自接管了三、九区小榄、黄圃、大涌、三角、民众、浪网等乡的邮政和电话分所。

我多次到邮电职工家中访问，并参加他们的学习小组会，倾听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还组织他们去参观孙中山故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作和各项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如高杏瑜、阮节馨、程慕贞、梁洁宜、刘耀恒、黄桂兴、郑攀等同志，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派了中共党员杨萍到联接党政机关的那台交换机值班。

接管后的电话所生产很正常，在职工的努力下业务不断发展，修复了各区乡的通讯线路，架设好与八区、十区的通讯线路。1950年开通了与广州市的长途电话线路，当时我还第一次和广州通了电话。

全所员工坚守岗位，维修设备，维护线路，保证电话畅通。县府还开始利用电话会议，传达和布置工作。

职工积极工作，女青年话务员阮节馨在检查线路中不幸溺水牺牲，为通讯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为帮助电话所克服困难，所内员工两次自动减薪，有些职工还申请为供给制。

员工积极靠拢组织，反映情况和意见。如反映了原所长柯祖贻曾无理解雇老技工杨伯瑜，经工人展开斗争迫使其收回杨工作。接收工作进行中发现柯祖贻账目不清，欠款不能清还，我们还没有研究如何处理，他自己畏罪逃去澳门。

我们抓紧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先后招收了杨迎林等20多名青年工作，他们在党和老工人的教育培养下很快成长起来，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少人成为工作或技术骨干，如杨迎林同志先后担任了中山、佛山地区的邮电局长、广东省邮电局副局长。（编者注：杨迎林疑为杨配林。查《中山市邮电志》，中山邮

电局历任局长名单中无杨迎林的名字，而有杨配林 1959 年 12 月担任局长的记载。另外，据《广东省志·邮电志》记载，1987 年 6 月，杨配林被任命为广东省邮电局副局长。）

我们随后接管了电信局。12 月清点了电信局的电报设备，当时只有再生式三灯收报机、单管发报机和 6v6（编者注：6v6 为电子管的型号）发报机各一部，可和广州、香港等地直通电报。我记得后来还有一次曾清点出国民党留下的一批收发报机，进行了处理。

后来组织派来徐长林同志抓电信局的工作，任军事代表，后电话所、电信局、邮政局正式合并组建为邮电局。

019

接管电厂

电厂解放前称“迪光安记电灯所”，由旅美华侨严迪光于 1912 年创建，后由石岐均安隆米机司理李德联经营。我们接管时仅有一台 300 匹马力（约 220 千瓦）的内燃木炭机和一台 175 匹马力（约 128 千瓦）的双缸柴油发动机，木炭的燃料是木炭和无烟煤，员工有 40 多人，厂长是位老工人，还有一个技师。

我曾多次到电厂和工人们谈话，在饭堂和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坚持生产，搞好生产，向市民正常供电。

电厂的正式接管时间是 1951 年，当时我们调农具厂厂长谢恒任电厂驻厂代表，后来再调去肖德伦，两人一起管理电厂。

接管电厂后，电厂员工发扬了当家作主的精神，满腔热情地投入生产。由于主要的燃料木炭供应不上，只靠烧无烟煤，而无烟煤质量也不好，只好打碎制成煤饼代锅炉燃烧，燃烧值低，发电机出力不足，电压不够，输出电压应为 2200 伏，实际上有 1300—1400 伏，用户电压是 110 伏，晚上 6 时至 10 时向机关及市民供照明用电。工人便白天维修机组，晚上启动供电，天天如此，保证晚上安全运作。虽电力不足，电压不够，但还是保证了市民照明用电。

当时工人的工薪是很低的，每月只发 300 多斤米，第 3 年的学徒每月只发米 95 斤（第 2 年 65 斤，第 1 年 35 斤），为了建设

新中国，员工们艰苦奋斗，不计报酬。

接管岐关汽车公司，兴建广中公路中山段

交通方面，我们会同珠江专署交通处一起，以军管会的名义命令岐关汽车公司的全部汽车于一夜之间集中石岐，当即宣布接管了岐关汽车公司。司机们很兴奋，还有司机对我说起，如果事前军管会和他们研究接管事宜，他们会把在澳门的汽车也全部开回石岐。

我们还于1951年兴建了广中公路中山段。首先是组建了建设公路指挥部，由谭桂明同志任指挥，我任副指挥，谢江、余文伟同志担任具体的勘测设计和施工技术工作。接着，军管会颁发命令，动员组织各区乡民工参加兴建，自带粮食前来，各区乡分段负责施工，作为战时任务来完成。中山段全长29.5公里，共动员民工10万人，耗工42万工日，历时3个月便胜利完成任务。虽是简易公路，但从此，广州至中山通了汽车，也为今后新建现代化公路打下了基础。

回忆解放初期的战斗生活，不禁心潮澎湃，往事记忆犹新。那时候的干部都很年青，我们几个军事代表都是20来岁的青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挑重担。记得有一次，我因病住院，民主人士郑彼岸来院探望，说我这些病是革命病，希望我早日痊愈。他还笑着说：你们军管会各科的几个军事代表加起来还不到100岁，看见共产党的干部年青、能干、朝气蓬勃，我高兴，也很钦佩。

今日中山，一片新气象，也是年青的干部在挑大梁，祝愿中山工作有新的飞跃，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的接管及政权建设工作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021

1948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指导各地的城市接管工作。按照简报的精神，接管城市应“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城市秩序就能较快地恢复。由于中山解放前夕，中山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内部调查摸底工作，又有沈阳、天津、北京等城市的接管经验作参考，因而接管工作顺利进行。一个月共接管原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以下单位45个；石岐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一批干部，分别接管了原国民政府中山县警察局及石岐后岗涌、岐江、民生3个派出所。整个接管工作体现了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即“一切大革命除必须破坏的以外，应尽量多保存一些自用的东西。这样做，政治上主动，经济上也便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对原国民党县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除少数市政公用部门、卫生部门等机关人员外，对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旧军政人员，一般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构。一般的职员经过训练，除少数必要者回本机关外，其余则另行分配工作。

对原来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海关、税局、邮政、电信、银行等，不采取打乱的办法，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如接管县公产整理委员会、石岐产会、石岐庙产、纪中校产会、保育善会、崇义祠、丰山书院、与善堂等单位时，军管会只命令他们各自清理旧租手续，暂停对外新业务。直至1949年12月21日才合并上述各机构，成立县人民公产整理委员会，共接管农田33865亩、商铺94间、市亭2座、沙地1块、

稻谷 429764 公斤，人民币 2208483 元、葡币 5025.5 元、港币 6916.9 元，使公有资产平稳有序地接收，避免损失。财税机构接管后，接管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逐步熟悉情况后，至 1950 年 3 月开始改革财税征管制度，整顿地方财政和公产收入，废除苛捐杂税，建立收支预算决算审计制度，使全县财政收支走上规范化轨道。

拱北海关是 1949 年 11 月 5 日由军管会主任黄旭亲自带队接管的，黄旭在会上郑重宣布：石岐军事管制委员会奉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正式接管拱北海关。接着宣读接管海关的 14 条规定，内容包括在 7 天内原海关高层人员要负责对组织机构、人员、文件档案、财产等造册登记，办理移交手册，原海关驻澳门机构及人员迁回中山境内办公；对海关人员愿意留下者，量才录用，原职原薪，照常工作；海关被接管后由石岐军管会财粮军事代表主管，并委派军事特派员常驻，协助工作。同年 12 月 13 日，拱北海关归属广州市军管会海关处管理。

在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1950 年 4 月，中山县人民政府的建制初具雏形，正式设署办公，下设秘书室、粮食局、税务局、公安局、财政科、民政科、工商科、文教科、建设科等机构。7 月成立中山县人民法院，由谭桂明兼任院长。至 1950 年 9 月，全县共设 11 个区，1 个区级镇石岐。1950 年 1 月，各区人民政府先后成立。至此，中山形成从县到区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各级行政机关有效地运转起来，人民政府工作也迅速打开局面。

为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政府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从 1950 年 3 月起，中山县委、县政府开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工作。4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石岐召开。出席会议代表有 408 人，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工商业界、华侨、自由职业、军队和党政团体等各方面代表，其中农民代表 200 人、妇女代表 24 人。许多工人、农民代表是首次参加全县大会。

中山县长谭桂明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中山解放

半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思路。与会代表怀着参与政务的使命感，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充分讨论，对政府工作表示满意，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有 13 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与会代表提出各类方案 279 件，内容涉及生产自救、减租退租、清匪反霸、社会治安、民政、财税、交通、文化教育、工商管理和华侨工作等。会后，中山县委、县政府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相关落实措施，推动全县各项工作开展。

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圆满召开，对调动全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抓好解放初期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至 1954 年 3 月，中山先后召开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提高各方积极性、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推进全县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群众性组织团体也是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一工作首先在发动群众工作准备比较充分、群众觉悟初步提高的地方进行，普遍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各类协会组织；同时，建立民兵、自卫队组织。它们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力量。

中山解放后，中山县委十分重视农民组织的建设工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中山县委明确农民协会的规模和宗旨，通过农会组织、发动和团结广大农民。1950 年 4 月 3 日，中山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7 月 6 日，为贯彻执行第一次县农代会决议，第二次县农代会召开。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党的农村工作逐步深入，农村组织的发展很快进入高潮。至 8 月，各区基本建立起农协筹备委员会，入会农民有 65565 人。1951 年 2 月 10 日，全县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选举成立县农民协会委员会。

在工会组织建设方面：中山解放后的第 7 天，县长谭桂明主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约 200 人。会上，谭桂明讲话，着重宣传中共的政策，强调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努力改善工人生活，这极大地鼓舞了到会代表。会后，中山县委决定由军管会民运科负责工会组建工作。1950 年 3 月 1 日，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随后，工会组织的活动形成高潮。党员干部深入企业，

广泛发动工人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展斗争，开展生产自救，维护生产经营，废除不合理制度，开办工人文化福利事业，办起工人俱乐部和职工夜校，使工会成为工人群众的家、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8月，石岐、小榄、香洲等城镇建立工会筹委会，入会会员2734人。12月12日，中山县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11人，正式成立县总工会。1951年1月，全县举办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为各基层工会建设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宣传工作方面：1950年初，中山县委组建中山县委宣传队，任务是以文艺宣传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队设有合唱组、舞蹈组、戏剧组、电影队，在县内各乡镇巡回演出。1950年秋，电影队受中山县委、县政府的委托，到本县沿海各岛屿（后划归珠海市）进行慰问演出，唐家海军司令部曾文政委热情地接待了电影队，派舰艇送电影队到各个海岛完成慰问演出任务。演出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

妇女工作方面：1950年6月15日，中山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县妇联筹委会及下属基层组织，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发动妇女支持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宣传婚姻自主，保护妇女合法权益。许多妇女积极靠拢自己的组织。8月，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达9234人。根据《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1953年3月中山县第一次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山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县委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发挥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优势。中山县委主要领导指示统战部门的干部，定期与民主人士接触和交流，就经济、文教卫生、社会秩序、群众生活、华侨工作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协助民主党派在中山地区发展组织。

在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山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系统的改造。如在城镇，石岐在各项政务工作转入正轨后，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到基层政权建设上来。1950年，石岐划分为5个区，派出所由原有的后岗涌、岐江、民生3个派出所，

相应增为 5 个；街区和派出所的管辖范围相同，实行“街派联合办公”，派出干部深入街道扎根串连、培养居民积极分子、召开座谈会、举办民众夜校和出黑板报等，广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此外，召开街坊代表会议，通过街坊代表组织动员群众、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保甲制度的反动性，宣布废除保甲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30 个居民筹委会和 290 个居民小组，形成街道两级基层组织。小榄、黄圃等城镇也根据自己实际，建立起各种居民组织，进而取代保甲组织。在农村，主要是结合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斗争，有步骤地进行对旧政权的改造工作，五桂山区作为首批试点。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中山县委、县政府结合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的工作，进行划乡和建立基层政权工作。1950 年全县各区召开区代表会议 10 次，出席代表 1758 人；召开乡代表会议 45 次，出席会议代表 4545 人，逐步建立起 34 个乡政府，条件未成熟的地区，则由区政府派出干部下去代理工作。至年底，全县 94 个乡基本完成政府组建工作。

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从县、区、乡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初步形成新型的行政体系，为中山县委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也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工作提供有力的保证。

中山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

□邱霖巧

026

1949年10月30日，中山人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那一天，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受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那一天，鼓乐喧天，龙狮起舞。

随着1949年接近尾声，中山县政府和人民庆祝解放后第一个元旦的热情逐日高涨。1950年1月1日，《建中日报》出版《石岐市各界庆祝元旦暨中山解放大会特刊》。中山县委委员、副县长黄乐天在该报发表《庆祝解放年要做什么工作》一文，号召中山人民做好三件事：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肃清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保障地方治安，建立巩固的革命秩序”；二是翻身做主的人们特别是农民，要大胆组织行动起来，如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减息，反对恶霸欺耕霸耕，实行武装自卫等；三是为改善生活，珠江三角洲人民必须自己广泛动员起来，加紧进行各项生产事业，尤其是农业生产，确保解放后的珠江三角洲生产水平不致降低。

中山县政府提出了充满希望的来年展望，人民群众也为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欢欣鼓舞。各行各业热情的人们的来稿，占据着1950年元旦当天的报纸版面。印务工人、电话工友、岐关职工、电信工友、装卸工友、电力灯所工友、邮工、学生等，都借着这张薄纸，寄寓自己对新中国的深厚祝福。他们以主人翁的精神把新中国的生产建设视为己任，热诚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他们用批判的视角审视自身，热切地想改换脑筋，改掉坏习惯和坏思想；他们急切地期盼即将召开的石岐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将其视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人们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陶醉在新年的愉悦里。

印务工人林敢称：“我过了20多个元旦了，但从来没有今年

元旦的特别兴奋、愉快。因为 1950 年的元旦，是中山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现在有些人在怀疑说：‘为什么我们劳动者的生活还不能马上得到改善呢？’这就因为新中国还在战争中，一切建设的工作还在开始，但我们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邮工黄德贤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1950 年的元旦，是一个值得狂欢的日子……多谢共产党领导下英勇的解放军，使我们——工人在铁蹄下翻了身，使千千万万的人民从魔掌中恢复了自由。起来！光明就在目前。我们用愉快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新生！”

心情激动之余，淳朴的中山人民仍不忘生产建设和巩固解放成果。

岐关职工着眼于交通运输工作，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对这一年，我们想做下□几件事：一、我们将以游子的心情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我们将结束了过去的生活，我们要在新的斗争中，完成了每一个工友的改进，我们要在人民胜利特别是工人胜利的欢呼中忘了小我，我们要在为建筑民主新中国热情的斗争中结成一条钢一般的阵线。二、我们要把职工会□好，我们要团结在职工会底下本着‘劳资□□’的原则，推进交通业务”。三、我们配合着国内其他工人阶级，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我们更配合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建设新的世纪”。（编者注：□为原文无法识别的字）

电话工友何霭芝满腔热诚地说：“1950 年的元旦已经来临了，在兴高采烈之余，我们不应忘却了建设工作！毛主席曾经对我们说过，1950 年的工作重心就是增加生产，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刻苦工作，而不是准备享福，这样才可以使祖国向着繁荣的大路前进，才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邮工阿洛从大局出发说道：“我们要做的事千头万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怎样来巩固社会治安和稳定经济、安定民生，我们要求并协助政府禁绝烟赌和娼妓，因为这些藏垢纳污的地方，足以扰乱社会的安宁。”

对于将在 1950 年 1 月召开的石岐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人们有着热切的期盼。电信工友蒙军认为，这次会议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第一步”。另一位电信工友杨仲森称，这次会议使他“掀起了久已消沉的兴奋与愉悦的情绪”，“因为这个会的产生是人民的，民主的，我可以选出我想选的代表，并且可以转达我想说的话”。

1950年元旦中山人民对中山这片热土有着这样的期许，那么，身处今天的你又对她有着怎样的愿景呢？

（选自《中山日报》2016年1月2日第4版）

延伸阅读

解放初中山县城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即迅速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根本问题。解放初期的中山，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为了扭转经济混乱的局面，中共中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开展打击不法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

首先，打击投机资本，扫荡地下钱庄，加强金银外币管理，稳定金融形势。石岐解放之初，不法投机商趁人民币在市场上立足未稳之机，大肆炒卖银元、外币，将大捆大捆的人民币从拱北海关打入，每月收纳起过亿元新钞。海关曾试图拒收新钞，结果市场更乱。银元价格的轮番暴涨，带动物价指数成倍上涨，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流通，造成人心浮动。

1949年12月初，石岐军管会和中山县人民政府成立财经小组，由财粮、税务、贸易、军人供应站和支前指挥部成员组成，统一部署整顿金融秩序工作。12月14日，依据《华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和《华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军管会发出整顿金融秩序的公告，明确规定石岐的私营银号、钱庄、金铺、找换摊、专营侨汇及侨批业的商号，自即日起办理登记手续，4天内（即12月14日至17日）一律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山支行进行注册登记，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引导私营银行将资金主要投向生产事业。1950年1月11日，军管会召集商会

理事长和同业公会会长 60 多人座谈，听取社会经济和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意见。2 月 5 日，军管会印发关于严禁使用港币及一切外汇的公告，严禁私自买卖，并在广大城乡大张旗鼓宣传有关政策，强化社会舆论。3 月 11 日，军管会组成执法队，一举查封“现代银鼎”和“和利农田”两家钱庄，查处凤鸣路、孙文西路、南基街、河口街、长堤、阜峰里等处的利安燃料行、益群药房、六安茶庄、瑞德洋货店等 41 家街头兑换店铺，拘捕一批投机商。这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银元价格立即大幅下降。这场斗争严厉打击了非法金融投机活动，使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流通。

其次，控制和稳定物价、稳定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余波仍在显现，中山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物价居高不下的现象。如 1950 年初，珠江三角洲普遍粮荒，石岐、小榄粮商乘机大量抢购、高价抛售粮食，使大米销售价格不断攀升，一度由每担（50 公斤）10 多元升至 23 元。一些不法商人抢购纱布、五金、化工原料和煤炭，各类商品价格轮番上涨。

1949 年冬至 1950 年春，中山县委、县政府精心部署一场打击非法涨价的斗争。根据中财委的方针和措施，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以稳定市场、控制物价。

1949 年 11 月 19 日，石岐军管会发出《布告》（财字第三号），发布货物进出口关闸的有关规定，严禁走私漏税。1950 年上半年，珠江粮食分公司和中山贸易公司成立，以加强国营经济在市场斗争中的力量。这两家公司在全省范围内，采购大量的稻谷、生活布匹以及化肥、煤油（火水），继而向本县市场销售。在粮食经营方面，则把小榄同石岐差价拉平，将批发零售差价由 8% 降到 6%；限制私营粮食经营范围，规定批发粮商不得经营零售，零售粮商不得收购稻谷，迫使私营粮贩不得不将囤积的粮食降价抛售。由于发挥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市场物价逐步回落。至年底，米价每担降至 14.6 元，其他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普遍下降了 1.7%。

第三，统一财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县与全国各地一样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中山县委采取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一方面广辟财源，另一方面紧缩开支。中山县委谭桂明等主要负责人保持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和机关干部同桌吃饭。在中山县委领导的带动和影响下，各部门节约开支，合理使用资金。1949年11月至12月，全县财税收入16.415亿元（旧人民币，下同），支出13.113亿元，保证了地方部队2000余人和旧政府留用员工1137人的供给。1950年4月21日和6月5日，中山县政府先后召开全县第一、二次财政会议，坚决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广东省财政会议的精神。会后，全县各级部门紧急行动起来，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推销公债，节约开支。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踊跃缴纳公粮、税款和认购公债。据统计，全县共清理编外人员449人，清出“小金库”现金1700万元、黄金1两；查贪污案件34宗，涉及人员40人，涉及人民币1.3亿多元、港币6828元、稻谷2564公斤，大米15672公斤，及时挽回经济上的损失。与此同时，建立有关规章制度，完成认购公债任务，总额达31万余分（当时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分”为计算单位）。

在中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全县统一财政工作很快取得明显成效。1950年1月至9月全县财税收入累计449.5亿多元，实现收支平衡，完成上级交派的财政任务。由于集中财力，既保证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的胜利，又保证地方行政、教育、卫生、救济费用的开支，还可以抽出资金扶持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先后贷款给兴利行车公司、油榨工业合作社、迪光电灯公司等企业，拨出专项资金兴建岐江大桥。

往昔趣事

□陈翔

离家 参军

1949年我的哥哥姐姐陆续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家中经济拮据，我辍学在家。10月14日，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市，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盼着哥姐接我去参加革命队伍。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静姐的信，她在信中说她已从游击队转到两广纵队文工团，现在文工团要扩大，招收喜爱文艺工作的男女青年，叫我马上到中山石岐。当时家里还有一个二姐，唱歌跳舞是她的爱好，到文工团工作她比我更合适，所以她也争着要去，因为我只有12岁半，不可能挣钱养家，妈妈只好说服二姐留下教书，让我去参加文工团。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走路、干活都在唱，逢人就说：“我要去当解放军了”。12月14日，妈妈和二姐送我到中山石岐，当时文工团住在厚兴街，只见男女都穿颜色深浅不一的军服，打着绑腿，很有朝气，态度和蔼可亲，我马上喜欢上了这支队伍。晚上他们到“模范戏院”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我和妈妈、二姐也跟着去看。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真好看！同时也被剧中的情节所打动，随着喜儿的喜、怒、哀、乐，一会儿哭，一会儿咬牙，一会儿挥拳，斗争恶霸地主黄世仁时，妈妈说全场观众喊打声中就数我嗓门最大、最高。

妈妈第二天就要回家了，晚上二姐又跟文工团的同志去演出，我和妈妈留在营房里（是民房），躺在床上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双手捧着妈妈的脸偷偷地流泪。第二天妈妈对静姐说：“小妹昨晚哭了”（原来妈妈在装睡，大概也和我一样的心情吧）。静姐说：“舍不得妈妈呀？那你今天就跟妈妈回家吧！”“不！”我直摇头，态度很坚决，生怕二姐乘机又和我争，我虽然舍不得妈妈，我更

舍不得己喜欢上了的文工团这个革命大家庭。

第二天，文工团发了一套又长又宽的军服给我，穿起来虽然太长，但感到很新鲜，也很神气。我被编进老同志所在的演出队第八分队，清一色的女同志，梁澜同志是分队长，我高兴地在内心大喊：“我当上解放军啦！”

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个小集体，除分队长外，其余的年龄只有10多岁，但大家很团结。数十年后，文工团的每次聚会，已是满头白发的八分队成员总要高兴地聚在一起照相留念。

上台当演员

参军后第一次上台当演员就是参加《白毛女》的演出，在剧中只是演一个不起眼的群众角色，这对我这个小女孩来说却是新鲜事儿，不要说不懂演技，连唱歌、走台步都不会，全靠同志们教。杨萍同志比我先参加文工团，可算是演了10多场戏的老演员了，由她教我走台步，我耐心跟着学。剧中最后一场群众斗完地主后，全体演员齐唱“太阳出来了……”时，整个群众演员抬起左手，从台中间走到台左侧，边唱边走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古怪步”，然后抬起右手又从台左侧走向台右侧，边走边唱：“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我觉得既好奇又好笑，不留神踩了别人一脚，赶快伸伸舌头。这个小动作不知其他演员和观众是否察觉，而我却留下深深的记忆。有一次演穆仁智在奶奶庙向群众散播遇见白毛仙姑的谣言那场戏，回到后台，演穆仁智的韦丘同志对我说：“你这个小鬼，刚才死盯着我，我差点出气氛”。可见韦丘同志演得逼真，让我这个初上舞台的小女孩对穆仁智的谣言信以为真哩！还有就是对化妆一窍不通，第一次当然是别人替我化，化好妆后总觉得脸上紧绷绷，痒痒的不好受，于是东痒抓一下，西痒又抓一下，脸上的油彩粉底掉了自己还不知晓。王冲同志瞪着大眼对我说：“哗，哪里来的污糟（脏）猫？”静姐打趣地说：“这样更像农村妹仔，老泥未洗干净嘛。”

过新年

1950年是广东解放后第一个新年，为庆祝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山在石岐举行游行活动，文工团负责表演秧歌、腰鼓、花棍、高跷。这些形式广东人还未看过，都是老同志从北方带来的民间艺术。而我们大多数是新参军的南方人，所以文工团领导安排几天时间由老同志教我们。我记得腰鼓队的老师是肖吐、裨海同志，花棍队的老师是黄锦生同志，秧歌队的老师是陈全同志，高跷队的老师是黄华同志。我们八分队基本都在花棍队，天天在操场排练，既严肃认真，又热闹活跃。转眼到了元旦那天，天未亮大家就集结在操场上等待游行，天亮时，忽然有人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边歌未唱完，那边歌声又起：“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军队和老百姓，嘿哟，军队和老百姓，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尽情表达了人民对翻身解放的喜悦，不少人边欢呼边把帽子抛向高空，我的帽子不知被谁摘下抛向高空，害得我哭起来，生怕没戴帽子会被人说我是假解放军，整队时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帽子才破涕为笑。

日记 钢笔

我参军时只上过小学，文化水平很低，别人拿起一支新歌就会唱，开会发言有板有眼。而我不会看简谱，只能跟着唱；开会也不敢发言，总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每次开会总是当“厅（听）长”。当时文工团的学习风气很好，新老同志都写日记，还相互交流，互相提意见，同志们鼓励我也写日记，既可提高文化，又可提高思想。买不起正规的日记本，大家就自己动手把白纸切割成32开，封面是用旧布刷上浆糊粘在硬纸皮上，然后就用线装订成本子。这也是革命传统，老同志人人都会做，新同志也有人做得又快又漂亮。因为我年龄最小，就连絮棉被，也总是别人帮我的忙（当然以后我也学会了）。开始自己没有钱买笔，只好向别人借。何胜同志有一支从家里带来的派克笔，特别好写，我总喜欢向他借，但长期借用不是办法，孙孝敬同志自告奋勇为我

安排津贴费：每月先买好邮票、信封（写家信用），然后缴交分队集体看电影、煮糖水的“公积金”，剩下不多的钱就由孙大哥替我管理。果然，几个月后，他替我买了一支钢笔，是浓绿色的笔杆（因为牌子不起眼，我就记不起它的大名了），质量较粗糙，写起字来容易划破纸，绝对比不上“派克”“犀菲利”的美观和流利，但它毕竟是属于我自己攒钱买的第一份“财产”呀！我格外地爱护它，隔三差五的就给它洗澡（笔尖笔芯内有不少墨水沉淀物），就这样，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大哥大姐们还耐心地帮我改错字、提意见。若说我这个小学生的文化水平比原来有所提高，那真要感谢文工团这个革命大家庭同志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好传统、好作风。可惜的是，我这个人眼光短浅，满足现状，错过了一次读书的好机会，让我遗憾终生。那是1951年秋，文工团精简压缩，编余人员大多数去参加土改，我和杨励、黄锦端3人因年龄较小，组织上拟让我们再读书，当时任文化科科长的钟寰同志找我们谈话，叫我们去翠亨村的纪念中学读书。我们3人都表示不想去，要继续留在部队当解放军。当时我个人想法是当解放军光荣，且当的时间太短，怎么可以革命半途回去读书当老百姓呢？另一方面认为文工团少年队的老同志，参军前也没读多少书，靠在革命队伍中自学，现在不是照样干革命吗？结果我和黄锦端两人去了教导大队八中队，杨励可能被其大哥杨康华同志动员，一个人去了“纪中”读书，后来听说她也没念多久就跑回来“继续革命”了。现在想起来，既感激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又后悔自己当初的幼稚决定，不知黄、杨两人是否有同感？

男孩 女孩

文工团的主要任务是演出，按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演出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节目，不论大型的、小型的，是歌剧还是话剧，只要剧情需要，不管你是戏剧队，还是音乐队；也不管是演员、还是卫生员、通讯员、文书都有可能上台当演员。总之，一切服从演出需要。在文工团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跳过《骑兵舞》，在

弦乐队学过二胡，在装置组保管过“八宝箱”，在效果组学会做无弹头子弹，也演过几个小戏。当然，总是演人家的孩子，如《人民战士》《立功喜报》《光荣灯》……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演多幕歌剧《人民战士》。该剧主要是描述珠江三角洲的渔民在遭受国民党匪军和自然灾害的摧残后，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救助重建家园的故事。邓肯演父亲，梁红鹰演母亲，张松慕、叶平和我演他们的儿女。我演的是一个小男孩（是可以享受“鸡蛋”营养待遇的角色之一哩），我必须女扮男装，头一件事是要把头发剪掉，理个娃娃头，并且将头顶的头发扎成一个像毬子似的冲天小辫。当时我没有意见，因为刚从生产第一线回来满头长了虱子，剪掉有虱子的头发正合我意，可演完戏后，又盼着它快点长。因为当时解放军女同志穿的是苏式的连衣裙，大盖帽和皮鞋，每次集队外出，我这不伦不类的样子夹在女同志的行列中，总会惹起人们的注意和猜疑。最讨厌的是三级石（文工团的驻地）附近的小孩子，老远看见队伍经过，就指着我大喊：“半男女，半女男”，幸亏我已是革命了若干个月的人了，心里明白我是因“革命工作需要”，知道“自己是解放军”的身份，才不跟他们计较哩！以后文工团到广州演出并参加了欢迎世界青年联欢节各国代表的盛会，我又由“男变女”——头顶上一条小辫变为两条小辫，再加上两个漂亮的蝴蝶结，加入了女同志的秧歌队，照样为革命，管它什么半男女不半男女的。

虽然演过几个戏，但我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编者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和表演理论家，代表作有《演员的自我修养》。）记得刚参军时，在厚兴街文艺一队驻地——一座三进式的大祠堂，乔毅大姐在给大家补课，讲的是史丹尼的表演艺术，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却一点也听不懂，和谢遇安跑出街口小店买杏仁饼吃。

谈心活动

文工团有一个好传统，人们经常利用吃饭时间开展谈心活动。当时吃大锅饭，几个人一桌，桌上放一盆菜，人们往自己口盅里

舀些菜就约另一个人找个地方坐下，边吃饭边谈心。我见人们一对对、一双双地离开饭桌，并没有固定的对象，心里很纳闷，不知他们到底谈些什么内容，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谈呢？据说党员找团员，团员找群众谈的都是帮助进步的话。说实在，那时我一来才十三四岁（尹荻同志就曾在上完团课后对我说：“你未够资格入团”），另一方面我还真未有这种觉悟，还未有人团要求哩，人们都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小女孩，怎么找我谈心呢？我也就习惯了，每天心安理得地自己吃自己的饭。可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我忘了是哪位同志）端着饭向我走来，笑着说：“陈鞅，我和你谈心好吗？”我毫无思想准备，简直惊呆了。找我谈心？怎么会呢？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他见我那傻样，就问：“你最近怎样？”“我？最近？没怎么样。”我稀里糊涂地应着。他又问：“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是团员，谦虚、上进，征求意见来了，可我真找不出什么意见来呀。他说：“感觉、看法都可以说说嘛。”我见他那诚恳的样子，就搜索枯肠想找些话，意见？感觉？看法？找呀找，始终找不出什么。真笨！我恨起自己来，后来怎么收场的我忘了，反正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直到我离开文工团再也没人找我在吃饭时谈心，可见我当时政治上、思想上多幼稚，而文工团这种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思想互助的风气多好啊！如果我继续在文工团呆下去，相信进步会快些……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期）

延伸阅读

在《战斗里成长》中连升“八级”

□王弦

038

1950年夏,珠江军分区文工团排演的大型话剧《战斗里成长》在中山石岐与观众见面了。当在石岐仁山广场演出时,人山人海,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每场总有过万观众前来观看。这是两广纵队文工团南下以来继《白毛女》后的又一个大型的、影响较大的演出。

演出得到指战员和各界群众的好评。除了政治上的成功,艺术上也得到很高的评价。主演营长赵钢的游波、傅冰,把一位纯朴的、充满阶级仇民族恨的贫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为一位百战百胜的解放军营长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真实可信。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戏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舞台装置,拉绳换景,另外兼演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解放军战士。

当这个戏正演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游波同志因另有任务要调走,赵营长这个角色便落到傅冰同志身上。

这台话剧在省府礼堂、公安局、南方戏院的演出十分成功,得到社会各界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演员演兵的气息很浓,战斗气氛很重。好些文艺团体和我们交流创作经验。1950年9月中下旬,完成了广州的演出任务后,即班师回石岐,在石岐大戏院作汇报演出以答谢首长的关怀和群众的爱戴。原计划只演3场,并准备在这几天里,把戴江、汪潮、辛枚等同志刚脱稿的多幕歌剧《张明诉苦》的剧本赶抄出来,突击排练,连同《战》剧一起,到各战斗团队巡回演出,配合连队阶级教育的。谁知在石岐的3场演出,满足不了当地驻军和群众的需要,要加演几场。这样一来,整个文工团都忙碌起来了,只好一边演出一边准备下团队的工作了。

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文化科长钟寰和几位领导找我谈话。钟叔对我说：“现在给你一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当时参军不久，革命热情很高，认为越是艰巨危险的工作就越是光荣，只要有任务都会抢着干，更何况是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呢！我便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钟叔说，“傅冰同志马上要调走，现在决定由你接替他的角色，要在3天之内把赵营长这个角色拿下来。”我一听，吓得差一点尿裤子，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给我多少天？”“3天时间排练，第四天就演出。”我的妈呀！这3天就算不吃不睡合共才只有72个小时，晚上还要演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熟读几百段台词已经够难的了，还要塑造一个年龄跨度大，贯串全剧的英雄人物——赵钢，谈何容易啊！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只演过小歌剧《王佃农》、只听过节“史丹尼”、刚参军还未入行的小文艺兵，哪有本事挑起这副重担，便准备打退堂鼓。但钟寰同志把形势讲得很清楚：傅冰同志3天之后要离开文工团，到新的单位报到，第四天我就要上演，演出日期已定，票已卖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不行也得上！

我清楚地记得接受任务的当天下午，钟叔在大会上动员，并要求所有对手演员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务必在3天之内把新赵钢推上台与观众见面。我也保证，就算死，也要把这个任务啃下来！说干就干！马上读剧本。首先是过台词关。从开幕到结束都有赵钢的戏，共有几百段台词，这台词不能像背书那样背出来，而是“讲”出来，而且又要合乎赵钢的身份和剧中的情节“讲”出来。同志们特别照顾我，演出时在第一条侧幕边为我找了一个能纵观整个舞台的地方，使我能看到傅冰的表演。我除了要出几次场之外，整晚演出我都站在那里，细观赵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因为我知道：以我当时的水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创造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模仿！尽量将前两位赵钢的言行举止揉合在自己身上。模仿他俩的神态，这样，对手演员也就容易适应，自己也能以最短的时间来塑造这个人物，掌握这个人物，因为他们演得太出色了，这出戏绝对不能毁在我的手上。

第一晚散场后,开了一晚夜车,把第一、二场的台词基本背熟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排练。我的对手演员都已演过很多场了,各人的台词都已滚瓜烂熟,台位闭着眼睛也能走到。而我却样样生疏,有时记得台词却忘了走位置,或者把台词颠倒过来讲,有时还忘记了台词。我很紧张,一是怕完成不了任务,二是怕陪练者不耐烦。其实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见我紧张,大家都来鼓励我,安慰我,都向我表示:百排不厌,随叫随到。我记得,最难排的是“夫妻重逢”和“斥子”那两段戏,我总是掌握不准人物的分寸。演石头妈的梁红鹰同志,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游波和傅冰同志是如何处理的,还帮我分析当时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有海仔、蔡明等同志,都是手把手帮助我的。当时大家只有一条心,一切为了把我推上去。以我在专业剧团几十年来的经验,从来没有见到有这样的公无私的群体去帮助一个主要角色的C角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文工团同志不分彼此,全力以赴。经过对手演员对我的启发,自己的揣摩,看演出排练,我和角色的距离越来越接近了。

有一天中午,实在是太疲倦了,我一躺在床上便睡着,跟着就讲梦话了。很多人说梦话都是有头无尾的,含含糊糊的,而我说梦话却是清清楚楚有头有尾。当时高洁、梁红鹰、邓肯几位同志正在房间里抄《张明诉苦》剧本。听到我在梦中念《战斗里成长》第三场赵营长的台词,他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和我对起台词。直到把三场的台词全对完了,才发觉我是在讲梦话,顿时哄堂大笑,把我给吵醒了。

三天三夜的奋战,终于得到较好的效果。到了第四天晚上,新的赵营长如期上场,演出效果完全正常,得到文化科和观众的肯定。谢幕时,我热泪盈眶,这是全体文工团员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他们无私的奉献,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由于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在《战斗里成长》这个剧中连升八级,从战士升到营长,功劳归于亲爱的同志们!

(整理自王弦:《在〈战斗里成长〉中连升“八级”》,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新声——两广纵队文工团在中山》,2004年印行。)

中山辗米机和糖厂的搬迁

□司徒洪

041

解放初期中山的辗米机和糖厂搬迁是属于生产自救的做法。

由于中山的独特地理环境，处于珠江口西岸，毗邻港澳，在解放前，走私活动较猖獗，当地的地主豪绅的走私活动遍及城乡，特别在盛产稻谷的大沙田地区，则是他们走私的主要基地，在石岐、黄圃、民众、浪网、三角、潭洲、大岗、小榄、坦洲、濠头等地，开设了不少米机和糖厂，以满足他们将稻谷辗成大米，私运去香港，达到谋取更高利润的要求。所以，解放前中山的米机就有 20 多间，而石岐、黄圃、民众、大岗等地每处均有 3 间以上。

解放后断绝了走私的通道，打击了奸商的非法牟取暴利手段，并接收了地主豪绅的辗米机和糖厂。米机的作用仅是供给当地居民的食粮，因而许多米机都陷于停开状态，富余米机工人日渐增多。但是广东省的西、北江及广西临近广东的一些中心县城，都缺乏米机为居民辗米，他们仍使用竹木织成的碓来脱谷壳，用水力或人力来舂米，劳动强度很大，不适应经济发展。因此，不少市、县要求用机械来代替人力，保证供给当地居民所需的粮食。

省军管会知道中山在解放初期有不少米机停产，工人失业，所以下达通知把中山多余部分米机实行外迁，并规定凡是技术工人要跟米机一齐外迁，一般职工则任由他们选择出路。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又对当地发展工商业起到促进作用，达到双方都有利的目的。

米机的外迁进展顺利。据我所知，台庆地区派出粮食科科长肖仲钊（中山人，曾与我在九区搞借粮支前工作）代表台庆地区粮食部门驻中山，负责迁移 10 多间米机到西江各地的工作。

糖厂外迁的则不多，我知道的只有新涨沙糖厂和海洲等地多余的厂房迁到需要的地方去。

（选自《中山党史》2003 年第 2—3 期）

延伸阅读

解放前中山米机业的发展及其经营

□黄桂波 伍允成 黄栈等

042

中山最早的米机，是1912年由旅港商人，集合资本，在港购置碾米机器，在石岐凤鸣路开设的“卫生公司”，后因失火被焚而闭歇。不久，在长洲乡开设过一间米机，石岐也开设了一间洪生米机，都因营业不振，相继歇业。其后的石岐米商李德联（解放前商会会长、米业公会理事长）得其舅父梁植卿出资2000元帮助（梁植卿是澳门鱼栏主），复联络在九区置业的顺德籍大地主得到稻谷供应的支持，同时又联合了石岐几个有力的米商合作，于是以贱价买了卫生公司遗存的机器，自建厂房，名为均安隆，开始营业。当时一般市民以其米价比米店较相宜，乐于购用。均安隆经过年余时间，业务大有发展。商人是钻钱孔的，见米机有大利可图，纷起而竞争。跟着就有一间协和成米机开业。协和成所需的稻谷，是向市场抢购的。店中买手李卓，恃米机资本雄厚，往往出高价和米店竞争，每被抢购一空，致米店无货应市。米店为自救计，乃在米行召集米商会议，寻求对策，懂得人力加工的个体小本营业，不能和新兴资本雄厚的米机竞争，乃议决各米店合资经营米机，与之对抗。于是组成“均益”米机，是取利益均沾的意思。从此以后，就有致祥盛、时利和（后改为天民）、凤鸣、汇安昌、东和兴、民生、岐安、穗丰祥、泗和等12间米机相继出现。他们资本大的10万元以上，小的也5万元以上，因购置机器厂房，趸存稻谷，没有相当资本，不能周转运用。各家均有后台支持，其中均安隆得到澳商梁植卿补充资本和顺德大地主稻谷供应的优厚条件，业务最大，获利最丰。其次是岐安，它是石岐永安公司的华侨和港商合资开设的，资本和业务也很大。这两家的经营手段，各有千秋。

自从人力加工春米的米店合资组成均益米机后，米行万宝堂解体了。这时除米机自设门市零售外，其他经营白米零售的商店，资本少的向米机买米零售，资本大的自行购谷，交米机代碾，每百斤出白米一般是70斤，占米约68斤，玉糠约9斤，给回碾工1角8分，另大糠每担有18斤，约值1角。这时售米商店共有36家。1930年另行组织米业公会，米机和米店（这时的米店是售米的商店，与过去加工春米的米店不同）全体加入，名为“公盛行”，业务都相当稳定，很少歇闭。但在1945年战后这一二年间，米店开设过多，其最多时竟达160家。当时有一间新开业的米店，取名“有多”，是说米店“真有多”之意，一时市场上成为笑话。

至于解放前各区米机的分布情况是：第九区黄圃有2间，浪网沙1间，新涨沙1间，合共4间。第一区的渡头乡1间，恒美乡有良益1间，港口乡有常满、和丰隆2间，共有4间。第二区谿角乡有大丰、和平、恒益昌等3间，沙溪圩有穗生祥等2间，象角乡有大成等2间，龙头环乡有钜光、广丰隆等2间，涌边乡1间，横栏乡1间和大涌圩的大涌、安盛等3间共14间。第三区小榄有广丰、大成、永全等共6间。第四区濠头乡有兴记、协和兴等2间，小隐乡天成等2间，榄边圩1间，南朗圩1间，张家边合兴等2间，下栅乡同益等2间共有10间。第五区坦洲乡2间，雍陌乡1间，大布乡1间，三乡民生等2间，翠微乡恭都1间，神湾乡锦利隆、嘉穗等2间，古鹤乡1间，沙尾乡1间，共11间。第八区斗门圩1间。总计分布各区的米机约46间。连同石岐的12间，全县共有58间。但由于笔者手头材料所限，上述统计亦可能有遗忘的。（编者注：原文计算有误。根据文中的数据计算，分布各区的米机约50间，加上石岐的12间，全县共有62间。）

米机业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吸收社会游资，供其利用。在使用白银时，石岐大的行业向有发出凭单的信用，因数额大的交收，携带白银极不方便，故持款人每将现款存入有信誉的大商店，代为发出凭单，以便持单人随时兑现。每张凭单的面额，大者1000元、500元不等，少的亦有50元。没有利息，限两个月或

三个月提取，过期作废。当时均安隆的凭单，尤为地主、资本家所欢迎。流通至三、九区和江门。因江门也有均安隆米机，据说当时它一家发出的凭单，多至10万元。以一米机，得到没有利息的10万元现金供其再生产运用，其受益之大可想而知了。因此均安隆除在江门有一间同字号的米机外，还在广州开设德丰隆米机，在石岐全盘顶受迪光电灯所（其所报的营业牌照资本额为60万元），随后投资开设振兴胶鞋厂、香港青山砖厂以及在香港思豪酒店附了巨额的股份。至于其他米机，除时利和一家歇业，改为现时的天民米机外，亦均获厚利。

米机的经营大都以囤积居奇为主，故投机商人就大建粮仓，以供米机需要，最著名的有大有成和永安公司等几个粮仓。每个粮仓，都储谷几百万斤以上。存粮的仓单，可持向银业商店抵押借款。仓内每囤存谷7万斤，在当时可抵押借款2000元，约为谷价七成。在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侨的游资，大量流入，以在岐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业务最为活跃。因此刺激米机业的发展，也助长了米业资本家投机买卖，垄断居奇。民生所必需的粮食，操纵在米商的手上。

米机还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的剥削，主要是在农历三四月青黄不接时预购“禾花”。比如上造谷价每担约值5元，米商就以低于此价的10%——即四元五角预购，先给以半数的价款，待收割时即照约成交，此时谷价虽涨至六七元，农民亦不能起价。反之，如谷价低跌，米机也要照约成交。但起价的机会常多，跌价的机会绝少。即使因特殊情况跌价，米商也必拖延，务使农民割价就范，故受损失者，总在农民。

中山米机业发展最高峰的时期是在辛亥至战前的20余年间。但在1913年内曾发生7次台风，全县禾稻失收。1922至1923年间，也发生一次特大洪水灾害，全县禾田，多被浸没，这两年粮食，全部靠洋米入口。石岐米机由于无谷物供应，几全部停业。又1933年这个时期，谷米价大跌。谷价在乡间收购，百斤只值3元3毫，在石岐谷圩买卖，仅值4元而已。米价在石岐仅值5元，米机卖出白米，不特无利可图，有时反而蚀本。这年农村耕佃和

石岐米机、米店，也受到同样的打击。

至于全国抗战发生后，特别是沦陷期间，由于日军强征军谷，产粮区被封锁，农民也将谷物收藏，加以此时港澳粮食，也靠中山供给，军警和大天二以走运谷米赴港澳有大利可图，就凭借势力抢购谷米，走运出口，在这种情况下，石岐的米机业，遂全部停顿了。米机停业后，有的米机老板如李锡、李德联等也大做谷米走私出口勾当。

再说石岐沦陷后，因米价高涨，贩谷卖米有厚利可图，有的米商就千方百计派人赴农村高价收买，运岐应市。这种营运，多是小数量的，以肩挑背负、单车等分批运入，疏散收藏。而数量较大的，就要通过汉奸、日军等特务机关，领取运粮证。谷物到手，沿途还要受敌伪军警检查，勒索敲诈。不幸遇到收购军谷的汉奸，也会被恃势强买。所以大的米商，多裹足不前，只用少数人肩挑几十斤，分批运返石岐，以致粮食供应奇缺。后来竟弄到以厘戥称谷，数量以两为计算单位的惨状，最严重时竟用“钱”为计算单位。

（选自黄桂波、伍允成、黄栈等：《解放前中山县米业和米机业的情况》，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1989年印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山工人活动

□孙子仁

046

中山解放伊始，工运属石岐军管会民运科领导。该科科长是卢克诚同志（现我还保存着军管会及民改工作队的布胸章）。记得工运工作队成立后，驻扎在烟墩山上的原国民党党部礼堂。先是刘成器同志任工作队的领导，后为蔡华。

在中山解放后的第七天，县长谭桂明在四强酒家（即现孙文西路中山百货公司）主持召开大会，发动各工厂、各行业约 200 员工参加，大会着重宣传了党的政策。由于进城后，县的党、政领导都注意首先和工人见面，体现了党倚靠工人阶级和重视工人工作，十分得人心，对工人尤其鼓舞很大。

稍后，由于曾接过有关有匪徒想偷袭我们的情报，考虑到工运工作队住在烟墩山上不太安全，而且当时虽然都有枪配备，但在山上联系工人不方便，便搬到悦来大街一间大屋内（约现春晖托儿所附近）筹建县工会。解放后的第一任中山县工会主席是由县委副书记杨光兼任，副主席是蔡华。梁坚等 10 多位城市工作队的同志也在一起展开城市工作。1950 年 3 月，工会搬到仁山广场，即现中山纪念堂大门口右侧，工会主席是林模（兼任石岐镇委书记）。这时的县工会已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劳保福利部、仲裁部等。同年 5 月左右，又搬到孙文西路（烟墩山脚）现工商银行第二营业部对面办公，增设秘书长、女工部、青工部等，宿舍和广播站设在悦来上街中医院旧址处。俱乐部设在孙文西路旧邮电局旧址 2 楼，3 楼仍是电话所，工会由黄乐天领导。1951 年底，工会又搬到工人文化宫侧（原时理发站背后）办公。组织派郑吉、冯兰同志来领导，并正式成立石岐总工会。1952—1954 年初，县、市工会工作主要以民政工作为主，成立基层工会。县、市分家后，中山县工会由魏文忠领导，石岐市工会领导仍是郑吉。1956 年

县工会搬到孙文东路市场斜对面办公，直到 1958 年。

解放初期，工会在党直接领导及重视下，依靠工人，做了一些工作，起到了工会应有的作用：

一、组织发动工人保护工厂

解放前夕，我们组织发动工人护厂，防止破坏，继续生产。如电话所，在军事代表未正式进驻前，已派杨少余等团员进去，发动职员及技工保护通讯；在迪光电厂则注意做好稳定技术工人的工作，如高级技工陈宁等坚持看好机器，使发电机组运转正常。刚解放我们即在工人中串连发动，组织一些拥护党，在工人中有威望的积极分子，如迪光电厂的冯一初（后当选为工会不脱产的副主席），岐关公司石岐车站的郑松、杨绍仁（团员），店员冯留，海员陈能，米机工人汤金，印刷工人潘林，戏院职员高其峰，搬运工人黄新等，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在维持生产，团结工人，废除黄色工会（国民党时期的工会组织），组织自己的工会，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使解放后工厂、商店、码头等都能有序地正常运转。

二、废除黄色工会，成立自己的工会

解放前的工会，多为当时的政府或资本家所利用，他们害怕工会把工人团结起来，维护工人的利益。因而，想方设法破坏，多以行业工会分散工人力量，如一间米机的工人，都要以工种分工来加入行业工会：管理动力、有点技术的俗称大、二、三偈，斟油（即学徒）的，入机器工会；上落谷米的搬运工人入搬运工会；其他的入米机工会。这样，就把一间米机的工人分作三堆。我们以工会法为依据，25 人以上的工厂或单位，组织成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够 25 人的成立小组。有些行业分散的工人，如店员、建筑、教育等的则组织成立行业性的工会。各区镇成立了区镇工会办事处，领导该区镇工人组织。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如俱乐部、夜校、互相储金会等。

三、维持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防止资本家偷税、漏税和抽走资金，使工厂、商店不致倒闭，工人失业

县工会当时设置了福利部、仲裁部，发现有上述情况的，发动工人监督老板，个别的还进行斗争维护工人利益，很受工人欢

迎。对个别老板放弃厂店不理逃跑的,工会就组织工人生产自救。如当时有的米机、新广州饭店、油榨厂等都由工会借资金,维护生产营业。对偷税、漏税的个别不法资本家,协助税局,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发动起来的工人相当积极,表现出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

四、组织发动海员、船工配合石岐军管会车船管理处

为支持解放万山群岛,县工会在海员工会中成立一办事处,对有个别船主不愿去的,工人便积极说服。此外还动员工人参加抗美援朝,个别经批准参军,开赴朝鲜。

五、1950年初,在省总工会及珠江专署工会办事处具体领导下,县工会在受压迫较深、较苦的搬运工人中,展开民主改革

解放前石岐码头(即现岐江桥附近)及其他货物搬运,控制在以石岐罗梁馆(武术馆)教头为首的霸头手中,任意剥削和殴打工人。我们就发动工人与霸头作斗争。主要霸头闻风逃跑,去了澳门,其他经斗争后监督劳动。继而成立了工会。工人解放了,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劳动分段收费,分工合理,收费合理,分配也得到初步解决。这些做法得到省总工会肯定,并由我在全省工会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接着,我们在受压迫较深的如小榄搬运、小榄丝厂等组织工会,为工人争取了一些福利,争取了妇女权益。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彻底解放了。1952年,先后在小榄、黄圃、大岗(今属番禺)三镇进行各行各业的民主改革(简称民改),组织工会。民改于1953年下半年结束。1954年榨季,工会还配合县工业部接收海洲、古镇、永宁、红星、凤鸣等糖厂,糖厂由私营转为国营,组织工会,支持蔗农生产。

六、贯彻“工会法”和“劳动保障条例”,收取文教费,举办工人文化福利事业,甚得工人支持

具体是:

(1) 支持停业的工厂、商店的工人,进行生产自救,稳定社会。逐步贯彻《劳动保障条例》,工伤有医治,停业有遣散费,还开办如职工消费合作社等福利事业(社址在孙文西路现工商行第二

营业部)，稳定了人心。

(2) 开办工人俱乐部（即工人文化宫前身）。这是团结工人及工人活动的好地方。1950年下半年起，在孙文西路邮电局旧址2楼办俱乐部，3楼还是电话所。俱乐部设有图书室、棋类、乒乓球、麻雀牌等，星期六晚还组织工人跳交谊舞。随后小榄、黄圃、大岗也相继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3) 开设有线广播。广播站早初设在悦来上街（即中医院旧址）。当时受条件限制，播声机不外100瓦，带喇叭20个，麦克风是33D的。这些设备全都在澳门购买回来。线路架设最远到凤鸣路。小榄镇的广播设在俱乐部内，播声机25瓦，线路架设到新市街旧镇政府。当时工人听到自己组织的声音及国家大事，很是欢迎。

(4) 开办职工夜校。解放前，工人的文化程度很低。工会开办夜校，教工人学文化，这对提高工人素质及文化水平，培养基层干部很有成效。夜校校址在现工人文化宫对面的小巷里，教师有10多人。工会对该职工夜校工作十分重视。夜校一直坚持办了多年，规模也不小。小榄工会也办了夜校，教师也有六七人。此外，工会还与教育局联办职工扫盲班。

20世纪50年代初，工会支持了工人翻身，着着实实地为工人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工人亦当工会为自己的家，有什么问题（甚至个人的、家庭的）都会向工会反映，真正发挥了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纽带的作用，体现党真真正正地具体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一面。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期，题目有改动）

延伸阅读

难忘文化宫欢欣岁月

□陈慧

050

孙文西路44号的中山市工人文化宫，经历50多年的风雨后，至今仍十分艳丽。敞厅式门楼，有着如宫殿般的大屋顶，覆盖着绿色琉璃瓦。5根水磨圆柱，穿越门廊顶部直上2楼，双屋莲花座。门廊上青绿彩画的阑额，绘有花枝草蔓的雀替。“天下工人是一家”的蓝色艺术字体围绕着每一盏吸顶灯，2楼悬挂着4个鲜红大灯笼。

数以千计的人义务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有钱有闲阶级”的人上戏院、泡茶楼；“没钱也没闲”的工人们，却几乎没娱乐。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工人黄海，13岁起就在建筑行业当学徒，给工地搬材料，碗口那么粗的杉木，一次就能扛5根。每天天亮开始干活，天黑才放工，却没有工资，只能混两餐填饱肚子。娱乐，那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山县就准备建一座工人文化宫。当时，全省除了广州外，其他县级市尚未有一个专门为工人娱乐活动而建的场馆。这个消息一出，工人们都很兴奋。

1953年筹备工作启动，政府拨款不够预算的消息传开后，意外情形出现了：建筑工人愿意只收一半工资，其他工人则愿意用业余时间、自带工具帮忙建设文化宫。

在建筑部门担任工程师的黎宏耀曾义务为工人文化宫做建筑设计。年幼的儿子黎永平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只记得爸爸专门去外地买来许多古建筑书籍资料，一次就能花掉全家一个月的收入。至今那些印在金灿灿阑额、雀替上的建筑纹饰图，还被父亲精心保存在大铁箱里。

1954年，设计图纸完成，工人文化宫正式破土兴建。建筑

用地上有一座黄泥小山需要铲平，工人们争着前来义务挑黄泥；为了节省地基用的碎石，一些人自发在街头巷尾捡碎砖头；还有人用大板车到郊区一车一车地拉回建筑用的砂土；一些工厂则主动派出运输车协助去外地买建材……

黄海的儿子，当时只是七八岁的阿星也加入了“战斗”。一有空，他就跑到工地上跟着大人们干活。人小力气小，干不了重活，他就坐在地上，用破布包住半块砂轮帮忙打磨台阶。一座“缺衣少食”的建筑物，就在工人不断的奉献中日渐磨出了漂亮的轮廓。

当时黄海是石岐建筑工会主席，经他登记在册，愿意来帮助建设工人文化宫的流动工人，数以千计。黄海还兼任调配工人的“指挥员”。将自愿前来建设的工人们每日排班，轮流参加。有许多建筑工人不仅只拿一半工资，而且把自己在外私营的活也推了，整日为工人文化宫工作。

数以千计的中山工人，争相为建设“自己的家”来到这里；又以工人阶级特有的组织纪律性，紧张而有序地叠加着力量。仅一年时间，中山县工人文化宫就建成了，成为全省首个县市工人文化宫。

几百工人做“志愿管理者” 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人文化宫已经设有“五场六室”13个活动场地，每周开放4个晚上。凡拥有工会会员证或家属证的，都可免费进入，其他人也可以购票入内。但当时文化宫只有8位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承担3种以上工作，忙不过来。于是，许多工人“志愿管理者”悄然产生了。泥水工、纠察队、还有看溜冰场的等，加起来有过百人。1954年建成后，黄海就经常在文化宫里见到义务服务的人。中山人的主人翁意识在建成后的工人文化宫中，仍显示着它的力量。

退休泥水匠夏桃，他当时已经是花甲之年，但总是提着一个小水泥桶在文化宫里溜达，看到墙角裂了，他就马上和点水泥，抬张梯子过去，爬上去补，忙完后不声不响地离开。一些门窗、屋顶的大维修，宫里的管理人员也不用操心。与老夏一样的泥水建筑工人几十个，都定期来巡视一番。有需要修的时候，一招呼就能来一群人，就算是上房揭瓦也不消一日就能搞定。

有技术的出技术,没有的就出体力,帮忙打扫卫生、烧茶水等。据黄海回忆,当时有一名叫王康的工人,他组织的“纠察队”就有60人。这个队伍自动排班,每天晚上派出几个人在正门口查票。当时进来要出示工作证,没有证件的要购票,有时一晚两三千人,我们的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够,纠察队帮上了大忙。

工人们将自身特有的纪律性、合作性都充分激发了出来。这种“志愿管理者”的服务形式,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自觉地爱护着文化宫的一草一木。

虽然有众多“志愿者”的帮忙,但当时工人文化宫仍然很拮据。据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史料显示:为了节省经费,工作人员将宣传用的红布横幅改做窗帘、宣传用的画纸用完一面,翻过来再用;康乐场的玩具破旧了,工人们利用废料,做成木马。

曾经是溜冰队员的阿星,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溜冰场还是木栏杆,很容易坏。工作人员从氮肥厂购回废水管,一条条硬生生地折成弯曲状。然后请氮肥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烧焊、安装成铁栏杆。8位专职工作人员同样如“志愿管理者”般全身心地爱护这座“自己”的家园。

引来文体活动汨汨源泉 黄海离开了工人文化宫多年,但许多离开中山或出国的老朋友,在来信中还会顺带问一下,旧日的工人文化宫怎样了。因为这里不仅是老一辈工人亲手建起来的“宫殿”,也是他们青年时期最快乐时光的承载物。

工人文化宫内有乒乓球室、篮球场、图书室、棋艺室、溜冰场、茶座,还拥有1000多个座位的大剧场,可以放电影,也可以演粤剧。有时一个晚上接待来文化宫活动的工会会员、职工家属超过2000人次。

各种文体活动陆续找到了自己的“家”。石岐业余国乐演奏者邓耀、李国新、关沃、孙路总在工人文化宫表演,被称为“四大天王”,还曾赴京表演,获周恩来总理接见;篮球队的男女队都在佛山地区工人比赛中获得冠军;溜冰场还有分成3个梯队的表演队……许多体育苗子,就在工人文化宫中展露头角。世界冠军江嘉良,小时候放学途经工人文化宫,便会爬到窗台上,探

着身子，看别人打球。那时的乒乓球室就在进正门的左手边。在父亲的带领下，江嘉良迷上了乒乓球。

据阿星回忆：“那时的‘世界冠军’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还流着鼻涕，可凌厉的球风已让人震惊。我们和他对打，几乎都不能超过一两个回合。若他开球，一拍就把你杀下来。”

在建成后的二三十年间，工人文化宫一直成为中山文体活动的引领者。当年的文艺青年郑永同，至今相册里还保留着一张20世纪80年代文化宫舞厅照片，清晰显示出有着漂亮花纹的地砖、飞转的吊扇、有靠背的木椅，以及正在翩翩起舞的几对男女。据郑永同回忆，“相片里其中一对，就是我和姐姐。我们喜欢跳较为轻松的快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大学生已是舞厅的“拥趸”。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种音乐茶座陆续出现、各种体育设施的增设，工人文化宫才结束了晚晚“爆满”的盛况。

“文化大革命”之后，工人文化宫的舞厅依然受到许多文艺知识分子的喜爱。虽然没有空调、沙发、彩灯，但相片中的人们却笑得轻松灿烂。悠扬的乐声中，工人们享受着“国家主人”的欢欣与力量。工人文化宫成为一座精神的宫殿，陪伴着中山的工人从农业社会走进工业社会。

（选自陈慧：《难忘文化宫欢欣岁月》，刘秀莲主编：《文脉相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军管时期的船车管理处

□关哲

054

中山解放后，石岐市军管会成立了船车管理处，直属交通科领导。船车管理处位于岐江岸畔，由交通科第三军事代表关哲及杨赞光等组成，负责石岐船车管理及整治交通秩序的工作。

当时由于解放大军正准备解放中山沿海的万山群岛等岛屿，需要征用大批船只载运战士及后勤补给，因而紧急支前的任务非常突出。在人手少及无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制订了船舶管理条例和办法。1949年12月6日，石岐市军管会颁布了《船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航行本市的电扒、电船、汽船、拖渡均须持广东航政局或江门航政处之通航证方准向本会船车管理处申请航行”。我们对船舶出入实行登记，离岸要经批准，签发通行证才能放行。征用船舶则实行由管理处负责供应燃料和优先减免再征等办法。由于中共及解放军威信极高，这些条例的实施都较为顺利。但也有个别船只于军运任务繁重时，在半夜偷渡。当时由于没有足够力量设立全天性检查岗哨，我们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在解放万山群岛前夕的一个晚上，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派王参谋通知我前去商谈支前问题。曾生司令员首先向我了解了船车管理处的情况，然后交给我一个任务。他说要我于次日征用能载运若干战士及物资的船只，但没有明确征用期限，并问我有无困难及需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十分兴奋，高层领导亲自过问和交代任务，显示出事情的重要与急迫，能有机会直接为解放沿海岛屿出力是十分光荣的，即使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努力去克服。我当即向首长保证要努力完成任务，并提出需依靠部队帮助的两点意见：一是加强密切联系；二是帮助设岗检查，以防被征船只偷逃及破坏。曾生司令员爽快地答应了，同意派一个连帮助设立岗哨，并派王参谋与曹参谋（两人均为营级干部）来协助我指挥。一直困

扰着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第二天一早，船车管理处发出了征用船只的通知。我心里明白，这将会遇到很多困难：能否找到足够出海吨位的船只？应征船主的态度怎么样？怎样使他们同意与我们合作？如何开好头，树立榜样，使下一次征用工作能顺利进行？我自己是学生出身参加革命的，平时自命清高，鄙视资本家唯利是图，但这次面对的正是这些船商。回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我想经过团结教育，船商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带着通知立即找到石岐市工商联高会长商量，请他协助做好征用商船的工作。接着，找到可以被征用的花尾大渡（可能是悦来号，来往港澳）的船主，向他交待支前任务及征用办法，希望他通力合作，完成任务，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开始他不太愿意，怕船只损坏和沉没，提出需负担船只保养维修费与员工工资等，费用颇庞大。我向他说明支援前线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征用是不可动摇的。燃料费用由船车管理处负责，此次征用后可优先减免下一次征用，做到公开、公平、合理。经过反复说明，他同意了，并且配合得不错。完成任务后，他专门找我谈及此事。他的船只损坏不大，但费用负担不少。开了个好头之后，我们按此办法顺利完成了支前任务。

岐江是通往珠江口的一条重要水道。由于有解放军帮助设立岗哨，加强了管理，同时通过教育，船只半夜偷逃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一天，突然有艘大炮舰沿江南下，岸边陆军岗哨因该舰未持有放行通行证，不予放行。双方对峙着，形势极度紧张。当时连长急忙前来报告请示。我当即奔向事发地点，看到舰只挂有五星红旗，舰上的海军是北方人，穿黑色衣服。通过对话，得知他们属海军部队，我们立刻准予放行。之后，我们和王、曹参谋商量决定：凡是海军，一律让其自由通行。

在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下，船车管理处同志同心合力做好统战工作，与工商联协作，团结船商，减少阻力，完成支前任务，并依靠解放军管理好水上交通秩序，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选自《中山党史》2006年第1期）

延伸阅读

解放前广州石岐线的航务

□卢坤 洪奇

056

中山县濒临海洋，河道纵横，四通八达，水运交通便利。故货物产品的交流、运输频繁。19世纪50年代，即清光绪二十年前，石岐和各乡的来往交通，有一种称为“圩艇”，每隔三天的圩期，来往一次。和广州、佛山、江门的交通，是体积大的木船，称为“乡渡”。均是悬挂风帆，借风航行，没有风时靠人力撑篙划桨。水浅处须登岸牵缆，傍岸而行。故载量不多，行动缓慢。嗣后发展到为车渡。它的体积比较大，行动也省力快捷些，但载运客货有限，如有大量货物，要由货主另雇专船搬运。故当时航运交通，尚多困难。

辛亥革命后，有了火轮船拖渡，而且有了定期的航行。各线的航运就有进一步的发展。航行县外的有广州渡、肇庆渡、佛山渡、江门渡、官山渡、高明渡、容良渡、香港渡、澳门渡等。县内的有小榄渡、黄圃渡、茅湾渡、坦洲渡、斗门渡、南水渡等。交通频繁，帆樯互映，极一时之盛。各线航运，以广州和香港两线为主要，现将这广州线的交通概况忆述如下：

广州是广东省会，和中山的关系甚大，故客货来往，比其他航路尤多。光绪初年，有洪晋佳和兄弟瑞洲、卓廷等联同伙友数人，合资300两，开设木渡一艘，承接商店托购和带运货物，并接载旅客来往。这种木船称为桅棒船，往来一次，动辄数天。旅客只铺一草席于船舱里，随意坐卧，极为局促。沿途所经各地，均须由船员下水登岸，牵缆拖船前进。后来赚了钱就改名为“和合渡”。仍无定期开行，只在开行之前，定了日期，预贴广告，以为招徕，也无码头湾泊。在石岐时，停泊在现时长堤尾河面，在广州泊在沙基街涌口。

这条航线，后来称为中省线，即由石岐开行，经张溪、港口、白花头、横迳、裕安围、沽埗、横沥、小榄、莺哥咀转入顺德县境的大角、二角、桂洲海尾、容奇、曹鱼石、小黄圃、板沙尾、李家沙、磨砖头、火烧头、河滘、紫坭、半步、碧江、三桂、陈村、韦冲、勒竹、东爪垄、陈头、石壁、龟脊礁、深涌转入南海县属的三山、大尾、南石头到达广州，全程 100 多海里。由于经过 39 处地区，均需停船，时间极受阻滞。如不停船伺候乘客，很容易触怒恶人，受到当地封建势力的压迫，挟嫌报怨迫害。而所经之白花头、莺哥咀、桂洲海尾、磨刀头、龟脊礁各地，又为盗匪盘踞出没之区，地势险要荒僻，时有被劫之虞。

自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广州开辟为通商口岸，货运骤增，小货轮拖带木船，成为一新兴事业。当时有一外省人马竹若，是陈村纸厂的当事人，他见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乃集资在广州开设了一艘永生单行，来往广州石岐，为广招徕，后改为“洪昌渡”，雇一艘名为发利的火船拖带。而洪晋佳等所开的和合渡也广集资本，雇一艘名为富顺的火船拖带，互相竞争。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妥协，各分双单日开行。这是广中线火船拖渡的确矢。而这种渡船，要向政府纳捐税，故又称为“饷渡”。因行动快捷，来往客货日多，两渡连年获利。但船上设备简陋，座位凌乱，旅客已多不满。有一次石岐一个香港富商邓简的儿子名邓耀黎者搭渡，因船员招呼不好，他发脾气指责船上秩序和设备，船员回答一句：“你想舒适，自己开一只呀”。邓耀黎认为受到侮辱，同时也觉得航运事业大可获利，返岐后，即用巨款购置两艘火船，名为赛星、赛电，新装花尾渡两艘，名为鸿兴、鸿安。与洪昌、和合两渡竞争，互相减收船票价，甚至不收船费，以争夺生意，招引搭客，因此双方损失甚巨。后来由和合渡的司理洪瑞洲提出和解，互相合作，改为永和公司，重新装置两艘花尾渡，名为信昌、信恒。船上设备较为舒适，管理也渐完善，船上座位分为餐楼、账房、大舱三级，餐楼还有几间小房，专有钱的客人妇女之用，另加收房租。餐楼摆设帆布椅五六十座位，账房、大舱则设铺草席在船板上坐卧。餐楼客人有茶一盅全天供应，也有水洗漱，另收费 2 毫。大舱客

每天只在开饭时供应茶水一次，用一木桶载着，由客人自己带自备的杯取饮，不另收费。供应早餐，可以由旅客点菜。每天于凌晨三四时开行，下午4时左右到达，每次航程约12小时，倘冬天水涸或潮退搁浅，就会阻延到入夜时，始能到埗。又以陈村和港口外白花头两处最为淤塞，常常受搁浅。故渡船要乘潮涨时抢渡，否则潮退被阻，就会被土匪乘机劫掠。

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内民族工商业有了发展，当时石岐商会会长曾凤俦，见到商店货运日增，渡船对货物运费收入甚巨，就心痒起来。借辞航商收价过高，向商场提议开设新渡，以集小股为大股的办法，每间商店都有附股，遂以兴发公司名义开设同兴、同发两艘花尾渡，与永和公司竞争，斗争了21个月，又商妥合作，每一个公司开一只渡，永和公司开信昌渡，兴发公司开同兴渡。这是航业兴盛之期，以后逐步踏入厄运了。

（整理自卢坤、洪奇：《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县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3辑，1965年印行。）

中山人民医院首例外科手术

□杨悦生

059

自古以来，中山防治疾病，历来都是用中医、草医、针灸等办法。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山才有西医、西药。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对西医药欠缺了解和认识，一听说西医要打针、要开刀就害怕。而在西医医生群中也流传着“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的说法，主要是担心法官不懂医疗事故的甄别，道听途说，容易被冤枉入狱。所以，解放前个体开业的西医师从来不敢开展外科手术，即使解放前的中山县卫生院、中山县平民医院及设备较好的侨立医院的西医师们也不敢开展外科手术。

中山解放后，军代表、中山县卫生科代理科长余潜九医师要求西医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胆开展工作。在副院长程观树的支持配合下，合力开展普通外科手术，首先从腹部最容易的疝气手术着手，逐渐开展腹部手术。

1950年7月下旬，来了一位17岁的青年病人，右侧腹股沟疝气需要修补。外科医师梁其霖请示程观树副院长。程院长为了慎重起见，请了当年在石岐大庙下开设私人铁城医院的李宝铿医生前来会诊。会诊后，一致认为该患者疝气可以修补。同年8月3日，手术开始了，主刀李宝铿，第一助手程观树，第二助手梁其霖，司械护士吴洁贞，还有麻醉的、测血压的、数脉搏的、消毒的几位护士等。

手术时是用全麻，使用乙醚后患者反复叫“一、二、三”就睡着了。术毕还安排几位特护轮值护理。手术顺利的消息传出后，医院全体医护人员都增强了信心，开始逐步实施腹部的其他手术。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得到国内外同胞大力支持，尤其是石岐南门杨氏家族，如杨志云先生等香港同胞带头捐赠巨额资金，进口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医疗器械，外科手术已从1950年首例

疝气修补术、阑尾切除术，1958 年胃、胆手术，发展到近年的开颅手术、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肝脏移植、肾脏移植。医院的技术进步又何止一日千里呢！

（选自《中山党史》2006 年第 1 期）

延伸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事业的进步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061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县委、县政府重视人民医疗保健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卫生事业。1950年6月15日，中山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第一届卫生会议，强调卫生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大量工作需要医务人员去开展。会议号召全体医务工作者，响应政府号召，加强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加强中西医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协力，为推动中山城乡卫生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新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山县卫生部门开始在城镇、乡村建立起卫生组织，培养医药卫生人员。至1952年底，先后建立了中山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所，以及区卫生所2所、妇幼保健站2所；省卫生部门在中山举办医士专业班、护士专业班、中医进修班、护理员班，培养中山学员267人；对乡村接生员普遍进行了提高性培训；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大大降低农村产妇产褥热和婴儿破伤风死亡的病例。

县、区两级政府增设公共卫生工作部门，广泛开展天花、霍乱、伤寒、白喉等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工作，接种人次达79.63万。有效控制这类传染病的传播。此外，鉴于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全县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县至区建立起卫生群众组织，共培训卫生员2450名；各城镇、乡村整治环境，消灭蚊子、臭虫、老鼠、苍蝇，其中恒美、下栅、大环、前山、港口、三灶、斗门、小榄、沙溪等墟镇清理垃圾、渠泥近1500吨，疏通渠道17条，改善、新建公共厕所49座，改良水井25口，整个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后，中山县委、县政府根据新形势，提出今后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县、区中心医院建设，集中医疗技术力量，提高医疗水平；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大的疾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农村保健卫生工作。

为了改变医药卫生界过去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1955年9月，中山县召开首届中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84人，举办中医医药展览会，系统地介绍祖国医学的伟大成就和发展概况，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祖国的医学遗产，建立和巩固中西医之间互相尊重的团结关系，共同推进中山卫生事业的发展。经过努力，全县形成中西医积极合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良好局面。

战斗在筹粮支前中

□司徒洪

1950年5月25日，我人民解放军向珠江口一带的岛屿发起了总攻势，很快解放了伶仃、万山、桂山、担杆等大小岛屿。到8月4日止，珠江口一带岛屿全部被我军占领。

我们支部的支部书记肖来（编者注：疑为廖来。司徒洪在《扑灭暴乱记》《珠江口的一场歼敌战——记陈十顷、七、八、九冲反革命武装暴乱被扑灭经过》两篇文章中，多次提到廖来，而不见肖来的名字。下同。）也参加了平定暴乱。于是在平息陈十顷暴乱不久，我们召开党支部会议，让肖来同志介绍了他在陈十顷与暴乱分子战斗的过程。他说：“我当时虽然受了伤，子弹、手榴弹也差不多打完，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誓死不向敌人投降。匪徒们多次冲上来都被我打退了。当时我想，如果敌人攻上楼来，我就拉响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毛主席教导我们：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死，比泰山还重。我虽然一人与匪徒们作战，但我毫不畏惧。”

肖来同志这番话，给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很大教育。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不怕牺牲，将宝贵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

两广纵队一团通报表扬肖来同志的英勇事迹，并授予他立功受奖。

但当时我们支部上出现了问题，在陈十顷暴乱以后，有一个共产党员，不请假，也未经批准，私自逃回家乡，而且把一支“三八”步枪留在沙仔，后被陈铿章同志拾回。出现了逃兵，证明我们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

国民党的残匪和地主、“大天二”发动的武装暴乱失败以后，他们又另有一套阴谋诡计。他们知道“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

的道理，于是他们派人混入我基层队伍，作长期潜伏，等候时机。1949年10月，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等向珠江口退却时，曾有一股残匪经安平乡冯马庙，他们留下一批武器给当地“民利公司”中队长谭秉恒，解放后谭逃去澳门，将那批武器交给其弟谭满收藏。1950年春节后，谭满偷渡去澳门见其兄谭秉恒时，谭秉恒叫谭满千万不要把枪支交出来，留作“反攻大陆”之用。谭满回来后，于1950年3月间，假装积极，帮助冯马庙筹粮工作队计数，不要报酬，得到了工作队黄锋同志信任，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后来冯马庙成立农会时，谭满被选为农会主席，掌握农会大权。1950年5月，当地自身人员揭发他收藏大批枪支，并在他的房屋旁边的蕉树底下取出了他藏的一批武器。计有：轻机1挺、冲锋枪4支、卡宾2支、七九步枪10多支，以及各种子弹数千发。这批武器用凡士林密封，取出来后，马上可以用。最后司法机关将谭满逮捕，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敌人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

事后冯马庙乡乡长冯根二感慨地说：“真估计不到谭满是敌人埋在我基层农会的定时炸弹。”事实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我们在改变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了我们主观世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阶级间的矛盾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而消灭。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要用唯物史观去分析事物，认清其本质，才不会上当受骗。

到1950年7月，我们筹粮支前工作告一段落，全乡共计筹到粮食600多万斤，另马草（禾秆）20船，胜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粮、草任务。我们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我们安平乡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作队同志，在党支部和上级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依靠驻军的支持，我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最后胜利。

不久，两广纵队一团奉命北撤，开赴抗美援朝前线，部队的党员同志归队，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安平乡临时党支部解散。我们地方党员留在当地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八字运动。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 50 年了，当年我们是年轻力壮，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而今两鬓皆霜，老矣！但回想当年在安平乡搞筹粮支前工作的斗争，一桩桩活生生的事实，好像历历如在眼前。回忆过去，不会虚度年华为党工作劳心尽力而自慰；看今天，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笑逐颜开。

时代在前进，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普遍存在的阶级矛盾，今天却转化了；现在我们现实社会只存在阶层，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每个老同志要不断学习，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新形势。

（选自《中山党史》2004 年第 1 期）

延伸阅读

筹粮工作片段

□关震光

066

1949 年底，中山县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但珠江口万山群岛一带仍未解放，前线部队要粮，城市缺粮。广东省支前司令部林平司令员紧急部署组织筹粮督导队，到各地区抽查督促筹粮工作。我有幸被抽调到筹粮督导队，安排到珠江地区，林伟干当队长，全队共有 10 多位同志。出发前，司令部统筹处处长张清举给我们布置任务后，省军管会派船配一个武装班护送，同船还有前往珠江地委任职宣传部长的梁奇达。

当时的珠江地委专署设在中山石岐。我们到达中山石岐后，地委副书记杨康华、刘向东分别接洽了我们，给我们介绍了珠江地区 8 个县的情况，并建议我们先到中山，说晚稻收割不久，估计中山的筹粮工作难度不太大。我们按照地委领导的意见，即前往中山县政府和谭桂明县长见了面，传达了省支前司令部筹粮任务。谭县长当即表态，虽新政权刚刚建立，粮食还未到手，但明白到筹粮任务紧迫、责任重大，表示要立即组织工作队下基层。随后，县委领导分工杨光在一区长洲乡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在办班期间，谭县长多次前来。我们督导队也参加了训练班。队长林伟干安排我们编了几个工作组，留一部分人员在面上督导工作，其余的和地方工作队一起深入基层筹粮去。我被分配到九区安平乡。

我们到了基层后，立即开展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落实筹粮任务。当时虽然晚稻刚收割不久，但粮食都掌握在地主恶霸手里，在工作队未进村前，不少粮食已转移了。就是留在耕馆、围口、地坪的粮食，他们还千方百计进行争夺。曾出现白天我们刚核实了打好晒干的任务粮，他们就趁着晚上运走了，待第二天我们派船到围口、地坪时，粮食已经没有了。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

工作队随船一块到现场，将一批谷晒干，就即过秤落船，这才收到效果。

想当年，筹粮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我们省派出的督导队不做钦差做实事，和地方同志一起发扬了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在中山全县筹到大批粮食，及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及城市人民粮食供应。与此同时，通过筹粮，锻炼造就了一大批县区干部骨干。

（选自关震光：《筹粮工作片段》，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建国初期中山若干历史问题回顾》，2004年印行。）

三角乡的筹粮工作

□周森

1949年11月，九区人民政府筹备处主任梁泰猷委袁煜煊为三角乡筹粮办事处主任，周森为筹粮员。但不到半个月，筹粮工作还未开展，又下令免去袁煜煊的主任职务，改任周森为主任。参加筹粮工作的还有竹围村的地方干部吴添科同志。

筹粮工作刚开始，中共中山县委派来了筹粮工作队，队长卢筱玲（女），曾在东江纵队宣传队工作，不仅领导能力强，口才了得，作风泼辣，还有群众运动经验，我对她很敬佩。她比我年长两三岁，故我尊称她为卢大姐。队员有：黄志明、何少昂、林潮、严锦亨、林国青（女）等。他们都是香港达德学院等大专学校的进步学生，有学识和才能。黄志明原是“马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经受过革命锻炼，由中共南方局派到中山，再由中山安排来三角搞筹粮工作。此外，驻三角乡的两广纵队一团也派出张萱、黄玉莹（女）等3名解放军战士协助地方工作。虽然领导关系有点复杂，但我们互相尊重，团结合作，关系很融洽。

筹粮办事处设在南安村社学，工作人员每日两餐在小学饭堂搭食，住宿则地方干部回家，军队干部回营房，工作队统一住在学校。我为了联系方便，也把被铺搬到学校来，与工作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完全打成一片，成为工作队中的一员。

筹粮办事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筹粮，这次是一项临时性的借粮活动。我们工作队进乡后，即深入各村，与贫、雇农交朋友，摸清全乡户数、人数和田亩数，以及土地占有者及其剥削等情况，并内部将应借粮的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地主（含以转批耕地为主的二路地主）；二是富裕农民；三是自耕自给性的农民。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分别召开乡保长会议、贫雇农会议、群众大会，宣传筹粮工作对支援前线，促进全国解放的重大意义，号召负有借

粮任务的农户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翻身的大业。

九区给三角乡的任务是 100 万斤。我们制订的借粮方案基本上是按上述农户的田亩摊分，每亩计算：地主 70 斤，富裕农民 62.5 斤，自耕自给的农民 52.5 斤，贫农原则不借，个别户代地主借 45 斤。方案制订后，向地方干部、农会骨干征求意见，各村召开贫雇农大会进行民主评议，自耕自给的农民中少数确有实际困难的当场评定减或免，对地主、富裕农民有提出要减免的待调查后再审定。在评定借粮数这项工作中，我们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动员梁应交出其已故胞兄梁同波掌握用以收取“自卫费”的田亩册作依据，使民国时期瞒报的“黑田”也无所遁形；二是贫雇农尤其是农会中的骨干在民主评议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各户任务评定后即出榜公布并发通知书到户，要求限期完成。大多数农户都自觉交纳。对顽固抗、拖的大地主叶定邦、罗寿二人及时进行拘留，促其转变态度，次日便完成借粮任务，观望者也不再观望了。

当时，我们与万昌杂货店协商，指定由万昌杂货店按规定的粮价负责收购粮食进仓，由筹粮办事处支付仓租和中转费。操作过程很顺利，双方没有发生矛盾和争执，都信守和执行协议的规定。

三角乡于 1950 年 1 月底便超额完成全乡筹粮任务。全乡共完成筹粮（谷）1102839 斤。此外，还按照上级要求，代“支前”指挥所调拨支前粮谷，对贫困农民发放农贷，慰问和抚恤烈士家属等。其中，代“支前”指挥所调拨支前粮谷 3380 斤；共发放农贷 19745 斤谷；抚恤林炽晃烈士家属 150 斤谷。

筹粮工作刚告一段落，队长卢筱玲调走，工作队队长由周森兼任。2 月底，只留下周森、何少昂两人，其余工作队员全部调出另行分配工作。5 月 20 日，周森调到中共九区工委主管新青团工作，只留下何少昂同志在三角乡工作。

（选自《中山党史》2003 年第 2—3 期）

延伸阅读

超额完成借粮支前任务

□区英伟

070

1949年12月下旬，三区区委政府根据县支前指挥部的指示成立支前指挥所，并组织6个支前工作队，即：民生工作队、复兴工作队、东海工作队、西海工作队、小榄工作队、邦平工作队（今古镇镇辖区）。工作队员来自华南分局、省、地区、县、区、乡干部，队长由区团委书记张克明负责。区英伟时任海洲党、团支部书记，任副队长，主管海洲乡工作。工作队除省来的李荣、沈吟秋等外，本地的有欧显宏、郭如明、欧银卿、袁中朝（袁是从区中队抽来专门负责押运粮食代金的）；古镇有苏标、邓沾培；曹步有吴明立、崔社旺等参加工作队。

当时在农村，中共党组织还未公开，乡政权也未建立。旧乡政权虽已被接管，但日常乡务工作还要他们做。社会治安还很混乱，土匪不断出现，烟赌林立；群众情绪仍未稳定，生活还很困难；乡中上层人物看不起我们。但我们有信心配合工作队完成任务。我们工作缺乏经验，就边做边学，且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党团员为骨干，还有一批参加过“起义军”的群众作基础，加上贫苦农民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在经济上，海洲小乡在邦平乡中是较富裕的：有8间糖厂，其中两间有附设粮食加工；还有4个农场，全乡土地大部分集中到这里，还有不少在本区乡或到外地经商的。按人口土地，海洲占邦平乡的三分之一，古镇多些，曹步少些，海洲在中。上级分给我们的任务是：邦平乡40万公斤，海洲占了20万公斤。因是经济作物区，只能折算交代金。面对时间短、任务重，我们工作队是这样开展工作的。

一、坚决依靠当地党、团员骨干及解放前参加党领导的三区

武装的外围组织起义军。我们依靠这支队伍作为骨干力量，在深入开展发动广大贫苦农民掌握各阶层思想动向，摸底排队确定借粮对象，任务下达后上门催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分配任务时抓大户。在海洲邦平全乡 2500 多户，而有借粮任务的只有 200 多户。贫雇农无分任务，中农的任务也极少。富裕中农以上才分给任务，基本上都是后来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那一部分人来负担。但古镇、曹步没有海洲这样的条件，因此一般中农也要分些任务。这样，90% 以上的农民和我们一起来做工作，完成这项任务。

三、认真做好统战工作。我们通过做好个别上层人物工作，让他带头认借并做其他上层人物工作。我们选择了海洲的魏永怡，他是大地主，这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曾在魏邦平处任过职，比较投机，也比较开明一些。小榄刚解放，他就在本村（麒麟村）送给贫苦农民一户一条农艇，这些受惠者对他很有好感。他在全乡上层人物中较有威信，因此我们把分配给他的任务先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表示同意，我们就请他在全乡借粮大会上带头认借，号召各大户踊跃认借。这次会议，就认借了我们任务的 70% 多，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我们召开乡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乡政府时，还请魏永怡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

四、充分利用旧基层人员去做工作。任务下达后，要完成入库，工作仍很艰巨。要逐户发通知，逐户催收，除了我们工作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外，旧基层的乡、保长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熟悉情况，各借粮户的家底住地都很清楚，且不少人还听他们的。我们召集他们开会，讲清借粮的重要意义，公布任务，号召他们做好工作，将功补过，将功赎罪。同时在工作过程中，做得好的就表扬，不好的就严厉批评。总的来说，利用这些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绝大多数人表现都比较好。但也有极个别像原副乡长袁毅文整天吹鸦片不做工作，我们批评他改变也不大。

五、制止破坏借粮工作的不法分子。任务下达后，有个别大户不愿意借粮，但自己不出头，却怂恿其子女到工作队驻地闹事，如袁社棠（土改时划为恶霸地主被处决）利用他在广州读大学的

儿子袁国章，纠集一批在广州等地读书的学生到工作队驻地海洲民教馆大吵大闹，质问工作队：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叫你们来借粮，为什么有些人要借这么多，有些人借这么少，有些人不用借等等。工作队沈吟秋耐心地一一向他们解释，并批评他们某些不正确态度和言论。他们不敢再大吵大闹，但很不服气，回去后排练话剧，在春节前借演戏来讽刺我们，其中有一幕戏用道具搭一个伪区公所，门口两边写一副对联，上联是“铲尽地皮除旧岁”，下联是“刮完粮草过新年”。难道伪区公所人员会讲自己铲地皮刮粮草吗？分明是讽刺我们工作队，破坏借粮工作。我们准备找他们负责这幕戏的人谈话，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全部离开海洲。我们分析这些人翻不了大浪，就不再跟他们纠缠了。又如袁宗恩（土改时划为恶霸大地主），是我的堂舅公，开大户会议时故意不亲自参加，只派代表，接任务后，又不愿借粮。我带了几个民兵积极分子到他开办的海洲协和隆糖厂催他交粮。起初他不想见我，我便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一看见我就破口大骂：“你个屁股碌柚叶水也未干（意思是乳臭未干的婴儿。因当地农村小孩出生满月要用碌柚叶煮水洗屁股及全身），以前我家里筷子都给你吃尖了（意思是我在他家吃过很多饭）。”因我孩童时代，逢年过节，我祖母回娘家拜年送礼时，一定带我们去，但我记得没在他家吃过饭，因一去就是十几户人，多数在我亲舅公处吃饭。我理直气壮地驳斥他：你有钱，我们穷，但我们并没得过你一点好处。你有田地和农场，我无工作，只去你那里做了一天，你就以我无力为借口，第二天就不让我开工；我没饭吃想卖梔花给你，你怕我没梔交给你又不和我买；我们没地耕想叫你租点地给我耕，你怕我们没租交不批给我们耕。但我现在不是以个人恩怨来催你交粮，我是代表政府代表我们工作队来催你交粮，我警告你一定要答应几天交完粮，否则立刻带你回工作队队部。他看情况不妙，害怕我们抓他，只好答应几天交完。这事很快在全乡传开，不少群众讲区英伟是行的，对舅公都敢撕破面皮。给群众和工作队的鼓舞很大，抱观望期待的借粮户消除思想顾虑，对个别顽固分子是一个打击。

入库进度加快了。同时，我们对个别由于摸底不清而任务有过轻过重的都做了适当调整。很快，全乡借粮任务就超额完成。这对古镇、曹步也有很大的推动，最后还把海洲超额部分补曹步欠缺的，使邦平乡借粮任务于1950年2月中旬超额完成，受到区和县的好评。

（选自区英伟：《超额完成借粮支前任务》，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建国初期中山若干历史问题回顾》，2004年印行。）

解放初期港口乡支前剿匪恢复生产杂忆

□李浩

港口乡解放前属中山县一区，共有 3600 余户，人口 1.5 万余人。是个典型的大沙田区，土地面积围田约 5.5 万亩，潮田约 1.5 万亩，合计 69945 亩，盛产粮食，少数甘蔗水果。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是中山广州的通航要道。居民以出卖劳动力或佃耕少量土地的贫雇农为主，生活极端贫困。但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一向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袁带所部的第二支队吴金（烧猪金）和第三支队梁自带（自带仔）盘踞的土匪窝，他们残酷剥削农民，大量走私谷米，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解放后，为了支援南下大军，中山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区镇成立支前指挥所。一区指挥所由黄敏元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分工我带工作队进驻港口，开展工作。我们工作队共 10 余人，于 1949 年 11 月上旬进驻港口，接收了国民党的乡公所和自卫队武装，开展工作。

支前喋血

中山解放后，国民党的潜伏匪特活动还很猖獗。有一名运禾秆的解放军就被暗杀。记得在 1950 年农历年初七，我们刚从石岐回到港口，当天派到西街工作的 4 名同志，就遭到暗藏匪特的袭击。新青团员黄凤兰光荣负伤，她当时只有 17 岁，是一区革命老区长洲乡烈士家属、中山独立团十三连的一位女战士，在和土匪枪战中身中 5 枪，从地面掉到涌边的一只小艇上，幸而所中枪弹是土制左轮，威力不大，不曾致命。当时我们正在东街工作队开会，闻讯立即渡河赶到现场，把黄凤兰送到石岐抢救。

现场搜索，发现地面有一线血迹，由现场一直通到村外，显然是土匪在枪战中有人受伤留下的痕迹。我们就跟着血迹追寻

六七里，到了一个果围，名廖坤元围（廖是梁自带的契仔），血迹就不见了，果围里的人已逃走一空。搜索全围，就在水河埗头发现了浮出血红的水色，用竹杆打捞，捞起了一条沾满血迹的长裤，受伤的土匪显然就藏在这里。在一个乱秆堆中，我们抄出了一个右腿膝头被枪弹打伤的匪徒。原来他在追击黄凤兰时，被伏在水棚下的工作队员梁深同志一枪打中了膝头，估计是他的同伙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准备另行转移。此人很顽固，只承认名叫吴满有，30岁，九区人，同伙一个不认。解往石岐，被判死刑，解回港口执行枪决。

受重伤的黄凤兰同志表现很好，一不怕痛，二不怕死，经过大力抢救，很快脱险。伤愈后又自动取消回乡休养假期，重新回到港口工作。她的英勇行为受到了上级党委和团委的表扬，被评为我县第一位光荣的模范团员。

由于深入发动群众，一些大地主私藏大量粮食抗拒筹粮的行动被揭露出来，特别是解放军的支持，杜绝了粮食走私出境的活动，我们的筹粮任务在1950年春耕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了。

恢复生产 退租反霸

春耕时节到了，县委发出生产度荒退租反霸的指示。当时由于恶霸地主纷纷逃亡，他们长期霸耕夺佃的大量土地丢荒下来，全乡有4000多亩，群众不敢开耕。仅梁自带长期霸耕的大雁十二顷围就有千余亩土地。当时珠江地委和珠江军分区设在中山，非常重视农村工作。杨康华同志选了近郊四个大乡港口、长洲、溪角、濠头，作为调查研究重点，指定工作队同志随时汇报。在一次汇报会上，我们把港口乡大量土地丢耕的情况汇报后，他非常重视，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生产大队，由两广纵队的古兴同志任教导员，进驻大雁十二顷围进行春耕，明确规定土改时全部归还港口乡统一分配。这一措施对支持我们清匪反霸，恢复生产，非常有力。

在这广阔的沙面驻扎着一支亦兵亦农的解放大军，对镇压匪特，稳定生产有着关键性意义。根据形势发展，县委、区委同意

我们把其余的 2000 多亩丢耕土地，发给没有土地的贫苦渔民和贫民小贩开耕，保证谁种谁收，土改时再统一分配。群众热烈欢迎，并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民兵队，协助工作队进行具体的工作。使全乡插秧工作按季节顺利完成，不丢荒一亩田。当时在石特南九一带还有一小撮匪特分子，进行散播反攻大陆谣言，威吓农民交开耕黑票，企图袭击工作队等活动。我们在群众紧密配合下，把这一小撮匪特分子 10 多名逮捕起来，搜出他们暗藏的反共抗俄救国青年团（简称“彩胜堂”）的番号和图章，其中两名经上级审判后解回港口执行枪决，其余宽大处理，交群众管制。原来这批反动分子就是 1950 年初袭击工作队黄凤兰等同志的匪徒。

胜利完成春耕插秧之后，又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广大农民的度荒问题。县委及时发出了生产度荒退租反霸的指示。港口乡较大的地主从来不住港口，我们就以农会为基础，组成退租小组，选出骨干，带领有关耕人佃户，组成退租队伍，每天清早，分头到地主家里，按照党的退租政策，和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由于工作做得细，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就取得了退租成果折合稻谷 40 多万斤，使全乡农民第一次解决了春荒困难，不饿死一个人。

特别值得回忆追述的就是通过退租，把已经逃亡的大地主大恶霸梁根抓回来了。梁根原来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偷，青年时看上了农民郭美的妻子，黑夜扮成女人摸到郭美家里把他的妻子强奸了，还把郭美毒死，强占了郭美的妻子和遗孤，从此就从小偷变成江洋大盗。20 世纪 30 年代初轰动全省的打劫“同兴渡”事件，就是他参与制造的。同兴渡是来往中山至广州的大型客轮，梁根纠合几名匪徒，把一枚水雷埋在港口白花头出海口处。“同兴渡”经过时触雷爆炸，炸死 100 余人，船上财物被掠一空。梁根从此成了港口土匪的太上皇，在港口、民众等地拥有大量土地。中山沦陷期间，他的儿子梁德还为日伪包收军粮。抓到了梁根，港口农民兴奋极了，“清算梁根的时候到了！”在斗争梁根大会上，苦主郭华福（郭美的亲侄）捧着郭美的“神主牌”声泪俱下，控诉了梁根的罪行。当年目睹“同兴渡”被炸后的悲惨景况的群众，纷纷起来控诉，梁根被依法判处了死刑。但他的儿子梁德顽

抗到底，拒不交出私藏武器。后来经过说服教育，把郭美的遗孤郭十五争取过来，供出梁根埋在石岐家里的一批武器。

防洪抢险确保不崩一个围

度过春荒之后，又到了防洪季节。解放前，港口全乡围堤长年失修，仅1948年，因崩围（即缺堤）失收面积就达到万余亩，“马大丰，十年耕种九年空”成了家喻户晓的民谣。经过恢复生产，退租反霸等一系列斗争锻炼，港口农民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是，着手建立了一个全乡的水利会，领导组织全乡防洪工作，主任就是治水能手、劳动模范苏和礼。由于港口没有联围，而大小围堤线加起来最少有六七十里，故暂时不能全面大修，只有抢修险段，确保汛期不崩围。

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风调雨顺，禾苗生长茂盛，群众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工程师苏和礼走遍了大小围堤，根据险情，确定施工方案，写上竹签，插在险段。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不到10天就把各围险段全部修好。墟镇的工商界也热情支持，捐出了大量杉竹麻袋等防洪器材。汛期到了，群众大清早就自带伙食，以救基队为单位，开赴防洪前线，采取固定守险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法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整个汛期，只有缸瓦沙烂六顷小围崩了1个缺口，不到1个小时就修好了，没有造成损失，其余全乡大小围堤全部安全度汛。为了庆祝抗洪胜利，全乡举行了1次大游行，当晚还开了1个祝捷大会，群众站满了东街小学的大会堂。

然而，就在群众兴高采烈的时候，却埋藏了一个隐而未发的危机！

在抗洪祝捷后，我们几个同志分兵到公庙村驻点。不久，接到农民小组检举，该村有个恶霸二路地主林××，就在我们进驻的当天晚上，把暗藏的一批武器秘密转移。我们立即把林××逮捕起来，取出了机关枪1挺、步枪10余支和一堆子弹。他还供出了一个暗杀未遂的大阴谋：原来就在抗洪祝捷大会那天晚上，他亲手埋藏了一枚大型炸弹，埋在大会堂的北边墙角。幸

而没有爆响，他就把炸弹丢进海里了。我们把他解到县上审讯，判处死刑，解回港口执行。

（选自《中山党史》2002年第3期）

延伸阅读

“同兴渡”事件

□李泽林

079

“同兴渡”事件发生在1930年左右。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盗匪十分猖獗，仅中山县三、九区就有许多匪帮堂口，聚集匪徒多者达二三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其中较大的堂口有五龙堂、九龙堂、彩龙堂、天子堂等。这些堂口的匪徒经常四出洗劫，杀人放火，掳人勒赎，勒收禾票，不仅为害农村，而且经常截劫客船、为患行旅。

当时，顺德广东堂的匪首罗鸡洪专以水雷爆炸行劫各江轮渡，而中山五龙堂和九龙堂的匪首也打算爆炸行劫香港梧州线的大火船。由于不懂制造水雷的技术，他们派人到罗鸡洪处请懂技术的人回浮圩秘密制造水雷。由于香港梧州线的火船是外国人办的，不易下手，匪帮们转而改变主意谋劫行走广州中山线的“同兴渡”。参加谋划这一事件的有五龙堂的匪首梁骚、高佬才，匪书记黄杞，九龙堂的匪首郭叶仔、塌头义等。商议结果，决定约请彩龙堂的匪首烧猪金、林满、郭大隆、郭义隆等共同合作，在中山港口出口不远的百花海面下手。

行劫当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按照港口的习俗，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诞”，地方上照例要搭建戏棚、请名班、唱大戏。因此，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是港口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各江轮渡经过港口都敲锣打鼓，祝贺天后诞辰，各地走台脚的小贩，探亲戚的群众，打荷包的扒手都聚集在港口，商店张灯结彩，戏台上下都是当地匪帮的武装，枪械林立。在匪帮盘踞“保护”的地方，扒手不许活动，如果被匪帮拿获，就要被猪笼罩住，捆在戏台上示众。二十四日是大放花炮的一天，当地匪帮认为，抢得头炮可以卜一年胜利。广场上人山人海，抢炮的人，打得头崩额裂，

甚至有开枪轰击的。到了二十五日早上，匪帮们看完戏后，就出发打劫“同兴渡”了，与另一股提前在半夜从浮圩出发的匪徒互相配合行动。

“同兴渡”是当时很有名的拖渡，沿途搭客载货。当天驶经港口时，由港口开街搭渡的十分拥挤：有拉箱的戏班、来往小榄、容奇、桂洲的小贩，刚释放的扒手、探亲回去的群众，大约有百多人。因此，这一天“同兴渡”的搭客特别多，全船共有数百人。当船开出港口炮台后，开街的搭客已经入仓，只有一扒手不准入仓，蹲在船头。渡船因防匪的原因，出港口后，即将餐楼和大仓的舱门封锁，搭客不能来回走动，都挤在仓内。

参加行劫的各堂口匪徒共有百多人，以九龙堂匪首塌头义为先锋。还有九龙堂的悍匪烟屎东（梁东九）、水瓜二（梁二）及五龙堂的小头目梁广仔等。行劫的匪徒布置埋伏在离港口不远的百花头两岸，水雷则安置在百花头独有的一株木棉树对开的海中，由梁广仔负责在大树下按电掣。本来按计划是将拖渡的火船炸毁，再行劫拖渡。但恰巧这天大雾，看不清楚前面，而火船拖渡的缆很长，火船过去了，梁广仔才按电掣，随即轰隆一声，有如天崩地塌，没炸到火船，却将拖渡近船头处炸断。拖渡被炸断的一截，火船来不及收车，拖离甚远，蹲在船头的扒手和船上水手纷纷跳水逃生。此时伏在木棉树对岸的匪徒即开枪猛烈扫射，锁在餐楼和大仓内的搭客无法逃出，又因船的一面受到枪击，搭客惊慌失措挤到另一面，被炸伤的渡船，随即翻转沉没，淹死数百人。其中有6名伪装成搭客准备做劫船内应的匪徒也被淹毙，其他匪徒一无所获而散。

这起轰动一时的惨案首先由逃生的扒手在港口传播开来，据闻有全家遇难者。

（整理自李泽林：《九龙堂等匪帮爆炸同兴渡始末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县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3辑，1965年印行。）

破抢枪越狱案记

□司徒洪

1951年8月,我们十区土改工作队进村,开展“八字”运动(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一天中午,区中队一位战士匆匆忙忙走进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一张条子递给我,还说:“是一个监犯专门叫我送给你的”。我马上接过那张条子,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有要紧事需要向你反映,见面后详谈。卢祖带字”。

卢祖带,花名叫“鬼祖”,是新平乡何五顷人。他是个惯匪,过去作恶多端,有血债,民愤甚大。土改队进村不久就把他抓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他基本认罪。我将他的罪行材料上送后,不久上级便批准处以死刑。为了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暂未执行,还留在监内。

我立即提审卢祖带,问他有何要事需要与我面谈。他说:“监仓内有人发动越狱,领头人是李成,他凿穿隔墙,传递字条,互通情报,组织抢枪越狱,我有他的字条一张,可以证明。”卢祖带能主动检举李成越狱,是希望将功赎罪,减轻对他的判刑,免他一死。

接着,我提审了李成,开始他不承认有越狱的计谋。后来在人证、物证面前,他哑口无言,不得不低头认罪,交代了发动越狱的过程。他说:“我在解放前当过‘大天二’梁自带的中队长,自己对群众犯有罪。但我在1949年5月间,曾经将梁自带‘围剿’共产党(当时有大批干部在北宁社开会)的消息告知梁泰猷、邓永年等,使他们能够及时撤退,使梁自带扑个空;后来到8月间,我又交出轻机枪1挺、步枪20多支给纪光队接收。我以为自己替共产党做了些事,不追究我过去的罪行,殊不知土改队来了以后,却把我抓起来了,我一时思想不通,所以想越狱逃走,找寻

生机。”最后他低着头说：“想不到出了内奸，败在‘鬼祖’的手上，18年后又出一个好汉。”

我对他说：“你组织越狱事件，是现行反革命行动，你串连罪犯越狱，不是找寻生机，而是找寻死路。”

审讯结束后，我交待区中队将他严加看管，上了手铐。

我立即将监内发生的越狱策划向区委书记杨明同志详细汇报，并且还提出了如下处理措施，也得到了杨明同志的同意：

第一，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加强保卫监狱值班力量，在监狱门前放双重岗哨，在区政府、区委会门前也加强值班人员，以防突变。

第二，向监犯宣布李成的越狱案已破，号召曾参加商讨越狱的人员，自己起来揭发李成的越狱阴谋，坦白悔过从宽，立功者受奖。

第三，宣布这次能挺身而出，起来检举李成进行越狱活动的人员卢祖带立了功，我们为他申报减刑。

第四，宣布越狱行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大家应该起来抵制，不要上李成的当，否则要加重刑罚处理。

同时，我在当天亦用电话向中山县公安局汇报破获越狱事件的全过程，请上级给予指示。而且还将事件的材料整理后上报，并将李成罪行档案呈批，要求处以极刑。另一方面我也将卢祖带的检举立功过程材料提出减刑意见，把原判处他死刑改判为徒刑，体现了我们对立功的罪犯的奖励。

越狱事件被我们破获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这是由于我们在平时对监犯们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做好政策宣传教育工作。我们经常对监犯进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作用。卢祖带敢于起来揭发，就是他相信我们的政策，希望立功，减轻他的判刑。

其次，我们在监内从来不搞迫供这一套。我们办案重证据，重事实，不轻信口供。以人道主义去对待他们。

再次，在监内成立读报小组，允许他们阅读《南方日报》，满足他们的求知要求。还定期要组长汇报监内犯人思想动态，掌

握犯人思想情绪。

我认为,由于做了以上几项工作,我们取得反越狱的斗争胜利。这也证明了我们平时对监犯所做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收效。

不久,上级批准了给越狱头子李成死刑,立即执行。改判卢祖带为20年徒刑。作为他立了大功的奖励,免他死罪。我接到通知后,马上在监狱门口宣读中山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公开宣布李成组织越狱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判处他死刑,立即在监内拉出来就地执行枪决。同时还宣布监犯卢祖带原已批准死刑,由于他起来揭发李成越狱罪行有功,改判20年徒刑,以示奖励。

(选自《中山党史》2002年第3期)

延伸阅读

从围剿变救援

——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

□司徒洪

084

1949年底中山刚解放不久，各地治安情况欠佳，国民党遗留的土匪、特务，四处搞破坏活动，在原九区安平乡的田基沙、沙仔、沥心沙一带，仍有匪徒进行抢劫，打家劫舍、走私等活动。群众对此非常痛恨，要求解放军和工作队对匪患进行打击，确保社会安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安平乡支前工作队，根据群众的举报，马上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匪特进行清剿，决定先围剿田基沙头围，那里无人居住，是匪首陈满根、梁添友、冼全仔等经常出入、聚集作案犯罪的地盘。

参加那次围剿行动的有两广纵队一团派来的解放军韦明佳、刘文铎、陈金玉、陈铿章、黄锋等班、排骨干；有广州市军管会同志梁津、崔月梅、肖仲钊、关振光等；我们中山有刘文业、欧炎良、冯色本、杨汉棋、周文鉴、冯润、当地老农吴满等共20多人。

会上指定由刘文铎、陈金玉两位解放军指挥。携有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支，一天早上乘两只小艇，分东西两路进剿。我跟东路，由文铎同志指挥；陈金玉同志带领的西路，从后面跟上。我们从陈十顷工作队队部出发，直扑头围上岸。在基围内转角处，有一间小茅草屋，我们怀疑是土匪藏身之处，便提高警惕，将子弹上膛，搜索前进。我们走到离茅屋约50米时，听到屋内有铁链声，刘文铎上前数步，大声叫喊：“茅房内有人吗？”但许久却未听见回答。刘文铎同志再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放下武器，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

但对方仍无动静，令我们深感不明；冯润同志跟着喊：“你们顽抗不出来投降，我们就开枪了。”多次的叫喊，对方仍无反应，真是奇怪万分。刘文铎同志再喊：“如果你们不投降，我真的开枪了。”茅房内仍然鸦雀无声。刘文铎同志架起机枪向屋顶上“掂掂”扫射了一轮，打得茅屋顶禾草四面乱飞，但屋内还是寂静无声。刘文铎同志继续向茅房开枪，打落了一大片禾草，但仍不见有人出来。

陈金玉听到枪声，带队走了过来，他叫我们不要再开枪，他从旁边观察了一会，自己冲入茅房内，大叫“投降不杀”，他拉开屋内禾杆堆，发现有一老头子倒在屋角地下近基边处，陈金玉同志以为给我们打死了，用脚去踢了他一下，那老头动一动身转过来，大叫：“老总不要杀我，我不是坏人”。

他颈上锁着一条大铁链，铁链另一头绑在地下的木桩上，我走上前去问他：“你是什么人？家在哪里？为何被人锁在这里？”

他说：“我是顺德陈村人，是一个良民，在陈村开有谷米店一间，一个多月前被人劫到这里，要我出10万元港币才放我。他们叫我写信让家人送钱来，可至今没有回复。”

我听了他的话，知道这是一宗标“参”勒索（编者注：标“参”为方言，绑架之意）案，可能遇上中山、顺德刚解放，他家人恐途中发生意外，不敢带这么多现金来赎人，所以拖了这么久时间匪徒都不放人。我们这次剿匪虽然扑了个空，但却救出了一名粮商，总算也有意外收获。

我们用刺刀斩断地下木桩，将他解救出来后，护送他到三角九区支前指挥所，他颈上的铁链仍未解开，刚好原九区区委书记兼支前指挥所主任梁泰猷同志在那里，他问：“你们为何把那老头用大锁链锁住，他犯了什么罪？你们千万不要违犯法纪。不要乱来！”

我说：“梁主任，你误会了。他是顺德的粮商，被土匪标‘参’到安平乡头围，今天我们去剿匪才把他救了出来，现在送来指挥部处理。”梁主任听了，认为我们做得对，说今后要依靠群众，将匪患肃清，做好支前工作才有基础。他马上叫人开了颈链，派

三角两名干部送那粮商回顺德。

临行前那粮商对我们感激万分，口里不断地说：“解放军好！共产党好！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

经过我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的不断清剿，当地的土匪们有的逃港，有的被扣押，大部分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向人民政府登记。于是匪患被清除，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选自司徒洪：《从围剿变救援——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53辑，2003年印行。）

中山土改杂忆

□罗章有

土地改革是要废除地主封建剥削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当时,叶剑英同志主持的华南分局把广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等结合起来,根据广东华侨、侨眷多,爱国民主人士多,起义人员多等特点,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以保护和照顾华侨、侨眷的利益,保护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等的利益。

广东开始搞土改时,最初是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搞的,只是叶剑英有个政策的界定。因此,我到张溪前一点底也没有。由于我在山东时,山东根据地正在搞土改,是罗荣桓主持的。可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的土改后来也被指作“和平土改”。全国解放最早是山东,贡献最大。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我们北撤到山东,那里就已经开始搞土改了。后来我们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时,我们曾参观了土改的几个点。山东搞土改有几个地方很有名,其中有个临沂县大店区平鹰坟,那里有个地主,拥有万多亩土地。当时山东农村仍是庄园主式的封建地主经济,凡替其种地的农民全是农奴。那个地主养了很多鹰。一天,一只鹰飞到一个在地主家打工的农民家去吃鸡,那农民在驱赶鹰时,把它踢死了,那地主就很生气,立即组织几百家丁把那个农民的家围起来,迫使他为鹰陪葬,平鹰坟因此得名。那里的地主还拥有一个丑恶的初夜权,就是这个地主所拥有的农奴的女儿要出嫁了,初夜是要把女儿送到这个地主的家里,与其或其儿子过一晚。凡耕过他的田的农民,都得这样。这是多么的没天理啊!

我们去那里受教育,还看了歌剧《白毛女》,感受到地主的霸道。地主的那个大院有一百几十间房,我们去到那里就住在没收了的地主的房子里。两广纵队司令部、政治部设在那里,我们学习班也在那。

我从东北回到南方后，由于身体的原因，曾生、杨康华同意我在家（在下五区）休息几个月。回来工作时，已是1950年的7月了。原准备安排我当石岐镇委书记的，但我表示对城市工作没兴趣，对搞农村工作有兴趣。组织上同意我的要求，让我接管珠江地区农会工作，任农会主席。当时是严尚民代表组织跟我谈话，他说：因为刘向东当时除了任珠江地委第三书记外，还兼珠江地区的农会主席，工作照顾不来，而农会原有的秘书长黄兼年老病多，无法坚持日常工作，所以让你接替刘书记的农会主席职务，专事农会工作。

我一上任，就先去博罗等地调查了一个案件，然后又去东莞搞征粮。10月，广东省开始搞土改试点，我被抽去当珠江地委在张溪的试点工作队队长。张溪土改试点工作队队长原由张斌担任，但他只到了一次，说不懂土改，就不来了，由我全力包办了以后的工作。当时，广东有3个试点县：龙川、五华、兴宁。珠江地委2个点：县级是宝安，乡级是张溪。中山也开了1个点：长洲。当时选张溪这个点，珠江地委是有考虑的：一是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从抗战时期，我们就在那里活动；二是离石岐较近，曾生、杨康华等领导要去检查工作也不会太远。可是后来由于剿匪、解放中山全境等任务繁重，这两位领导都没去过。张溪工作队由地委农会的七八个人，团省委、团地委、团县委和地委政策研究室各抽一部分人组成。

广东的土改试点从1950年10月开始，至年底结束。我们在张溪搞土改时，由于上头没有很明确的界定，我们当时是“入乡随俗，入水随湾”，是依靠当地的群众，依靠当地的骨干的。准确地说就是依靠当地的临时政权（后来我们的做法被说成是依靠所谓的“旧基层”），依靠当地的骨干进行排摸对象，再经审查后才开始访贫问苦。我们去到张溪，首先是去拜会乡委会。那时的乡长是杜广，我们原是战友，很了解他，他为人很坚定，表现很好，曾在肇庆监狱里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直到我们解放了肇庆，才把他从国民党监狱救出来。中山县长谭桂明安排他回乡当乡长。我向他说明来意：土改目的是要反封建土地制，让他先提出一些

可依靠的对象。由于依靠骨干，情况摸得比较准。他向我们推荐了苏乞等一批贫苦的农民对象，经审查后，我们就逐家逐户地访贫问苦。这些经验是我在山东学的。当时我们以靠近东河口那条村为主。那时，我们只是“访贫问苦”，但没提“扎根串连”，只是挖根、反霸，没有搞减租退押，直接没收土地，分田（后来强调“扎根串连”，强调先“扎”好“根”，再去串连，找自己的“阶级队伍”。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妥当）。

我们在张溪搞土改的程序，先是选对象，接着是诉苦。地委的黄士钊宣传工作很出色，会唱《白毛女》等，能讲平鹰坟、初夜权等故事。在启发农民认识了“谁养活谁”之后，组织群众诉苦，把恶霸杜当挖了出来，又没收了朱克勤的财产。继而是组织队伍，健全组织。主要有：以选举形式选举农会班子。农会是贫下中农自己的组织，选出了贫农骨干苏乞当会长。组织农会起来后，才陆续组织民兵、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让乡民自治，维护治安等。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由于杜广在解放战争时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断了组织关系，回来时没有党籍，后来，我们到张溪搞土改，发展苏乞入党，又由苏乞发展其重新入党。我们在张溪先发展了3个党员，苏乞、一个青年妇女陈秀玲，还有一个姓梁的青年乡委。张溪乡接收了一个女党员（姓卢），后来曾在郊区当妇女干部。之后，谢月珍又发展了一个女的，她后来到了工厂工作。后来还有2个党员，估计是抗战时期在张溪活动的共产党员黄峰那条线的，由于手续不完备，我们没有接收。

在张溪搞分田的程序：没收土地查田定产，将所有的田分等级。分田是执行叶剑英的政策，苏乞对张溪村的田了如指掌，是谁的土地、谁的田产都一清二楚，因此，我们工作起来比较顺利，也没有搞错。

当时仍提“一切权利归农会”，农会权利很大，分田、发土地证，成立农会、乡政府和民兵、青年、妇女组织。阶级划分成分时，也是执行叶剑英的政策。我们把各种成分的界定依据张榜公告，告知群众。原则上以中农自耕，封建地主、恶霸、官僚、公尝的土地没收，还有是没收了住在石岐那些地主的土地。华侨

地主的田产没有没收。分田后我们就撤出了，没参加复查。

由于土地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确立了土地权，使农民在政治上成为农村的主人，巩固了基层政权，安定了村民的生活，张溪的农民欢天喜地，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后来，广东的土改被指是“和平土改”，方方被撤职，粤中区党委书记李坚真大姐要检讨，一些干部被整得很厉害。我也差点被撤职，幸亏我在张溪搞土改时，杀了一个恶霸杜当，没收了逃到香港的原国民党江防司令朱克勤（官僚）的浮财，因此，搞不到我头上。张溪亦因此过了关，勉强算不上和平土改，没有重来。后来在复查时就过左了，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是地委秘书处的秘书黄士钊上台唱《白毛女》引群众诉苦为主，因此被他们指作是假的。还把杜广、苏乞等当作旧基层，推翻再选。杜广本身是苦大仇深，只有一个老母亲，从小就沿街乞讨，靠摸鱼虾度日，家里连一分田地都没有。在抗战时就在我们部队，是中队级干部，解放战争中表现也很坚强。我到张溪后，依靠他排出了张溪受苦最深最穷的农民，工作很顺利。后来到政权建立时，我们安排杜广当乡长。这样一个贫农骨干，穷得连家当也没有，可复查时却说他是旧基层、叛徒，不能依靠，被撤掉了乡长职务。后来，林锵云知道了他的情况，给安排在石岐糖厂值班。老贫农骨干苏乞也一度受到怀疑，撤掉了他农会会长和乡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过了不久，又重新让他任党支部书记。土改后，中央有个结论：广东土改只捡了芝麻，掉了西瓜。在土改复查阶段执行了过左的政策，伤害了一批华侨，把我们建立的架构全部当作旧基层来推翻。长洲那个点由于不属地委的点，也就不算和平土改了。宝安的点也要重新再搞。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的做法并没有错。第一次搞土改时执行叶剑英的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因而，我们没有伤害华侨。杜广他们提出的那批对象也都没有依靠错。当地人了解实际，我们不了解。可后来都被说成是旧基层，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一批人。广东土改对华侨利益伤害太大，乃至给开展国际外交都增加了困难。

分田后，我就离开张溪到了恒美学习（地委的土改工作队全都集中在那里学习）。恒美的祠堂多且大，有马家祠、郭家祠等。我住在郭家的大楼，集训了一个星期，学习河南的经验，即原鲁、原瑛、范华等人带来的经验，他们被称为南下干部，刘振本、魏来书、刘国栋等也是同时来的。

在恒美集训后，我被分配带队到四区上游搞土改，包括上柏山、下柏山、库充、亨尾、土瓜岭、恒美、齐东、老富头、牛起湾、白沙湾等村庄。四区中游是蔡端负责，下游是刘振本负责。

1951年6月，我带地委农会、团省委、团中山县委一部分人下去。这次一味强调“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坚决依靠雇农”，贫农也不行。我住的地方都挪了几次，住到下中农的家都不行，一定要住到贫农骨干那里。如我在牛起湾搞土改时，起初是住在杨友兴家。战争年代，他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成分是下中农，这次就是通不过，在他家吃饭也不行，一定要住在一个雇农、单身汉梁××家，与他一起煮饭吃。后来转到白沙湾时，原先住在汤美莉家，她是我们的一个同志，解放前加入青年团，她家只有两亩土地，最后也不行，就只好又搬到黄添家住、吃。黄添两兄弟，一个老母亲，也算是个贫农骨干。可见那时“左”的做法是多么可笑。

我搞的那片，以牛起湾反霸开始，抓了一个原国民党官僚、中山县长杨子毅，他是国民党民革成员。杨子毅后来没有被杀害，是方方出面保的。那时方方还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只批了死缓，以观后效。后来杨子毅病死在监狱。另外一个杨少镇，是杨子毅当县长时任卫生局长的。他的成分是富农，农民对他的怨恨主要是在其任卫生局长时，以整治石岐卫生状况和利于城镇的卫生管理，实行统一收粪便，不致弄得臭气熏天为由，组织了一个收尿公司，垄断了石岐的粪便，不让农民收。在生产十分落后的条件下，粪便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而他的公司收到粪便后却拿到其他地方卖，因而城郊的农民很不满，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尿”局长。杨少镇住在石岐，只是被我们带回牛起湾批斗过几次，没收了他的一些土地和家产。这段时期，我们还是尽量地注意不伤

害华侨和基本群众的利益。可到了后期追果实时有些过火了，那时追收财产伤了不少人。我们这片没处理其他的人，就只有一件事较“左”，侵犯了华侨的利益。本来是错的，但县土改委员会还出简报当做“经验”来介绍。这种过“左”的行为跟叶剑英原来定的政策完全相反。

我在四区上游搞土改只搞到分田阶段，没参加复查。到了1952年6月，就被调任县委委员兼石岐镇委书记、镇长，并派我去搞“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因为当时的镇委书记兼镇长卢克诚在战争年代曾打入国民党军统当过速写少校而被怀疑成特务，被撤职审查，调我去接替其在石岐的工作。而当时的副书记兼副镇长黄健也因被怀疑曾自首，调他去学习。到任后，我到珠江区学习了50天。

不久，我又兼管县委的财委工作，接着还兼管政府工作。1954年挂名当了中山县长。

综观中山土改的整个过程，和全广东一样，虽然在全面铺开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给中山土改带来了偏差，叶剑英的正确指导思想也受到非议，但在叶剑英、方方等一批领导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下，在土改末期和复查中也着手纠正了一些偏差，但留下的后遗症仍不少。现在回过头来看，叶剑英当时所制定的土改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在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在他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在反思的同时，叶剑英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

（整理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3期）

延伸阅读

张家边八字运动的点滴回忆

□陈惠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中山全境尚未解放，因此，在本地筹集粮草，支援解放军继续追剿国民党反动残余及准备解放沿海诸岛的任务，迫在眉睫。把旧武装接管过来，也是解放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当时是张家边青年团支部书记，接受组织指示，在张家边成立支前委员会，并与进驻中山四区的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系。

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接收旧自卫队武装。当时的局势尚未稳定，旧政权人员还在留守，我们要他们协同筹集粮草支援前线的时候，派团员及可靠青年农民接管旧自卫队武装。张家边是个近万人的大村，旧自卫队武装也近百人，有轻机枪几挺、步枪六七十支，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山四区乡村最后的武装队伍。我们把这支武装接管后，在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动势力及保护人民群众和护送军粮等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事实上，在此后的筹粮工作中，护送谷物到石岐、濠头等地粮仓，我们都是依靠自己的民兵押船护卫，从未有过失误（当时中山境内仍有残匪武装，曾发生过骑劫我运粮船的事件）。

紧接着，我们根据区政府的指示，着手组织农民协会（我被选为会长），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势力的造谣恐吓，以稳定民心，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简称“八字运动”）运动。初组织起来的农协骨干，虽然“一脚牛屎”，没有文化，也未掌过权，但却勇敢地带领着广大农民群众，肩背点星大秤，挑着谷箩布袋，按照事前拟定的地主富农名单，逐一清算退租退押。经过一番说理说法斗争，农会仓库堆放大量的胜利果实，我们及时地发放给贫苦群

众。同时，民兵队伍着手收缴黑枪，拘捕了一批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对共产党，对新中国表现出热烈的支持和拥护，跟共产党走，要求彻底翻身解放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1950年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虽然减租退押使群众得到部分粮食，但由于家底薄，缺粮断炊的农户仍不少。于是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又以农民协会会员为核心，带领广大贫苦群众，开展“以工代赈”，组织农民进行兴修水利，修桥整路等，凡参加这类劳动的，都给予适当的报酬，发给米粮等，以解决贫苦群众燃眉之急，使人们顺利度过春荒。

随着清剿反霸和减租退押的深入并取得完全胜利，其后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恢复生产，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健全了乡村的各级政权组织，我党在农村的基层阵地得到了巩固，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2—3期）

群胜乡的土改运动

□冯永

1951年8月中旬，在五区翠微土改试点进入第二阶段时，原五区区长郑吉率领中山县土改工作队200多人在坦洲乡全面铺开土改运动。当时，根据沙田地区河网交错、村庄分散（分布多条村（保））、地方复杂的情况，将其划分为坦洲、孖洲、蚬洲、民田区（前进）等四个片及一个区域中心（原乡府所在地）共5个单元，分5个小队。郑吉蹲在坦洲片合胜大兴围作为先行点，其他片都有明确分工。

梁迪和我领了40多人负责孖洲片的22、23、26、27四个村（保）的土改工作。22村顷二仔围先行点先走一步。进村前，我们研究了土改工作入手做法的计划，并按实际以围分组安排工作队。在进村第一天晚上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改运动的政策、路线、内容、目的。经过扎根串连，诉苦挖根，提高阶级觉悟，逐步扩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优势，集中重点，突出地主恶霸对象，开展斗争。

经过第一阶段取得了入手工作的经验后，我带了十几位土改工作队员移至23、26、27三个村（保）作为面上全面铺开运动。先派几位工作队员作先遣队，选择以26村为中心，以同益围作先行。进村第一天，我们选择在中心点的大地坪召开群众大会，我和全队人员同群众见了面，在大会上以严肃态度，宣布土改队入村，发动群众，恢复生产，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开展八字运动，土地改革。我们向群众反复讲明，土改运动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土改运动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路线。工作队是要让群众多讲话，多反映意见。工作队什么都听，对在过去日伪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做过一些错事、坏事的人员，甚至做了对群众

不起的事，只要找工作队老实实在地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揭发有功，立功受奖”。我们举行动员大会，又对边防、海防地区加强了宣传力度，组织小学老师参与宣传，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在政策攻心下，戳穿坏人谣言惑众，说什么“共产党共妻共产，土改骗人”、“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反攻”等阴谋。我们广泛收集群众的反映，不断戳穿坏人企图破坏土改运动的阴谋。同时，工作队以组（围）为单元深入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我蹲点在中心的同益、永安围，经过访问、排查，将组（围）内家境、生活最贫最苦的雇农吴松、何容好（女）、冯执（女）、梁佩坤、苏寿仔等排作根子对象，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校对摸底，察看根子扎得正不正。由于这一带的沙围田、冲积成围较远，多是新围、低围、烂围，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很苦，除个别农民有点资本投佃耕田外，绝大部分是雇农，是为二路地主耕分耕，即二路地主从地主那里投、租佃耕一个围或一片田，然后由二路地主按各户农民的劳动力、粮食、农具、本金（种子、肥料钱）划给其一定的放亩耕分耕田。所谓耕分耕，由雇农备耕春耕开始投入整田、播种育秧、插秧、施肥、管理、收割。一年产量很低，早造产量一般是 50—60 斤，晚造一般是 100—120 斤，年产平均 150—180 斤，按收割实谷计算比例 4 : 6、3 : 7、2 : 8 分成，即是雇农占 2—3 成，二路地主占 7—8 成。算起来，雇农一年到尾辛辛苦苦，所得无几，倘若开耕时借粮本，收割后被二路地主全部扣除了，变成空手收场，正是放下禾镰无米煮。耕分耕是地主、二路地主盘剥欺压农民最厉害的一种手段。乘农民无钱无粮之危，放高利贷，借 100 还 180—200。年过年，利叠利，借了还，还了借，终无翻身之日。

永安围 20 多岁的单身汉吴松的父母早丧，生活贫寒，承耕分耕 10 多亩地，靠摸点鱼虾过日，一个人住在一间仅几平方米的小草棚里，既无家具，也无炉灶，就连睡床也是自己用竹篾编织的，连床板也买不起。一番访贫问苦排查了解掌握情况后，我选上吴松作为工作对象，背上 10 多斤大米，跟吴松“三同”（同吃、

同劳动、同住)。我与他谈现实生活,初时吴松总是埋怨自己无本事,只是说多亏地主郑德善堂分耕田养活了命。经过我耐心的启发引导,打消了他的顾虑。几天后,他感受到带着枪的人都一样与他同劳动、同吃饭,工作队确实同旧社会的官兵、“大天二”不同,思想逐步开明,谈话内容多了,开始敢向我们反映情况了。

根据吴松反映,这里一带的农民,有的是在日本侵华时期从顺德逃难来或被卖到这里、被收养的。当地有首歌谣,“左湾湾,右湾湾,辛勤劳动无田耕,拔起栋仔走三更,走落青鹤湾,有去冇得番!”意思是贫苦农民有劳动,欠钱债,受剥削,冇田耕,要寻生路,拔竹栋(只有四支栋柱的小寮),半夜走青鹤湾(青鹤湾盗贼很多,逃命的农民到了这里大都有去无回,生死未卜)!吴松的父母也是在穷病交迫之中惨死的。而大多数的农民则是经历一代又一代遭遇破产演变为耕分耕田的雇农。

我让吴松先在小组带头诉苦。接着何容好、梁佩坤先后在大组进行回忆过去耕永安围的分耕田,年年有收割,但是年年无谷收,辛苦劳动,空手而归,一年积一年,债务筑高台,生活无宁日,常常捱饥受饿。通过发动、串连,引导,一批受压迫剥削最深的雇农觉醒了,分别进行小组诉苦挖根,大组诉苦挖根。然而,人们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剥削与被剥削的实质,使农民明白究竟是“谁养活谁?”让大家明白地主阶级采取的是“分层经营剥夺”的手段:地主用投标、交上期租金批给二路地主耕围,二路地主又用比例分成的办法分耕(实为出租给耕户),以剥夺耕户的辛苦劳动果实。二路地主只承担围内水利管理投入,其他投入包括犁田、耙田、踩田、整地、播种、育秧、插秧、施肥、除虫、管理、收割等一切工序成本全由耕户负责。耕户还要向二路地主求耕,倘若耕户无本无粮(自带口粮),劳力弱,就连分耕(租佃)资格也被取消。当年,主佃协定租分耕亩数和按实收比例分成指数,如三七开,即是租耕户按实收稻谷分得三成。年亩产100公斤计,耕户每亩只得30公斤,除去各项成本(包括谷种、肥料如茶麸、肉麸等和生产工具)每亩最低投放为17.5公斤谷,实得纯收只有12.5公斤谷,耕户夫妻两人(两

个劳动力）租耕 20 亩，一年辛劳，假如风调雨顺，可收成 250 公斤谷。若向二路地主预借 100 公斤高息口粮的，就要偿还 200 公斤谷，余下 50 公斤的口粮，一家三口（夫妻俩和一个孩子），就只能维持半个月口粮，根本无法开耕，于是，唯有借粮还粮，再借再还，年复一年。确是“放下禾镰无米煮！”如遇上天灾人祸，更永不翻身！而地主是不劳而获。二路地主批耕 100 亩除投入水利、什项和保护费等外，可收 2500 公斤谷，每亩除缴田赋税等外，就旱涝保收 20 公斤。要是批出 100 亩，年收谷是 2000 公斤。通过算细账，对比收入，越算越清楚，农民逐渐明白“谁养活谁”，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

经过一段访贫问苦，串连发动，诉苦挖根，农民的觉悟逐步提高了。贫（雇）农一批串一批，逐步形成骨干队伍。再诉苦，再挖根，工作队逐步引导他们深入认识贫（雇）下中农处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揭发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恶霸、“大天二”、汉奸、走狗。

在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扩大到占组面 25% 左右，工作由锻炼队伍转入斗争，工作队抓住保（村）内剥削最狠、贫下中农最憎恨的地主吴风安进行斗争，通过算剥削账，挖苦根追讨地主罪恶。算细账，挖苦根，使农民明白田里的稻谷全是农民一年辛辛苦苦耕出来的，地主不劳动，靠的是长期剥夺农民。事实证明，是农民养活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工作队引导贫下中农同地主面对面算细账，斗出被剥夺的果实。通过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我们边斗争边扩大队伍，组织贫（雇）下中农核心，吸收个别佃耕中农，把斗争逐步引向深入，全面贯彻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的党的阶级路线，从经济上将地主阶级剥夺农民的果实细账，算深算细，合理合法还归农民，实行应减即减，应退即退，全面开展减租退押。我们不单在本村进行算账斗争，组织减退，还进行排队，组织队伍上石岐、三乡、前山、古鹤、恒美、葫芦棚等地，通过城乡联络处向外地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以减租退押追回果实，在斗争中逐步形成核心队伍，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

我们又在区、乡先后召开贫（雇）下中农代表会，逐步产生贫（雇）下中农组织，贫协的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共减退稻谷 28000 多公斤，人民币（旧币）200 多万元（等于 200 元），外币、银币 4200 多元，金银首饰一批（价值 2000 元），全按稻谷折合；接着，以贫协代表为主进行讨论，确定分配果实方案。工作队以 23、26、27 三个村为单位，按户口 780 户，人口 2200 人，劳动力 1700 个（其中附带劳动力 300 人），土地面积 14000 多亩，采取以围组为主，承认差别，互为辅补，适当照顾的原则，既按贫苦分类，又看参加运动表现，划分三等级，然后进行公榜定案。最贫苦的贫雇农（一般是第一批根子）均分稻谷 125 公斤，较贫苦的贫（雇）下中农均分 80 公斤，一般的贫（雇）下中农，均分 60 公斤。无劳动力的小孩也按 3 个等级作为照顾口粮的办法，各自分得果实，皆大欢喜。

（选自《中山党史》2004 年第 2 期）

延伸阅读

土改中的一项廉政举措

□张汉文

100

1951年至1952年间，在中山县土改运动中，土改工作队的队伍建设曾经有过几项廉政举措，效果十分理想。本人参加了中山县土改运动的全过程，对上述的廉政建设身历其境，深受教育。所以，把其中点滴事情写出来以供参考。

在土改运动中，中山县和全国一样，按照土改的方针政策 and 有关法令，没收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在当地的多余房屋和财产（包括土地及其他财产），有的乡村没收这类财物的品种和数量惊人的多。但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或用人不当，个别乡村发生过经手保管没收财物的农民干部或土改根子乘监管制度不严从中进行贪污、私分，事后也无法查明真相和追究处理的事情；也发生过个别土改工作队员在没收行动中“顺手牵羊”而中饱私囊的现象。因此，在发动农民投身运动的过程中，以及在土改工作队集中休整中，都抓紧开展为人民服务、为广大农民谋利益及为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正面教育，并及时处理个别私吞农民胜利果实的违法乱纪行为，也有一些“堵邪门、开正门”的举措。

记得有一次，土改工作队返县城大集中休整（学习文件，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发展党团组织，以及部署下一批进驻点的工作）的时候，县土改委员会举办了一次没收物品寄卖活动（所得款项归原乡村农会处理）。这项活动有严格和明确的规定：（1）出售对象限于土改工作队。（2）出售物品严格规定限于一般钟表、衣服、鞋帽、小家具、小书柜及皮匣木箱等旧物件，而没有一件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有价证券和高档家私。（3）出售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大型寄卖会”计划时间一天，工作队在当日上午或下午只准集体进场一次。我们中山县南部几个区的工作队规

定在当日下午进场。当时我们的收入有限，经济底子薄，而且绝大多数土改队员未成家，购物欲不强，所以土改队同志买的物品有限，买一两件的居多，我只买了一件旧羊毛衣。

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山县土改运动中队伍廉政方面的一个侧面，说明反腐倡廉教育什么时候都需要，廉政建设什么时候都需要。当时中山县领导一面开展土改，一面抓紧教育和建设队伍，效果十分显著，使大批土改队员经受考验和锻炼，不断涌现大批继续革命、无私奉献的优秀干部和党员，继续推进中山县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1期）

一段难忘的经历

□王树平

102

退休生活悠闲。一天，我驱车前往市郊北漫游，很快便来到了沙朗镇。半个世纪前，我曾经在这儿参加过助征工作，驻扎于隆盛卡碉堡。如今，碉堡没有了，很多田块、河涌不见了，简陋的茅寮被拔地而起的一座座楼房、工厂所代替，宽阔平整的道路、水泥钢筋桥梁取代了昔日的田基、独木桥。田野上作物生长欣欣向荣，并呈现出现代化生产的气派。旧貌哪里还看得见，只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历史片断的记忆和难忘的岁月。

中山是省重点粮产区之一。由于粮食地位的重要性，1952年，全县查田定产工作配合土改复查工作进行，贯彻稳定公粮负担政策。粮食太重要了，全县解放没有多少天（1949年11月），县即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在各区以借粮的形式筹粮，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筹粮是支前指挥部的主要任务。后来，土改工作干部边开展土改工作，边抓征收公粮，并动员区乡干部、教师、学生、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助征。当时，我在十二区（沙溪）圣狮小学当校长，因此有机会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是1952年1月至2月。严寒的季节并没有影响大家工作的高涨热情，许多同志心底只有一个愿望：要为建设新中国多出一份力。

当时，我们同土改工作干部一起，驻扎在隆盛卡碉堡里，生活、工作条件都很艰苦。那时的沙田地区，难有像样的道路，走路得踩田基，晴天还好，雨天就特别难受，常常要冒着寒风冷雨，光着脚板走泥丸，人们称之为走“和尚头”。“和尚头”被雨水打湿了，滑溜溜的，我们这些来自民田区的小知识分子，简直举步艰难。一不小心，身体失去平衡，便整体着地，立刻变成个泥人，冰冻的泥水直刺心窝。我摔过跤，土改工作干部关心我，后来雨天出门，常常有人陪同，扶着我走“和尚头”。一次，我本来已

小心翼翼，拉住同伴的手才敢移动身躯，一步一个脚印前进，力求步伐稳健，没想到，一抖动，整个人失了控，霎时，像孩儿坐滑梯那样，滑落涌里，把同伴也拉了下水，我俩都活像个“落汤鸡”。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还是学会了走“和尚头”路：把脚趾张开，嵌入泥巴中，再跨步前行，这样就平稳了。

沙朗是水网河涌地带，过河要有桥，而这些桥大多是独木桥，有的只用粗一点的大竹横跨两岸，连扶手栏杆也没有。起初，过桥时提心吊胆，总在桥上扭秧歌，但我们也得天天经受磨练，练多了，掌握了要领，胆子也大了，再也不用害怕过桥了，而且可以小跑自如，活像个体操健儿，挺有趣的。

那时候，我们白天深入田间和各家各户，晚上回到碉堡，继续新一轮苦战。碉堡没有窗户，只有枪眼，夜幕降临，里面一片漆黑，凭借煤油灯或蜡烛的微弱光线工作，还要加倍小心防火。没有办公桌椅，我们就席地而坐，图纸、账簿等资料铺满一地。夜深了，收拾地面上的资料，用稻草铺地，“办公桌”于是成了“床铺”。这样的“金针蒸鸡”睡觉法倒也舒服，一觉醒来，大家精神抖擞，又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挨家逐户发动群众，计算和核实查田定产计征任务的数据，把通知书发到各家各户，技术性工作是大量的。所使用的工具也很简陋，没有软皮卷尺，就用长长的竹杆丈量土地，靠算盘和纸笔算账。我们不但要抓繁琐的技术工作，而且要向群众进行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生产发展不平衡，粮食较紧缺，粮食市场为私商所操纵，奸商乘机抢购粮食，肆意抬价压价，投机活动猖獗。人民政府必须掌握粮食，控制市场，保证军需民食。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共产党员、土改干部一方面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体力行，使群众认识到，人民政府是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一次，有个农民的儿子患病，加上衣服穿得破烂、单薄，全身不停地发抖，一看便知这是个家境困难的农民的儿子。土改队的一位共产党员见状，二话不说，即脱下身上的衣服，披在病人身上，宁可自己受冷，也要把温暖送给他人。另一位共产党员则把供给制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送给这

位农民兄弟（那时的土改干部是没有工资的）。后来，这个农民逢人便说：“土改队好，共产党好，同我们是一家人”。党群、干群的亲情，融汇成一股暖流，这股暖流很快从这一家传遍家家户户。由于我们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对粮食的征收政策，贯彻稳定公粮负担政策，把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政府的征粮工作顺利进行，依靠群众，保住了大局。

嘟！嘟！汽车的喇叭声响起，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然而我却在继续思考：半个世纪过去了，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进步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一切都在变，我们的思想也要随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常新，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解放初期那一段艰苦经历给我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共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这一历史片断，年代有点久远了，它却一直作为永恒的珍藏，收进了我的记忆里。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1期）

延伸阅读

依靠农会，在珠三角完成征借军粮的任务

□梁平

番禺刚解放，一个紧迫而突出的任务，就是征借军粮支援前线。禺南南区是全县重点产粮区，土地非常集中，全区稻田 98% 为地主所有。当时正值秋收时节，为了不失时机地完成征借军粮任务，经上级同意，原地下党关系暂时不变，把禺南南区支前指挥所改为番（禺）东（莞）中（山）顺（德）边区支前指挥所，我任指挥所主任，所址设在大岗。指挥所下设秘书股（负责人郑德）、粮秣股（负责人区藜）、运输股（负责人卢如）。经独立团领导同意，从独立第一连抽出手枪班到指挥所担负保卫工作。参加指挥所征粮队的，除原来地下工作同志外，还有石平同志带队的四野十五兵团民运队，许树同志带队的两广纵队民运队，梁田、周天祥同志带队的珠江军分区文工团，胡明同志带队的番禺独立团文工队等 100 多人。各乡普遍成立了支前小组，迅速展开支前工作。

一是征借办法。我们考虑到沙田区苛捐杂税征特别重，而地主通常又把苛捐杂税算入地租，将原租额再提高 100 斤左右，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解放了，应取消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包括苛捐杂税在内的高额地租，按早四晚六计算，每亩应退还耕本谷 60 斤（批耕包租田）或 55 斤（包租田）给佃农。地主退还耕本给佃农后按全年计算其收入征借，佃富农以下各阶层则按半年计算其收入征借。佃富农无免征额，中农免征额为每人 75 斤，贫农每人 150 斤。

据当时的调查统计资料，各阶层的实际负担率是：贫农 5—7 斤，平均每亩 2—6 斤；中农 9—14 斤，平均每亩 9—15 斤；富农 20—25 斤，平均每亩 20—40 斤；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75 斤以上，

几乎把晚造的全部收入交出来。

二是征借步骤。分两期进行，先征地主的，后征农民的。同时明确规定，秋收后佃农应交的全部租谷由当地农会冻结，扣除耕本后，由佃农直接按亩代地主缴交支前军粮，余下部分和征粮收据一起交给地主。

为了确保退还耕本归佃农和迅速完成征借军粮任务，11月初，我们在灵山召开一个全边区农民代表和地主代表关于归还耕本问题的辩论会。到会有农民代表100多人和地主代表（主要是沙湾、古坝的）10多人。第一次开这样的会，番禺县委书记兼县支前指挥部主任曾谷亲临指导。会议一开始，双方代表就针锋相对地争议起来。有地主代表说租额是由双方自愿确定下来的应是合情合理的；沙湾的地主代表甚至说，我们也不富裕呀，有时想吃云吞面都没钱。这时整个会场哄动起来，气得农民可恨又可笑。不少农民代表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如何勾结“大天二”欺压和剥削农民，不断提高租额，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压在农民头上，农民终年劳碌辛苦，做牛做马，得不到温饱，有的还被逼得走投无路，离乡别井，家散人亡的罪行。在农民的控诉下，地主代表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正在这时，我根据曾谷同志的意见并代表边区支前指挥所站起来讲话，明确强调现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大天二”逃跑了，一切压在农民头上超经济剥削的苛捐杂税应当取消，退还给农民作为明春开耕的耕本，以利于生产。同时还宣布了征借军粮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步骤，号召大家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全国，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全边区这次征借军粮的光荣任务。会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10多个地主代表则低着头悄悄地退出会场。

由于结合实际具体地贯彻了党和政府征借军粮的政策，办法对头，广大农民积极性很高，征粮队到各乡村开展借粮工作，得到农会具体指导和帮助，驻军的配合工作开展顺利，那时整个边区大小河涌的运粮船，日夜穿梭不息，掀起了交军粮运军粮的热潮。边区支前指挥所的码头忙得不可开交。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县支前指挥部派船来还是运不了，直到省支前司令部派来了好几

批船队才解决了运粮问题。12月底，第一期向地主征借军粮的任务已经完成，转入第二期向农民征借。到1950年的春节前统计全区已完成上级分配的20万担任务的80%。还有20%任务，大部分农民都陆续交了，只有小部分农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如受敌人谣言影响，怕变天思想等）或实际问题（如因向农民征借时间太晚，有些已把粮食用于婚嫁、盖新寮等），有拖欠现象。为此，区农会于2月下旬召开全区各地农会会长和农民代表会议，分析了敌情，强调要及时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揭露敌人谣言，宣传大好形势，提高认识，解除思想顾虑。对于有实际困难的，经过查实，可给予适当减免。在边区农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的区域农会会长陈九同志鼓励代表们说，我们解放了，但海南岛和全国有些地方还没有解放，那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一定要完成支前粮食任务，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会后，代表们信心十足，经过努力，到4月中旬，胜利地完成了全边区20万担征借军粮的任务，受到县委、县支前指挥部和省支前司令部的表扬。边区人民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自己值得自豪的贡献。

（选自梁平：《回忆解放战争后期粤南南区的革命斗争》，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番禺红色印记》，2014年印行。）

毛泽东赞扬的中山青年突击队

□刘廷玉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编者注:时间有误。该书于1956年1月正式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其中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写的按语是: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毛泽东在这条按语中用了四个“最”,即“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来赞扬青年、肯定青年,体现了他一贯重视青年的思想。同时他还就青年工作及青年人的成长提出了希望。希望党团组织注意发挥青年的力量,不要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希望青年人要向成年人和老年人学习,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以自己的工作成绩令他们心服。

时至今天,重温这条按语,重温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创业史,对于我们的工作,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青年突击队的创业史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今中山市民众镇新平一

村)位于中山市东北珠江河流出口处。这里的自然条件较差,是典型的低沙田。

1954年冬,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不久,便遇上了罕见的大旱。社的领导带领大家想方设法战胜旱灾。当时解决旱灾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土地的抗咸和抗反酸的能力,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入河泥,填高低洼地,使土地免遭内涝和积水的威胁,从而提高土地的肥力。于是,社委会提出了在80天内完成6000艇的入泥任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时担任团小组长的梁碧南向社委提出以团小组为核心,组织青年积极参加撑泥。这一提议得到社委和当时在新平乡协助抓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青年团粤中区工委工作组的支持。时任团粤中区工委组织部长的陈诗博和梁碧南决定在工余晚上召开全社青年会议,动员大家踊跃“撑泥”,几日后陈从工作组回到社里,和梁碧南商量成立青年突击队,在生产薄弱环节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就这样,新平乡第九农业合作社青年突击队于1954年12月中旬成立。成立当晚,36位青年在“为革命时刻准备着:突击!”的入队誓词下签了名。24岁的团小组长梁碧南当选为突击队队长。

突击队成立后,当即接受了社委分配的任务,他们开展劳动竞赛,人人争撑第一船。第一天23名队员中有5人超额完成任务,17人完成社的指标。突击队还创造出“倒缩取泥”法,效率从每天的只能会280艇提高到410艇。社里推广了这个办法后,如期完成了入泥计划。

时近清明,正是播种的时候。由于干旱,咸潮涌进秧田,威胁播种。为不误农时,社委会决定到40里外的东隆乡去借田播种。突击队首先响应号召,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26亩秧田播种在东隆乡,并育出了第一批嫩绿的秧苗。

旱患解除后,刚播下的秧苗又出现了第一代“三化螟”虫,正当社里发动群众除虫的时候,碰上了一些思想封建、保守的人,他们说:“禾苗无虫,天上无龙。”认为虫是天生自来的,用不着担心。但突击队员在党支部领导下,一方面向群众广泛宣传杀虫的道理,另一方面积极到田去喷农药,摘虫卵。在突击队员带动

下，群众认识到除虫的必要性，从而战胜了第一代“三化螟”虫对秧田的威胁。

青年突击队不但站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前列，而且在春耕、备耕、中耕、夏种、夏收等经常性农业生产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生产的一支有生力量。社副主任梁务仔说：“有了这支生龙活虎的突击队，天大的困难都会化为乌有。”社员赞道：“青年突击队顶呱呱，遇啱（碰到）石头当蔗渣。落下雨当冲凉，月光当太阳。”

1955年5月，广东省首届青年代表大会在佛山召开，梁碧南光荣出席，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得到各地代表的赞扬和支持。团粤中区工委工作组专门写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同年9月，毛泽东为此文写了按语。

在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影响下，1955年中山县有131个乡开始建立青年突击队，1956年发展到524个，占当时全县乡村的95%以上，人数多达11948人。他们在备耕抗旱等农忙季节中起到突击的作用，推动了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40多年来，中山的农村青年高举“为革命时刻准备着：突击！”的旗帜，发扬“四最”精神，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及以后的历史时期，在备耕积肥，兴修水利，调整插花地，整治围内排灌系统，深耕改土等农业生产中都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青年突击队的精神意义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是它的特殊性。但是，在突击队从创立到发展壮大过程中，我们看到它所代表所体现出的品质正是青年的共性，这是它的普遍性。青年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这一点是由这个群体的特点所决定的。青年时期，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一个人最有生命力的时期。生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在这一时期显示出无穷的力量。青年，虽然还带着成熟前的幼稚和冲动，但是它显示出的旺盛的精力和活力，强烈的学习创

新精神，开放热烈的情怀，都是一生中最强烈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热情、这力量，在正确的领导下，必将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的冲击波。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这一精神。笔者在采访当年的突击队长梁碧南老人时，深深感受到这一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梁碧南在这几十年中，他当过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后作为镇的干部退休。回忆当年的岁月，老人讲得很投入。诸如开会又歌又舞，报名参军群情激昂，劳动时的生龙活虎，让听者深受感染，仿佛置身那火热的突击队生活，真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回头再看主席按语，写得真是恰到好处。既赞扬青年的优点；又寄希望党团组织抓特点，积极引导；同时还向青年提出建议：既要向成年人老年人学习，又要能以工作成绩令他们心服。这些话，时至今日，不仅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且仍是今天青年工作的重要法宝。

时代变迁，如今再到新平一村，历史的影子已渐隐去，新的生活正展示出它的风采。

新平一村现有耕地 2986 亩，多为禾田，鱼塘占 1000 多亩，其他甘蔗、香蕉、瓜菜等占 300 多亩。人口共 2061 人，其中青年 350 人。在发展经济与个人致富的道路上，新平一村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着核心和带头作用。目前新平一村有 28 名党员，28 名团员。支书梁卫忠是原突击队员之子，当了多年的村长，近两年被选为支书，谈起市场经济时期的青年与 20 世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合作社时期的青年之区别，梁认为：虽然时代不同，条件变化，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颇有相似之处，这正是青年的共性特点所致。新平一村的青年在团支部组织、党支部领导下，今天在抢险、救灾、应紧等活动上，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团支部定期组织学习，提高思想，围绕发展集体经济这个中心，发挥着青年团的积极作用。在团支部的带动下，大多数青年学技术、练本领、求上进；与赌博、封建迷信作斗争，与吸毒贩毒现象作斗争；关心和帮助五保户，学雷锋做好事树新风，在乡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今天的新平一村人，他们的眼光更远

了，他们在琢磨着怎样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怎样进一步致富，在现有的条件下再进一步，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美好生活！

碧南老人那满脸的皱纹似是叙说着岁月的沧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当年创业过程中激发出的青年身上的那股精神，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财富不能让它湮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创业中，在新平一村、在民众、在中山、在全国，我们应该让它迸出新时代更加灿烂的光芒！

（选自《广东党史》1998年第3期）

延伸阅读

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亲历亲见亲闻回顾

□凌志坤

我是一名年已 80 的退休党员干部。1952 年 2 月从家乡广东梅县考入省农林水利技术训练班，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学习结业，次年 2 月分配到中山县人民政府农建科任职，是当年全县仅有的一名植保专业技术人员。随后几年，长驻在原十区新平乡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此期间，我参与过新平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发动组建，指导青年突击队员学习推广农业技术和各项农事活动，可以说是一名编外青年突击队员，是当年青年突击队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历史见证人。回顾上述经历，思绪万千，感触良多，特撰此文与大家分享，共勉讨论。

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成立起来后，就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投入到各项农业生产活动中去，成为了备耕入泥突击队、春播插秧突击队、抗击各种自然灾害的突击队，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最突出的是参加冬春备耕入泥的苦干实干的行动。所谓备耕入泥是在围外河涌用两条中型木船扎搭起简易流动挖泥船。该船中间搭建一个 3 人踩踏的绞泥架，船旁用“标榜”（“标榜”是沙田地区木制的长条形生产工具，既可作挖渠时的泥砖推运，也可铺在入泥的流动挖泥船旁，供作行人使用。）铺设行人道。掌握每天涨潮可用的有限时间，挖泥手抓住连着“维也”（“维也”是指钢丝绳，安装在流动绞泥船和围堤的拉艇架上，用于入泥时泥簰挖淤泥和拉动泥艇跨越围基缺口。）的特制泥簰，在船头直插河底，挖取淤泥，倒放在泥艇仔内。然后，跨过专辟的临时围堤缺口，由艇把泥块撑运到围内禾田做基肥和平整土地之用。卸完淤泥后，空艇仔由原围堤缺口返回围外挖泥船处候运。由于围堤缺口不能开得过大，加上每天潮起潮落，围内外水位相差很

大。因此，进出围堤缺口的泥艇均由架设在围堤缺口旁边的两人踩踏绞泥架，通过“维也”的拉动进出。这对装得满满淤泥的泥艇，跨过围堤缺口，坡度大、冲力大。到达围内水面后，水花四处，一杆起撑，快速前进，颇为壮观。若有失控，则容易湿身跌倒翻艇。这个撑泥工种，尤其适合轻身灵活的女青年干，她们很快上手成为入泥撑泥能手。由于备耕入泥是沙田地区当年最有效的增产措施，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委决定，计划入泥 700 亩，占禾田总面积近 9 成。每亩入 85 艇，共需挖河涌淤泥 59500 艇，约 100 万公斤，平均每亩近 1.5 万公斤。面对这一艰巨的生产任务，有些社员思想不通，说什么“冬春天气寒冷，入泥湿手湿脚，腰酸骨痛，还会撑烂手掌，即使有金可捡也不想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社第一天参加入泥的社员只有 30 多人，入泥 400 艇，完成计划任务的 50%。面对这种情况，青年突击队队长梁碧南勇挑重担，向社委提出带领青年突击队和社员群众坚决完成入泥计划任务。于是，他每天一早扛着青年突击队队旗，率领突击队员投身入泥战斗，苦干实干拼命干。有些突击队员还唱起了嘹亮的咸水歌，鼓劲助兴。好一个热情积极的入泥劳动竞赛的场面，很有生气和活力，带动了越来越多的社员参加备耕入泥行动。与此同时，突击队员们还想方设法提高入泥效率，创造了“倒缩吸泥”的先进办法，青年突击队效率从每天入泥由 280 艇增加到 410 艇。这一方法在全社推广后，全社效率从平均每天最高纪录入泥 660 艇次增加到 1030 艇，使全社如期在 80 天内完成了入泥计划任务，为夺取水稻高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青年突击队在抗旱防咸、借地育秧方面的苦干实干精神也很突出。当年春季，新平乡遭到历史罕见的干旱，直至清明时节咸潮还未退，无法播种育秧。为了解决这个紧急难题，社委决定到 40 公里以外的邻区东隆乡借地育秧（这里没有咸潮为害）。这一措施一经提出，便遭到一部分社员的反对，有的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快会下雨的，用不着到遥远的淡水地方借地育秧，浪费人力财力”。有的说：“即使到东隆乡借地播种，育成了秧苗，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拔秧运回来插植。”面对这种情况，青年突击队积极响应社委的号召安排，

组成了一个由老农带领的 10 多个青年突击小组前往东隆乡借地育秧。经过连续 4 天日夜奋战，突击队在 26 亩秧地播下了 1000 多斤（500 多公斤）谷种，半个月后，秧苗长得青绿粗壮，而这时新平乡的咸潮仍未退。正是由于借地育了 26 亩秧苗，全社基本按季节要求完成了育秧任务，给那些思想保守不愿苦干的社员生动的教育。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农事活动中，青年突击队员也表现得很出色，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员年龄一般在 20 出头，他们思想单纯，渴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成为有用之人。因此，驻在该乡县区的几名农业技术干部自然成了帮教他们的老师。通过举办技术夜校，召开生产现场会议，种植试验田等办法，技术干部向青年突击队员和社员群众传授改革水稻耕种技术，实行单造改双造，间作改连作，翻耕密植，加强田间管理以及防治各种自然灾害，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改革耕作制度，实行间作改连作，合理密植。解放前，新平乡水稻生产基本上实行双季间作制，即早造插秧后，禾苗长至旺盛时，把晚造秧苗间插在行距之间，一般为 24 寸 × 24 寸（60.96 厘米。1 英寸为 2.54 厘米）、26 寸 × 26 寸、28 寸 × 28 寸，早晚两造行距间隔很宽，插植棵数不多。因此，要提高水稻产量，首先要改革这一落后的耕作制度，实行单造改双造，间作改连作，进行合理密植。俗称“挣稿改翻耕”“双龙出海”改翻耕密植，（“挣稿改翻耕”“双龙出海”“翻耕密植”，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田地区改革水稻耕作制度的俗称。所谓“挣稿改翻耕”“双龙出海”，是指水稻实行双季间作制，即早造大田禾苗长至茂盛时，在行距之间插上晚造秧苗，同时生长。早造成熟收割后，留下晚造秧苗继续生长，至秋末冬初成熟时收获。翻耕密植是对水稻实行早晚双季连作制的俗称，大大提高了插秧密度，增加了复种指数，可有效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插植棵数，插秧密度一般为 8 寸 × 8 寸、9 寸 × 9 寸、10 寸 × 10 寸。这是新平乡实现合作化后首先狠抓的一项重要增产措施。对此，有些社员群众存有思想抵触，说什么“水稻翻耕密植，插得密密实实，不通风透气，

会有禾无谷，日后社员没饭吃谁来负责”。有的说“参加入泥撑泥已损手烂脚，周身骨痛，现在又搞什么翻耕密植，更加辛苦，早知这样不如不入合作社了”。面对社员的这种抵触思想，青年突击队员把自己在技术夜校和参加生产会议学到的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翻耕密植的技术知识向社员群众宣传讲解，还通过算细账，讲明翻耕密植的道理和好处。与此同时，还起早收黑，带动社员搞翻耕密植，保证按规格、按质量插植，增加插秧密度，并涌现了一批插得快插得好的插秧能手，确保了全社 700 亩翻耕密植按季节按质量完成任务。二是抓好防治水稻病虫害。新平乡是水稻“两虫一病”（三化螟、稻飞虱、稻瘟病）的严重受害区，所种植水稻出现大量的枯心苗和白穗，影响水稻产量提高。对此，有些社员思想迷信保守，怨天怨地。说什么“禾苗无虫，天上无龙。虫是天生自灭的，一场风雨过后就会死掉，不用担心”。作为驻社的植保专业技术人员的我，自然要承担起向社员群众讲授技术知识、组织发动防治行动的责任。于是，我晚上拿着三化螟虫和受害禾苗等标本，通过技术夜校和有关生产会议，向大家宣讲三化螟发生规律和防治办法；白天深入田间同青年突击队员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指导开展防治工作。特别抓紧清明前后第一代三化螟蛾盛发期，连续 7 个晚上在入夜前组织发动社员点燃了 100 多盏煤油灯诱杀三化螟蛾，收到了良好的杀虫效果。当年新平乡“万家灯火灭螟蛾”夺取水稻丰收的新闻，还在《南方日报》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紧接着，我们又抓紧早造苗秧期组织开展喷杀 666，把第一代三化螟虫消灭在幼龄期，防止和减少扩散到大田继续为害禾苗变成白穗，以确保水稻丰收；另外，还组织了突击队员和社员群众一起出动，用煤油水泼杀稻飞虱，亦收到了良好的杀虫效果。以上事实充分表明青年突击队在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中表现最为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并取得好的成效。还有一些青年突击队员成为技术的好手和能手。正是由于青年突击队员积极学习和带头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了，还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丰产田，创造了水稻高产的记录。

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成立短短一年间，能

以青春热血谱写出一曲时代赞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党的正确领导。该社青年突击队是由新平乡党支部亲自发动组建起来的，并把它作为承担社里艰难险重任务的重要力量来抓，使其成为带动社员群众发展生产的一支强大力量，确保了全社备耕入泥改革耕作制度、推行翻耕密植、科学田间管理以及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等各项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二是充分发挥青年团组织的作用。该社青年突击队是由青年团小组发起以团员为骨干的生力军，他们在开展生产活动中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起到了带头骨干作用。特别在备耕入泥、借地育秧、抗御自然灾害等急、危、险生产任务不怕苦不怕累，坚决完成了社委交给的任务，受到了社委和社员的好评。三是锻炼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该社青年突击队经过党的不断培养教育、生产的艰苦锻炼、参加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与实践，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劳动技能显著提高。他们有的参加了共青团组织，成为青年先进分子；有的成为社队骨干，担任了领导职务。公社化后，新平乡分成新平一、新平二、新平三、新平四4个大队，这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以及生产队长不少是当年青年突击队的成员。其中新平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卢顺娣就是当年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突击队第二任突击队长。因此，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青年团的作用是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茁壮成长的根本保障。

（整理自凌志坤：《发扬青年突击队精神，续写时代新篇章——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亲历亲见亲闻回顾与思考》，《中山党史》2014年第4期。）

雨夜下乡记

□张仕伦

118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我在中共中山县委农村部工作。原中山县的自然环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田地区，属于丘陵平原；一种属于水网河涌交错的沙田地区。沙田地区交通十分不便，由石岐往民众、三角、黄圃、大岗等沙田地区调查，要乘电船或艇仔。农村工作部的工作，要经常下乡调查或蹲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要自带行李生活用品下乡，冬天还要带棉被等笨重行李，一年到头行李经常在肩上，有时还在农民家里吃饭，那时工作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1958 年（也可能是 1959 年）冬季，秋收已经完毕，开始进入备耕的繁忙季节。沙田地区转入积肥入泥阶段，为下一年丰收做好准备。我和赖汉强两人接受任务前往大岗公社（今属番禺）做调查工作。出发那天，北风呼呼，细雨绵绵。我们两人当时都住在机关集体宿舍，一早起床收拾行李，赶乘电船前往大岗镇。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到达大岗镇，正遇公社开干部大会，我们向公社领导说明来意，公社领导当即决定让我们去五沙大队走一趟。我们在公社饭堂买了晚餐的饭票，急急吃完晚饭，又乘回程的电船赶往五沙大队。

由大岗返回石岐的电船，在下午 6 时左右开船，大约 1 个多小时，到达五沙大队河段时，电船鸣笛，岸边有一只小艇划到河中心，高举照明的桅尾灯。会船时，电船水手用竹篙钩住小船边，我们带上行李，小心登上小艇。小艇收费每人 2 角钱，摆渡艇家把我们送到岸边码头。说是码头，其实是摆着两块大石头而已，我们问艇家到五沙大队要走多少时间，艇家说：天气好走大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从小艇下来，上到围基顶。这时细雨绵绵、寒风袭袭，

四面漆黑一片，看不清道路。待眼睛适应了环境，才隐约看到围基左边是竹林，右边是蕉林。向下看，路是黑的，仰望天空才看到一条蒙蒙的白色光带。我们踏着有点泥泞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行，大约走了30分钟，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不是平坦的，而是一级一级往下伸，我们便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当下到超过2米深处时，才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被挖开的围基的缺口。这个破堤挖开的缺口，是沙田地区冬季入泥挖开放水入围的，也是小艇载泥入田时的过道口，在完成入泥之后，这个缺口就会用泥堵死。缺口处架着两条木杉的桥，下面是水，水是反光的。我们踏着木杉桥，小心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走到木杉桥的尽头，一级一级地向上走，又上到了围堤顶。安全地走过了这段路，又继续踏着泥泞的路，冒着寒风，顶着细雨，背着沉重的行李，摸黑前进。大约又走了半个小时，看到左边的大围有点微光，接着传来的人声越来越清晰，我们估计是一个生产队在夜战入泥。继续前行，发现前面左边大围的确有几十只小艇正进行入泥。

直到晚上10点钟多，我们才到达五沙大队，找到有关干部，向大队干部了解组织这次积肥入泥的会战情况。这次入泥会战是采用劳动定额到人到艇、超额奖励的办法。会战进行了一日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胜利结束，《中山日报》也及时对这次入泥会战作了报导。

这次夜访五沙大队，虽然艰辛，但总算完成了任务，心里觉得甜滋滋的。这段经历使我久久不能忘怀，铭记心间。

（选自《中山党史》2006年第1期）

延伸阅读

群策群力，消灭“望天田” ——1958 年大鳌溪社兴修水利情况

□李杰生

120

决心改造“望天田”

1958 年春，中山各地都掀起了兴修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濠头乡大鳌溪，可说是我县最早的民田村，它位于半山，地势高低不平，全村 1183 亩禾田中，高旱田和望天田（10 多天不下雨受旱的）就有 987 亩，占 84%。历来春种，很多田因没水供犁耙，农民要用禾枪尾打穴才能把秧苗种下去。1946 年大旱，有 40% 的禾田因干旱插不下秧苗而丢荒了。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在个体经济条件下，旱情并没有得到改善。合作化后，修了 1 个山塘、4 个平塘和一些水凼，但只能解决 196 亩禾田的灌溉用水，仅占 16%，遇上旱年仍然要望天。反之，如果雨多则会山洪暴发，冲崩基围，水淹公路、田园。

在 1957 年底全县生产高潮初起时，吃尽了干旱苦头的大鳌溪社社员们，要向天宣战了！社内以社长为首，组织有水利经验的老农，成立了一个水利小组，他们踏遍了村内所属的山头田地，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全面的水利建设规划，决定要在 1958 年各个农事间隙的 6 段时间内，新建山塘 8 个、平塘 2 个、扩建平塘 1 个，加上原有平塘 2 个，合共 13 个；与邻社合建水库 1 个，蓄水 30 多万立方；疏通全村水沟 10 条共 2940 丈。利用山地、水凼、水坑的自然条件，构成严密的山塘排灌网，使水通过水沟，源源灌入全社 1000 多亩禾田上，以达到引蓄合一的要求。

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仅有 308 户、折实劳动力 392 个的小社，一年内要完成这 10 多宗共 41269 土方的工程，任务确实艰巨。起初该社从干部到群众都存在着“难与天斗”的思想，认为本社土质差、水源少，产量很难赶上别社；搞水利嘛，能搞多少就算多少，想全部解决问题就没有可能。总的来说，是用老眼光看问题，强调困难，决心不大，不愿艰苦奋斗。

当时濠头乡党委在帮助大鳌溪社进行思想发动的过程中，确实有简单粗糙的做法，动辄用大批判、大辩论的气势压人。但是在组织深入到老农、妇女、青年、积极分子中进行各种方式的宣传发动工作，确实做到家喻户晓。又通过诉旱情苦，排旱田队进行思想教育，并多次组织外出参观。这个社的副社长黄桂全曾到新会农场参观，全社 40 多名积极分子曾到下陂头山塘参观，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事例。这次参观活动打开了该社干部和群众的眼界，也启发了他们找到了解决旱患的钥匙。

只有一个村就搞这么多的山塘、平塘水利工程，这无论在人力、资金、技术、经验方面都是非常缺乏的。但该社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没有测量员、技术员和工程师，他们把略有点筑山塘经验的社员集中起来；同时派出干部到三乡的龙潭水库、坦洲的青年水库去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回来，然后再具体研究本社水利工作。没有石碇，（编者注：石碇，一种石料或铁制的夯具。使用时，一人领导并掌握方向，若干人拉绳，反复地提起和降落，将松散材料夯实。）更没有打碇工，群众便用木头制造木碇；曾经到过逸仙水库工作的社员便成为培养打碇队的师傅，共培养了 8 个打碇队共 42 人。人力不足，便把假期回乡的中学生组成一支青年队；动员小学生活动课帮助打石仔，非农业户也被动员投身这水利建设高潮。大鳌溪社最后按规划完成各项水利工程，使 207 亩禾田不受旱，192 亩具有 60 天抗旱能力，713 亩具有 50 天抗旱能力，40 天抗旱能力的有 100 亩。这样，望天田不再望天，山洪也不再施威，不但消灭了水旱灾害，

而且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扩大冬种面积 100 亩，旱地变水田的 150 亩，开荒种杂粮的 150 亩，山园可种果树的 80 亩，种竹 1 万棵，养鱼 1 万尾，促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选自李杰生：《群策群力，消灭“望天田”——1958 年大鳌溪社兴修水利情况》，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 49 辑，2000 年印行。）

东风镇的由来

□谢沛

中山市东风镇，原属中山县第七区，后按区公所办公所在地命名，改为中山县南头区。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之后，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为加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中山县委按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于1957年4月，撤区改建大乡，把南头区分为南头、东风两个大乡（区级）。划入东风大乡的有同安、安乐、民乐、伯公、小沥、和穗、和平、东濠等9个小乡（编者注：据中山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957年东风乡辖8个行政村：同安、民乐、伯公、小沥、和平、和穗、安乐、西罟步）。原南头区干部分成两半充任大乡干部，不足的由县增派。时任南头区区委书记的我，被分派到新建的东风乡任大乡党委书记，负责新大乡的组建工作。南头大乡，则由区长林藻任大乡书记。

由于当时各乡农民多是按田头、塘头就近在涌边搭茅寮居住，全乡没有一个集市，也基本上没有砖瓦房。新设的大乡办公地点，只能暂借用小沥小乡农村信用社。该社有两层砖瓦房，约30平方米，楼下放两张办公台，供文书写证明用。利用原信用社账房作女同志宿舍，男同志不论婚否，一律到木板楼上打地铺住。

大乡的名称和新办公地点是怎样定的呢？当时是由我主持召开各小乡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经过提议、协商、比较、讨论之后定下来的。因划入的9个小乡，原曾分别属于东海乡和凤鸣乡，故会议通过取名东风。这次会议还决定办公地点选址在通往小榄镇的沙口渡头，因当时各小乡的乡民，买卖东西都到小榄镇，这样选址会方便群众。代表会定下来后，经报县批准后才确定。县下拨的新大乡开办费共8000元人民币。我们在渡头以北100多米处，征用伯公四社的土地，建造约300平方米的两层楼

砖瓦房，楼下办公兼女同志宿舍，楼上设小会议室和宿舍，基本达到每两位一间。接着，大乡所属供销社、银行营业所、财税所等部门，也先后在渡头路两边建址。至此，大乡才初具规模。

1958年，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乡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又由人民公社改为今天的东凤镇。

东凤镇建制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届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各方面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面貌发生了巨变，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已初现规模。可喜！可贺！

（选自《中山党史》2006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游走东风

□东风宣传办

125

东风镇是中山的北大门，因其离城区较远，在许多人心目中印象模糊。其实，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变化，这个偏远的小镇已成为一个小家电产业基地，而近年还兴起了生态游。

明末清初，现东风地区始有人在大坳、罟步、中沙及伯公沙（大坳沙之子沙）筑成多个小围群居。新中国成立后，东风地域主要曾分属东海乡、凤仪乡、凤鸣乡 3 块。其后又与旁边的南头经历了多次划分或并入。1957 年 2 月，东风从南头区分出，取此 3 个乡的名字合定“东风乡”。1974 年 1 月，东风正式从南头公社分出，结束与其他辖区分合的历史，自成东风公社。

东风镇是中山近年新发展的自然生态旅游区，目前绿地面积达到了 178 公顷，绿地率 42.92%，公共绿地总面积 69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 27.69 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生态之镇。

莺歌咀水文公园定位为“东风的生态之门”。该公园以水文文化和水文科普教育为主题，位于东风镇西北部容桂水道与小榄水道的交汇处，总用地面积约合 465 亩，以滨水休闲环境为衬托，具有人文旅游和自然旅游双重特征。

东风的美食有着浓厚的岭南水乡特色，即使是最简单的普通农家食材，也会精心加工。如东风粥，看似一锅简单的粥，也要精工细料，轻煲慢熬，直至鲜浓酥融、色泽鲜亮才算成功。东风粥料品繁多，有猪杂粥、鸡杂粥、牛肉粥、鱼生粥等，绵滑鲜香，值得细品慢咽。紫来饭店、猪肉公店是典型的东风特色粥。

无鸡不成宴，对于鸡的做法东风最出名的莫过于“栋企鸡”了。和泰吊企鸡亦是“栋企鸡”开源地，号称东风第一特色美食。选用 2 公斤左右的走地三黄骊鸡，专利的炉具制作，上台时烧鸡以

钢管插着如同站立，粤语称的“栋企”。

西胥龙眼曾获得 1992 年全国首届农业博览会的铜质奖。东凤镇西胥步村注册了“西胥石硤”和“胥步石硤”两个商标。同是石硤种，西胥的特爽。这里的龙眼皮薄、核特小、肉多，爽口、汁多、香甜。把龙眼壳剥开后，将果肉放在纸巾上，纸巾一点不湿；不像其他地方的龙眼那样，汁会渗到纸巾上。西胥步村的龙眼树，有一些已经是百年老树，其余也有七八十年，其中有果子摘的剩下 3000 多棵。这里的果树，都不忧销路。一到成熟时，就会有人来与村民谈价格，按树的收成斤数付钱，或者一口价包下来。

村委会还打算开发龙眼叶茶。当地人在割禾前，都会用龙眼叶煮茶，带去田间喝，有消暑、解渴的作用。有些人就将龙眼叶摘下来晾干，放上几年时间，使味道变得更香醇。在此过程中，有些虫蛀，留下了虫屎，结果泡出来的茶，味道更好。村民称这是“龙珠茶”。每 50 公斤的茶叶，大约只能产生 150 克这种茶，经过高温消毒后，可泡出香味更浓的茶。

东凤镇是小家电产业基地，有美的、万和、美斯特等企业为代表的小家电知名品牌。有些厂家设有展厅，可以让市民直接进厂购买。如美斯特公司，致力于养生电器 12 年，先后推出五谷养生、水养生、炖品养生、果蔬养生、饮品养生系列产品。先后获得了发明专利 1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 50 余项，外观专利 40 余项，在发明《衡定性弱碱机》《豆浆机不糊管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传导于健康养身事业。公司发明的馒头机填补国内空白，发明破壁饮品机产品改变了豆浆机粗加工方式，走向智能化饮品养生电器新时代。

（题目为编者所加。整理自《骑行莺歌咀绿道 观赏和穗园景色》，《中山商报》2014 年 12 月 24 日。）

圣狮启示录

□刘廷玉

圣狮这个地名，20世纪60年代在广东闻名遐迩。这个位于中山市沙溪镇腹地的管理区那时是片热土。它在1964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树为全省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圣狮，日日车水马龙，全县、全省都来取经，确实辉煌。

然而在随后的“四清”运动中，圣狮被当作发展资本主义的典型清理。历史无情地捉弄了圣狮。当初探索的发展生产力、集体富裕的道路也被迫中断。

如今再临这块当年的热土，看今昔之变，令人感慨万千，它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昔日辉煌

1964年2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发出《关于全省农村学习圣狮大队的通知》，2月27日《南方日报》以近3版的篇幅发表了中共佛山地委工作组、南方日报记者的文章《圣狮——全省农村革命化的一面旗帜》。

文章指出：“中山县沙溪公社圣狮大队，几年来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雄厚的集体经济，崭新的生产面貌，和革命化的农民的鲜明形象，成为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的光辉榜样。

“圣狮虽然地处珠江三角洲，但原来并不富饶。土地改革前，这里是‘彭门二老（恶霸地主）啖人肉，无柴无米长年忧’的地方，不少人背井离乡，远走他方。1955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平均三户社员占不到一条牛腿，全部家当折合起来，平均每个劳动力只有26元。

“现在的圣狮，这个拥有3005名农业人口，4638亩耕地的大队，由于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不断增加公共积累，自力更生，奋

发图强，几年来已经建设起一副大家当。总值 176 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有 1783 元。包括三机、九站、五场、十厂、一队、百车、百艇、大仓库、一晒场；还有一艘载重 300 吨的机帆船，一艘电船，22 艘 3 吨以上的大木船，以及一批供集体福利事业的建筑物。三机是 3 台拖拉机；九站是 9 座装机容量 400 千瓦的电动排灌站；五场是猪、牛、鸡、鸭、鹅场；十厂是砖厂、灰厂、碾米厂、造船厂、农业机械厂、编竹厂、木厂、铁农具厂、榨油厂、酿酒厂；一队是一个建筑队；百车是百辆胶轮手推车。”

文章指出：“由于 8 年的农田基本建设，由于拥有较多现代化设备，由于队办工业的支持，农业生产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使人们看出农业现代化的苗头。”文章还用一组数字说明这个问题：1963 年，粮食产量全大队平均每亩 1122 斤，比 1956 年将近翻了一番，完成国家任务后，平均每人占粮 1000 多斤；全大队（含生产队）总收入 112 万元，其中农业占 56.5%，工业和林牧副渔业占 43.5%；每个劳动力从集体分配的工资平均每月 68 元多，户均收入 1000 多元；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繁荣。

圣狮自此成为全省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全省掀起了“学圣狮，赶圣狮”活动的高潮。

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令人感慨。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有一条成为共识，那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那些发展速度较快的乡镇、管理区都是得益于较好地处理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小康镇、小康村的。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圣狮在这个问题上已迈出富有成效的一步：农业为基础，队办工业（今天我们称为乡镇企业）支持，林牧副渔一起上。这正是圣狮能够在 1956 年至 1964 年 8 年时间里创造出奇迹的根本原因。当时广东省委树立圣狮这面旗帜，坚持了生产力标准，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如果历史不曾因“左”的错误割断，圣狮的发展也许是另一个天地了。

然而在成为旗帜仅仅 7 个月左右的时间，由于中山成为广东省 8 个“四清”重点县之一，圣狮首当其冲成为“四清”运动的牺牲品，运动一开始，全大队 108 名干部全部被关了起来，集体

致富的带头人，党支部书记陈华和另两名干部更是被迫害至死。所有的工厂、养殖场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从而断了致富之路。“四清”运动在圣狮虽然只有一年，但对圣狮的打击却是致命的。一年之间正面旗帜变成反面典型，这个强烈的反差，使圣狮人一下子懵了。政治运动给圣狮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圣狮人的信心与热情被这场运动无情地打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割断了圣狮人致富的梦。时至今日，提起往事，圣狮人还是心有余悸。“左”的路线政治运动害人不浅啊！

今日新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广东“四小虎”。沙溪镇在中山市是发展较快的镇区之一。处于沙溪腹地的圣狮情况又如何呢？

圣狮已不再拥有 20 世纪 60 年代的辉煌，按经济实力在沙溪镇仅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交通不发达。管理区内道路太窄，在路通才财通的今天，这显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观上由于政治运动搞散了人心，年轻人不愿意当干部，许多人外出谋生，对管理区的事情不甚关心，管理区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管理区现有党员 86 人，其中“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有 79 人，“文化大革命”后入党的仅有 7 人。党支部平均年龄 53 岁。这个队伍过于老化，开拓精神不足，朝气活力不够是必然的。

市委组织部、镇党委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一再到管理区开展工作，引导管理区干部从大局出发，从圣狮未来的发展出发，以“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为标准酝酿选拔人才，充实领导班子。圣狮的干部群众有着优良的传统，他们坚信党的领导。1996 年初管理区党支部进行了换届，产生了年富力强的支书，增加了新鲜血液。在镇委镇府的关怀支持下，圣狮人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重新站了起来，走上致富道路。尽管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够快，但毕竟是迈出了有力的一步。1994年管理区社会总产值达4408.55万元，人均收入5200元，户均收入2.08万元，管理区集体收入103万元；1995年社会总产值达5230.99万元，人均收入5500元，户均收入2.21万元，管理区集体收入121万元，管理区已经建起40多家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这些工企业上缴的利润成为管理区收入的主要来源；管理区重视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多种经营，完善农业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发展“三高”农业，提高农业效益。目前管理区农田保护面积3789亩，实插面积1840亩，亩产达到1124斤；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1994年第三产业产值892.87万元，1995年达到1457.30万元，增幅达63%。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管理区不断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管理区的集体收入主要用于办教育，修道路，强化治安及村政建设。如今投资160多万元的圣狮小学已完成一期工程；投资54万元的外来工大楼将于今年建成；投资7万元的圣狮标准卫生街也将于今年完工；在创建卫生村其他方面的投资，卫生工作一项投资20多万元，投资20万元建立治安巡逻队，以保一方平安；另外还投资建设自来水、街灯、下水管、街心花园、灯光球场、停车场等公共设施，便民利民。1995年圣狮获沙溪镇农村工作先进单位二等奖，在民政、妇联、侨务、治保及文明村建设5个方面获先进单位称号。如今在圣狮，家家有电视机，电话普及率达60%以上，平均两户一部摩托车，私人轿车也有10多部。圣狮人正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步步向致富之路迈进！

镇委、镇政府对圣狮大力支持，镇的“九五”计划（草案）把加强圣狮道路、桥梁建设作为一个重点列入议事日程。圣狮人又重新鼓起了当年的那股劲，他们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1996年他们计划社会总产值提高20%，集体收入提高18%。以这样的速度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圣狮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还将创造出辉煌。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56年至1964年8年的时间里，圣狮人在党的领导下，将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组织起来，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走集体富裕的道路，创造了奇迹，成为全省的一面旗帜，这是圣狮人的骄傲。他们发展队办工业，以工业支持农业，“出现农业现代化的苗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简单的道理，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圣狮人20世纪60年代已迈出有力的步子，积累了良好的经验，的确值得自豪。如果这个经验当时能够为决策者接受，在全国推广，必将大大缩短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历程，提高综合国力。然而历史无情，不能假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采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是得力的，使社会生产力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较快的发展。当时能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能够战胜1960年的自然灾害，顶住苏联讨债压力，靠的就是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经济基础。然而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左”倾思想。“四清”运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错误地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圣狮的情况正是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反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事求是地把现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把经济建设摆在全党工作中心的位置上。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大的玩笑，而这个玩笑，使我们失去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圣狮人对这句话也许体会最深，感慨最多。“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充分利用制度上的优越性，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小康、现代化，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一百年不是一个时间限额，它是一个强调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长期成为政策与人们行为的指南。圣狮今昔的社会变迁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一点。

（选自《广东党史》1997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浅谈 50 多年前圣狮集体经济的发展

□邱霖巧

圣狮的土地，高旱而贫瘠，就连 1959 年夏天，那场历年来最大的洪峰，也没能淹没它。圣狮的家底很薄，是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的生产大队。然而，这样的圣狮，却以不同以往的面貌出现在文学评论家冯牧的笔下。在 1964 年 3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冯牧这么写道：“从石岐到圣狮不过十来公里，公路四周，到处都是河网。圣狮村在一座小山边，是个大村子（虽然还比不上邻近的龙头环那么大）。一走进圣狮的大门，便可以感受到一种集体主义的蓬勃气息。20 亩大的打谷场上，正轰响着拖拉机。这里是一片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人们正在各处忙碌着”。

从冯牧的描述中，圣狮摇身一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也看不到过去“一穷二白”的身影。这不禁让人好奇，在这短短的数年间，圣狮究竟发生了什么？

圣狮的集体家当有一个逐渐积累起来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透过圣狮大队党总支部书记陈华的笔触，回顾一下圣狮的发展史。在陈华看来，圣狮大队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经历了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圣狮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后。1954 年，成立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是“三户不够一条牛腿”的“锄头奴”社。但凭借“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初级社的 29 户人家不惧春头旱、夏季雨等自然灾害的威胁，硬是在当年的生产上，获得了平均亩产 510 斤的丰收。当年，初级社积累了 500 只母鸭，买了 3 头耕牛和 3 套农具，积累了 300 元资金。

第二阶段以圣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起点。1956 年春，圣狮响应中央的号召，将 7 个初级社合并为 1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克服了退社等一系列困难后，高级社同样获得了丰收。

这时的圣狮，更加注意积累和开展农业基本建设。20.3 亩的大禾场和大大小小的水利建设，就是此时建成的。1957 年冬，圣狮的公共积累增加到 51201 元，占总收入的 16.5%。

第三阶段从 1958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工作失误，圣狮大队粮食减产之余，还吃了过头粮。1959 年春，缺粮的情况比 1956 年更加严重，不少人主张把大队几年来积累下来的牲畜、三鸟等煮了吃掉，或把能卖的东西卖出去，以解燃眉之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圣狮大队注意做好群众工作，提出党员要“劳动带头，吃苦带头，关心群众生活带头”，安抚群众，使群众看到胜利的曙光。“皇天不负有心人”，1959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第四阶段自 1960 年始。在进入生产发展时期后，圣狮大队着眼于纠正存在于社员中的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思想，如忘本、不劳而获等。为此，圣狮专门举办了村史展览，组织青年人访贫问苦，组织老年人讲述解放前所经受的苦难等活动，希望社员能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建设。

从陈华的总结中，我们不难发现，圣狮集体经济的发展，一靠团结社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二靠积累资本，发展多种经营。1964 年，中共佛山地委在号召全省学习圣狮经验的文件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文件指出，圣狮在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经济内部的力量，克勤克俭，苦干实干，改变了生产面貌。

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圣狮大队依靠群众解决了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原材料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

原材料资金不足，他们就开展全民性献材投资运动。通过解释说明，社员们认识到农业的半机械化、机械化符合自己的利益，纷纷把自己多余的木材和废铁捐献给大队，解决了制造车船和其他半机械化工具的原材料问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圣狮大队制造出 2 艘电船、2 艘机帆船和载重 20 万斤的大小船只、50 辆鸡公车、16 辆胶轮车和其他半机械化的工具，有力地加速了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实现。

技术人才缺乏，党员干部便亲身上阵。或拜师学艺，虚心请

教别人，或互相传授技术，共同提高。以大队前支书陈华为例，他学会驾驶拖拉机后，随即教会了5名大队干部，使更多人掌握了这门技术，并应用到生产实践中。除了大队干部，技术人才更多来自农民。到1960年5月，大队共培养了47名农民技术人才。就这样，圣狮大队逐渐形成一支技术人才队伍，成为保障生产的坚强后盾。

为了摆脱生产困境、节省开支，圣狮大队靠自己大脑和双手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难题。圣狮的水泵就是用富有创意的土法做起来的。1959年，出于满足社员要求兴办水利，消灭人力车水的迫切需求，圣狮大队准备购入水泵。然而，以1台水泵4000元计，全队安装7台水泵将要花费近3万元。由于无力支付这笔费用，圣狮大队决定自力更生，用土办法、穷办法满足社员的需要。于是，总支书陈华亲自主持设计，组织木工铁匠参与制作。经过5个月的实验，用砖块、水泥、破铁制成的土水泵出现在众人面前。更令人惊奇的是，每台泵只需700元的材料费。到1960年年底，已经有8个抽水站用这样的土方法制成。次年改建电动排灌站时，同样采取自己动手的办法。捣水泥杵，架高压线，用自产的砖瓦灰石建厂房，9个电动排灌站从群众的手中诞生。原本造价22万元的9个站，最终只花费4.5万元即建成，且质量完全达标。

圣狮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还离不开严格而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把劳动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到生产队的“四固定”政策，奖罚分明的“三包一奖”制度，社员的评工记分制度，财务管理和物资保管制度，农田生产、保养和使用工具设备、工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等各项责任制，均是圣狮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圣狮大队制订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征询群众的意见，确保制度能行得通；二是干部带头执行，保证制度能管得严。

正因为有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圣狮才能将3000多人口，包括农业、工业、畜牧业、建筑业、渔业、林业在内的庞大的集体家当，管理地井井有条。圣狮大队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表明，完善的制度保障能够使生产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某种程度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圣狮，预演了未来中山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山乡镇经济的腾飞，以及创造的市属企业“广东四小虎”之一的辉煌，还有走在广东前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外表现“包产到劳”，我们似乎都能从中看到圣狮的影子。

可惜，20 世纪 60 年代的风云变幻太过迅速。1964 年年底，在风风火火的“四清”运动中，圣狮由红转黑，不再成为全省争相学习的榜样。此后数十年，圣狮的集体经济更是每况愈下，群众似乎也失去了干劲。昔日耀眼的明珠，就这样被遗落在历史的尘埃里。

值得庆幸的是，今日的圣狮已走出阴影，正昂首奔向新的明天。我想，一睹明珠光彩的日子，大概就在不远处。

（整理自邱霖巧：《遗落的明珠——50 多年前圣狮集体经济的发展之路》，《中山党史》2014 年第 1 期。）

中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冯永 方宁

中山市是珠江三角洲南部最大的残丘平原，土壤肥沃，人口众多，为历史上的农业大县。过去由于担负国家征购粮食任务繁重、历史条件滞后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山农村改革是由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起步的。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37

一、试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中山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1979年初以板芙公社为试点开始的。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实行人民公社过分集中统一的经营体制，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板芙虽是以生产水稻为主的粮产区，但在“左”的影响下，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按照劳动天数计算工分报酬，从7段13分到民主评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形成“生产队耕种，劳动按钟数”的局面，且家庭副业也受到限制，户养鸡鸭超过3只，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开工一条虫，收工一条龙”。生产责任制的不落实，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全社134个生产队中，70%以上的队粮食亩产不到500公斤，农村人均分配不足100元，甚至出现了深湾的不少农户要掺杂粮度日，仔冲年人平均收入只有68元，超支户逐年增多等现象。当时，板芙群众中流行一顺口溜：“东风（今六围村）不起劲，长征（今广福村）不迈步，红旗（今仔冲村）不招展，金钟敲不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始起步。邓小平曾指出：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为改变农业生产“出勤打哩捞”的“吃大锅饭”现状，寻找出一种适合本地实际，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管理形式，板芙公社党委深入农户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到四联大队顷二、围二等生产队于1974年和1976年，曾先后在甘蔗、水稻生产试行田间管理联系产量到人、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均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增收。板芙公社党委认为这种联产责任制既不违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又能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还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于是，从1979年春耕开始，在四联、板芙、东风、红卫、孖冲、金钟、里溪7个大队中选出19个生产较为落后、群众又乐意包产的生产队，大胆试行田间管理联产到劳责任制（即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经营体制为：在集体实行五统一（即统一生产计划、统一支配土地和大农具、统一安排劳动力、统一处理产品、统一分配收益）的前提下，把适合个人操作的工种由劳动力承包，联系产量进行奖罚，实行“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奖励）。经过1年的实践，19个生产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9年，19个生产队的平均亩产达424公斤，比上年增产55.5公斤，人均分配达125元，比上年增加40元。其中有15个生产队当年早造就获得大丰收，这些队的联产面积占全社水稻总面积的14%，而稻谷增产数却占全社增产数的25%。因此，当年晚造，全社推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增到84个，占全社生产队总数的64%。

二、全面推进联产到劳责任制

在当时的条件下，田间管理联产到劳责任制既有利于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调动社员个人的积极性，又使集体经济逐渐壮大，社员收入不断增加，因而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中山县委于1979年9月，总结了板芙公社联产到劳责任制的经验，认为这既可以较好地解决了合作化以来劳动力管理和分配上的难题，又能调动起各家各户的积极性，促进生产迅速发展。于是，在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先进代表会议等场合上积极推广板芙经验，并介绍

和表扬了中山农村第一个依靠劳动致富的万元户——小榄埗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农民黄新文一家3口,出色完成生产承包任务,并通过养猪、种蘑菇等多种劳动,年总收入1万多元,纯收入6000多元。这个先进典型,给全县农民以很大的鼓励。1980年早造,全县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有485个生产队,占全县稻田生产队总数的15.2%,使中山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跑在全省的前列。

然而,改革之路是不平坦的。当年,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某些上级领导认为中山县是在“走回头路”,对板芙的做法一不赞许,二不总结,三不推介,还千方百计地去“堵”“压”“纠”,中山一度承受着“不准包产到户”的巨大压力。尽管在干部中看法不一,但联产到劳责任制的迅速推行,充分显示出广大农民对改革的要求。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使中山的干部群众放下了思想包袱,理直气壮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12月和1981年4月28日,《南方日报》先后刊登了《板芙公社推行田管联产到劳责任制》《板芙公社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两篇专题报导,并就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全省推广板芙的经验,从而在省内各地掀起了派员到板芙取经的热潮。1981年年底,中山县搞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已发展至2855个生产队,占全县稻田生产队总数的80.5%,其中联产到劳的968个生产队,占27.3%;包产到户的870个生产队,占24.5%。

三、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和完善的。1982年,中山县农村各生产队的联产承包形式已由田间管理实行五统一(犁耙田、秧地、品种安排、水利设施、排灌管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逐步转变为包干到户,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进一步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中山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55万吨。至1983年8月,全县推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

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96.9%。

198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中山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国家政策规定，把承包土地期由短期（1—3 年）改为长期（15 年以上），以稳定和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鼓励农民增加投入，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山农村的劳动力发生了新的变化：一部分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工、商、旅游、运输、建筑等行业，一些土地开始弃耕丢荒和一部分专业种养户感到原分包土地太少，制约了扩大生产。因此，1988 年，在全市农村进行了调整分包土地，完善承包合同和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改革。通过改革，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使用率，促进了商品生产的扩大发展。出现了各种专业户，如种植、养殖和加工副业等专业户，并涌现出一批全国、全省闻名的先进人物：如张家边区（今中山火炬开发区）西樵村种田能手朱灿标，于 198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沙朗镇隆平村农民吴炳全、梁炳洪分别在 1990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和 1989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授予全国售粮模范称号。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三级所有”体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中山于 1983 年 11 月撤销人民公社，设置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随着农村改革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延长土地承包期后，加强和改进农村经营管理，完善承包制，成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1992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把承包合同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三高”农业的兴起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也由于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及镇村企业的崛起，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又出现了

一些新变化。新一轮的土地承包中，中山出现了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重新集中后，再由部分农民投标承包。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有效促进了中山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选自《中山党史》1999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我的致富经

□黄新文

142

我是小榄公社埗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队员，全家八口人，3个劳动力。最近几年每年劳动收入五六千元，去年高达10504元，其中集体分配3127元（包括肥料工分收入在内），另外，家庭副业收入7377元，扣除成本4504元，纯收入2873元，全家纯收入共6000元，平均每劳年收入2000元，每人750元。我们一家不仅劳动收入多，而且对国家作出了较大贡献。除了同全队社员一起创造的茧、鱼、粮、猪等大量的农副产品交售国家外，家庭副业产品大多数也卖给国家。到春节前止，我家出售肥猪21头，肉重3649斤，平均每人提供社会产品456斤，交售三鸟16只，完成了国家派购的任务，还把蘑菇500多斤全部卖给国家。由于劳动收入多，带来了生活水平大提高，全家丰衣足食，居住宽敞，几年来先后建起了3间砖屋，共110多平方米，平均每人每月吃肉5斤多，还有积存几千元，准备购置一部电视机。我们全家劳动收入超万元是怎样得来的？有什么“生财之道”？主要有几条：

一、热爱集体，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全家3个劳动力个个都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队。我是泥水匠，在大队建筑队劳动，去年得7550工分，是建筑队36名社员中的前三名。妻子冯好娟，在生产队出勤，去年劳动工分7222分，在全队103名从事农业的妇女社员中名列第三。妹黄钻娣，在大队砖厂打砖，得5995工分。这个数字在全厂40名打砖工中名列第六。加上几个孩子农忙期间的帮助劳动，全家共得21258工分，共收入1701元，平均每劳567元。

二、充分利用工余时间，大力发展家庭副业。我们一家男女老幼都是闲不住的人，全家3个劳动力积极完成集体生产任务后，充分利用劳动空隙时间搞家庭副业。年老退休的母亲和正在上学

的几个孩子也积极帮助家庭喂猪、养三鸟和经营自留地。我自己每天劳动长达十三四个小时，天未亮就起床，中午不休息，晚上常常干到深夜，除了出集体勤外，不是搞饲料，喂猪，就是精心经营自留地，或者是施蘑菇肥，淋蘑菇水，采摘蘑菇，真正做到脑勤、手勤、脚勤，忙个不停。去年全家养猪44头，到春节前上市21头计算，就收入5264元。猪多肥多、去年向集体投肥93950斤，得17820工分，收入1426元。饲养三鸟110只，收入280元；育蘑菇340平方尺，春节前已收入519元。另外，自留地和屋前屋后空地种植的柑桔、龙眼、荔枝、木瓜以及其他作物收入350元，加上年度存栏生猪、仔猪估收963元，合计家庭副业收入7377元，扣除养猪成本后纯收入为2873元。

三、认真学习，讲究核算，收入增多。我今年40岁，虽然读书不多，但碰到不懂的东西就认真学、动脑筋，努力学科学、学技术，精打细算。我干集体建筑工，由于能虚心向别人学习，钻研技术，现在建筑队中既能设计又能施工，既会建房又会建炉灶。我在搞家庭副业中，想方设法搞收入。早在前几年就学习科学养猪，搞分级轮养，根据生猪的生长规律，合理搭配饲料喂养，使生猪养得多，长膘快，仅仅在10.5平方米的猪栏里，全年就饲养了40多头猪。为了使自己养猪能得到较多的物质利益，除了备足了大量的饲料，我们还抓紧春节、清明、墓闭、端午、中秋等节日前二三个月育肥猪。通过猛攻精饲料和科学管养，结果，猪只普遍月长膘四五十斤，既保证了及时上市，又增加了收入。由于我在养猪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年初我出席了佛山地区畜牧生产先代会，被评为先进社员，获得了奖金。另外，去年秋收前后，我为了增加收入，腾出了两房一厅的住房进行培育蘑菇。但由于当时集体生产很忙，培育蘑菇季节迫近，又没有备足料。在此情况下，我抓紧11月20日大风下雨时放假的空隙，划着小艇到郊区公社后山大队买了4000多斤牛屎，保证了蘑菇的及时培育，适时上市，而且产量高，收入多。

（题目为编者所加。整理自1979年2月中山县三级干部暨农业先进单位（个人）代表大会黄新文的发言材料。）

孙中山故居那些年的名人轶事

□李伯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全国上下呈现一片祥和景象。外资进入内地沿海设厂，如雨后春笋，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孙中山故居也就建起宽敞明亮的接待室，接待人员经过培训，素质也相应提高了，而各方领导人来视察参观，也较前公开了，接待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

原来他就是波尔布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新的接待室已建好，迎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身穿浅黄色斜纹中山装，背着双手，满脸严肃步入接待室。陪同前来的人员介绍说是柬埔寨客人。我向客人介绍了孙中山生平 and 故居概况，又播放了孙中山讲话的录音磁带，翻译人员按讲话的中文简洁地向他传译，他不住地点头，并说：“不错，不错！”

待客人走后，经外事人员告知，我才知道他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名叫波尔布特。

叶帅心目中的孙中山故居

1982 年 8 月，我们接到通知，叶剑英元帅即将到故居参观。他来的前一天，有一位穿大校军服的军官来和我们作接待准备，我们愉快又细致地做卫生检查准备工作。大家都想一睹这位老师的风采。当时我虽是副馆长，但由于我对孙中山的资料较熟悉，分工我做接待。

第二天，一列车队驶至故居，其中有一辆中巴，开门后先卸下一张轮椅，接着叶帅由其家人扶下车，坐上轮椅。叶帅是由王震、吴南生等陪同前来的。见到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叶帅脸色红润，

精神奕奕，我们心中都很激动。过去只在电视新闻及报纸上见过他，现在见到真人，又距离这么近。

我详细介绍了在孙中山故居楼下的孙中山每一件遗物，叶帅和随行的人员都用心地听。在介绍到故居楼上书房时，我从孙中山在这里进行医人、医国活动讲起，一直讲到与陆皓东商谈反清起义活动等，叶帅听了不断点头。

参观完故居，众人在故居庭院照相留念。叶帅弃轮椅站立着和我们合影留念。第一批有叶帅及其弟、王震、吴南生、李耀祺、李斌、方馆长和我；第二批是其家人；第三批是警卫人员。站立久了，老人十分疲劳，照相毕，叶帅坐回轮椅时，面部神经松弛，嘴巴张开。其孙女连声说：“爷爷闭口。”叶帅又恢复正常，轻松谈话了。他指着故居问：“这座故居是原样的吗？有没有遭到破坏？”我回答：“孙中山设计建成的故居，式样至今不变，可颜色曾有改变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曾遭清兵查封，其管家的人员烧毁了书籍信件；日本侵华期间，怕飞机轰炸，曾将墙粉刷成绿色，现又恢复原状。”他点点头说：“这样才好！”

在陈列馆参观，叶帅见到永丰舰的照片时，引起了他的一段回忆。他指着照片说：“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到了该舰和叛军作战，我是孙中山的保卫营长，也住在此舰。”说着又指着永丰舰的后半部说：“孙中山住在此室，我住在他旁边的室的窗口。”又对我说：“胡应球（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在该舰当二副。孙先生在军舰上住了几十天，后见斗争环境不利，就离开舰队去上海了。”事隔数十年，叶帅的记忆还是很清晰的。可能此事在他的一生中不是一件小事吧。

廖公的最后一次光临

1983年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及夫人经普椿由中山县人大主任李斌陪同前来故居参观，同来的还有杨尚昆及夫人等。廖公身穿一套黄褐色中山装，当进入中山故居庭院时，廖公对我说：“你用广东话给我解说好吗？”我迟疑一下，说：“杨老听不懂广东话怎么办？”杨老接上说：“我已来过一次

了，你同廖公讲吧。”杨老的随和，使我心里乐滋滋的。

我先向廖公介绍了孙中山亲手种植的酸子树。廖公随手摘几块酸子叶尝了尝，对夫人说：“呵，有点酸味”。说完，又走到水井边。我向廖公讲述这里原是一间小屋，孙中山就在此诞生。现在这座故居是孙中山亲自设计的。故居落成后拆去小屋一角，开井以作生活汲水。廖公说：“饮水思源，饮水思源。”故居门口两边的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是孙中山手书的。旁边有宋庆龄题写的“孙中山故居”木牌。廖公站着欣赏了一会，说：“两个人的字迹有点相同”。当来到孙中山当年进行革命活动的书房时，我又介绍了孙中山虽然当过两任大总统，两任大元帅，但他家里没有什么遗产。廖公赞道：“他的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在这里是一个体现。”

在参观陈列馆中，廖公看到了那幅1916年孙中山夫妇、廖仲恺夫妇和胡汉民等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欢庆制度取消一笑会”上的合影照片，指着其中一男孩说：“这个是我啦！我们都很熟络的，1921年孙先生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居住观音山。我当时在广州读书，离家路远，中午这餐饭就和孙中山夫妇一齐同台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当时吃饭很清淡，没有大鱼大肉。哈哈！一晃又几十年了”。他显得很兴奋。

我们预先准备好文房四宝，请廖公等人题字。廖公说：“我的字很差，不用写了吧！”他夫人说：“你都最后一次来了，还不写下几个字（用广东话说）。”我很高兴廖夫人的帮忙，但又预感到有点不妙，就说：“廖公这次来后，明年有机会再来视察我们的新成就。”他点头笑笑，捋起右手衣袖，用笔汲饱墨汁，挥上“三多黄花几十载，民主革命第一人”。廖公是广东惠阳县人，他解释说：“三多在我们家乡附近，当时孙先生委派郑士良于1900年在三洲田起义，在三多祝打了胜仗。这是兴中会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没有爆发就流产了。而这次战斗打响，震撼朝廷，结果因弹尽援绝而失败了。后来这支部队发展至2万多人。由1900年三多祝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之役，领导起义推翻清朝民主革命，应数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在座听了都鼓掌。

他的字苍劲有力。四尺宣四句话已写满，正要落款签名，廖夫人走过来说：“这么多，还不够？”我说：“请经大姐也题字留念。”她摆摆手说：“我不会，不要请我。”笑着快步走了。接着我请杨尚昆同志题字。他说：“我签名留念就行了。”他在留念册上签名，廖公也签上名字。

就在廖公别后月余，噩耗传来，他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墨宝已成遗墨。

杨尚昆关心翠亨建设

1984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与王震等来广东省视察时，到孙中山故居参观。签名留念后，杨老对我说：“陈列馆我都看过了，我去饮杯茶吧！”我当即安排了其他同事接替我讲解，就陪杨老去接待室。杨老说：“你们的建设又有点新变化了，绿化不错。”说话间我们已登上2楼。饮茶时，杨老指着茶叶说：“你们的茶很香滑呀！”我介绍这种花茶，是自种自采的米碎兰花，洗净晒干，用锅炒香，放在茶叶里，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我送了一点米兰花给他带回去泡茶用。他很高兴地说：“近日香港商人郭得胜先生来中山县，捐赠一座孙中山纪念堂，你县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纪念堂建在哪里合适。我认为最好建在翠亨村，和中山故居及中山纪念中学连成一片，有馆、有堂、有校，设施增多，游人就会增多。这里会逐步兴旺。但有些人认为开大会不方便，利用率低，建在县城人流会多些。这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他对翠亨建设很关心，令我感动。

邓大姐题字后道：“写斜了！”

1984年12月14日，我接待了周恩来总理夫人、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她亲切的言行举止令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事有凑巧，正好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县籍日语专业的学生在此实习。他们认为接触日本游客可以加强口语，晚上还可以辅导我馆接待部人员学习日语。当他们知道邓大姐将至，就要求作为我们接待工作人员一起去接待。我们申明纪律后同意他们参加。

邓大姐在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等陪同下来到中山故居。她细心地看遗迹听介绍，然后走到故居庭院，见到满院都是接待人员和游客。我代表中山故居纪念馆送上一张孙中山手迹复制品“百年长乐”赠给她留念。她很高兴，问我在这里工作了多久。我说：“有30年了。”她点点头说：“很好。”她在酸子树下桌子上的留言册上留了言，签了名和日期。搁笔时忽然说：“哎呀！写斜了，写斜了！”原来是写名字时有点偏斜了。我们相视一笑。邓大姐转过身来对故居工作人员及来实习的大学生说：“你们来这里工作是很光荣的，很有意义呀！因为中国出了一个孙中山先生，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干。”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受到很大的鼓励，有的激动地回答说：“我会好好干下去的”。

邓大姐步出故居庭院时，一群从港澳来旅游的青年向她问好。大姐亲切地问他们：“你们从前来过这里没有？”有人答：“我是初次来。”有的答：“来过几次了。”邓大姐点头说：“你们要多来这里呀！要多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精神！”因为她年纪大了，就上车去故居接待厅，聆听孙中山的讲话录音。还未进入接待厅，她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在这里一口气干了30年，很好，要努力建设好这个地方，接待好这里的游客呀！”她的勉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表示会把工作做好的。当她听完孙中山讲话录音时说：“孙先生具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充满爱国主义热情。我早年在天津见到他和夫人，他对我们学界很大的鼓励，我至今还记得。翠亨村这个地方是很好啊！”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1期、第2—3期。文章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改。）

延伸阅读

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故居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坐东向西，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40平方米。

孙中山故居的主楼是1892年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从檀香山汇款回来，由孙中山亲自设计及主持建成的。它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三开间两层楼房，正门有“一椽得所，五桂安居”的对联，据说是孙中山亲笔所写。与翠亨村中其他民居相比，它具有中西合璧、坐东朝西、门多窗多回环联通的特色。孙中山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期间，经常回乡居住、读书和行医，在此撰写《上李鸿章书》，并与陆皓东共商救国方略。1912年5月，卸任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乡省亲，在此小住3天。主楼前面庭院右侧是孙中山祖居遗址，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山县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文化事业，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注重恢复和发展各项文化设施，保护文化遗产。中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派员接管孙中山故居，对翠亨村周围的环境和遗址进行保护性维修。1956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该纪念馆是以孙中山故居为主体的纪念性博物馆，198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理自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官网 <http://www.sunyat-sen.org/sunyat/10030101.php>）

霍英东与中山温泉宾馆

□李斌

中山温泉宾馆是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与中山县合作新建经营的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首家引进外资的合作旅游宾馆。

1978年，霍英东得知国家决定在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建设旅游区，吸引海内外游客观光旅游时，认为将会有大批海外游客前来旅游，中山需要有一个适宜的食、宿之地，否则，就难以吸引和留住客人，并认为这是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到中山县考察。1979年，霍英东与何贤一起来到中山考察。看到三乡雍陌村背后的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是疗养、度假胜地，就决定在此建一间高级酒店。

当时，大陆还没有中外合作建旅游酒店的先例。许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经济建设，坚定了霍英东到中山投资建设旅游酒店的决心。霍英东的创举，也得到中央、广东省不少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港澳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对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霍英东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作组建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霍英东作为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都亲力亲为。合约是在省城南湖宾馆签署的。出席签约的有霍英东、何贤等，我作为中山县长，代表中山县签约。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正式破土动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人心涣散，物资缺乏，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温泉宾馆的建设工程面临着重重困难，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只好向海外订购。当时，我组织了建筑、

园林、贸易等9个小组到工地施工。但我们很多技术都不行，并且长期以来的“大锅饭”的体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养成了内地工人出勤不出力的惰性。霍英东就把香港先进的管理方法搬过来，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还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另一方面，霍英东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两三天就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并且亲自审看工程日报，催促尽快施工。霍英东希望通过抓紧施工，刺激内地人的思想，让人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对改变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很有意义的。

经过艰苦努力，只用13个月的时间，中山温泉宾馆就建成了。新落成的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包括10栋别墅。霍英东说：“我想不到能够办起来，还能办得这么好。”

1980年12月28日，中山温泉宾馆举行开幕典礼。霍英东出面邀请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和港澳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嘉宾出席仪式。霍英东在开幕典礼上，面对800多名内外高层宾客大声疾呼，说如此规模、如此壮观的中山温泉，仅用13个月就能建成开幕，香港做不到，它简直是亚洲水平。不！应该是世界水平！谁再说中国人办事不行，请你看看中山温泉就知道到底行不行？谁对中国改革开放怀疑不相信？你不信，我信……他这番话是在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讲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海内外华侨中影响巨大！

开幕那天，虽然市面上物资很紧缺，我还是特意组织了石岐乳鸽、三乡濠粉、黄圃腊肉、小榄鱼球等八九个具有中山地方特色的菜肴招待四方宾客。霍英东很满意，表扬我说：“菜准备得很好啊！”

中山温泉宾馆的建成，对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山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宾馆建设过程中，

霍英东对我说，你要走出国门看看。那时候我们没有外汇，温泉宾馆开业有了外汇后，霍英东就带着我们到日本、新加坡、美国、泰国等参观考察，这时才发现原来人家已经建设得那么好。而当时中山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澳门记者曾对我说，你们的卫生要搞好一点，车站的厕所都长霉了。强烈的对比使我们更加坚定要解放思想、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的决心和信心。

中山温泉宾馆建成后，有澳门记者访问我们中山以后如何发展。我说要坚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变农民出勤不出力的状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粮食问题。当时中山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也遇到不少阻力和质疑。但中山县坚持推行包产到户，县的领导分头包村，我就去了张家边沙边村搞包产到户。事实上，实行包产到户，上半年开始包，下半年就增产了，粮食、蔬菜、肉类都有了。

中山的交通也是在温泉宾馆建成以后开始改善的。以前从广州到中山，要过五渡海（编者注：江河，中山人俗称较宽阔的江河为海），十分不便；就连石岐城区的人民大桥、岐江大桥也很差。温泉宾馆建成了，人家要来旅游怎么办，难道走路吗？后来我去澳门看到，澳门的过氹仔桥，由个人出资承建，建成后有5年的收租权，5年就收回成本了。于是，我们也用这种办法集资建桥，结果桥建好后不到3年，就收回了成本。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山旅游，我们又建设了国际酒店、华侨宾馆、翠亨宾馆、长江宾馆等，中山的旅游设施逐步发展完善起来。

在建设温泉宾馆之前，中山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反左、反右各种运动不断，非常混乱。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被当作资本家，回到大陆就要被剪裤脚、袖子，所以都不敢回来。中山温泉宾馆建成后，我在一个大会上说，那些华侨过去很穷，漂洋过海去国外打工，赚到钱回来有什么不好？我明确宣布欢迎华侨回来，有什么问题我负责。这样一来，许多华侨都慢慢回来了，并开始在家乡投资、捐资搞建设。如港商杨志云捐献1000万元（编者注：港元）修建人民医院杨颖滨大楼。之前人民医院很穷，我生病住院，房间漏水。有人来看我说，你住的房间怎么漏水？可见条件之差。

港商郭得胜见杨志云捐资建设人民医院，就对杨志云说你回去家乡办好事，我也想做。郭得胜问我搞什么项目好，我考虑到中山没有大的会堂，开大会或大型演出都没有地方。于是建议他建造一座孙中山纪念堂。于是郭得胜就捐了1000万元（编者注：港元）在石岐建造了孙中山纪念堂。苏计成、苏继滔等商人也纷纷回来捐资建设，他们很多都成为了中山荣誉市民。

中山温泉宾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旅游宾馆，是改革开放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中山温泉宾馆，看到这么漂亮的宾馆，也不禁说：“改革开放好啊，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不简单”。如今，中山温泉宾馆的建成已近30年了。30年来，中山沐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正在创建“三个适宜”和谐中山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

（选自《中山党史》2009年第1期）

延伸阅读

霍英东谈中山温泉宾馆

□霍英东

154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发展旅游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一项措施。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后第一天,《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本人是第一批响应返回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兴建宾馆的,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勘测中山温泉宾馆兴建工作;同时参与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

我和何贤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在1980年开业,当时买很多东西都要用票的,而我们宾馆要用的许多东西要从市面上买,一买东西价格就长了一倍、两倍,人家也开始骂了,骂得很厉害,投资者成为众矢之的。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还未实施,物价涨怎么办,老百姓很有意见。你光搞一个宾馆有什么用?把东西吃光吃贵,把电用光,天天有几千人吃饭怎么办?后来我们从美国运鸡腿来。广州交易会会有几千人吃饭,东西都要由中央调拨,但是我们开业以后,物价虽然涨上去了,但马上也感到东西多了。中山县最著名的乳鸽在大跃进年代年产3万只,市场价格调整之后,1986年已经年产30万只了,现在一个场年产几百万只,你要多少都有了。顺德县一个工厂养鸡销往日本,年产是几百万只。我们不应期望用高消费刺激生产,价格适度调整是必要的,过去我们30年物价不动,农民收入很低,一年人均收入100元人民币,一年辛勤的劳动加上投资成本,生活依然如旧,“谷贱伤农”这种政策是否会影响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得不偿失的耕耘,没有良性循环的生产,是会窒息工农业的发展的。

旅游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城乡各行各业,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物价的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例如:1980年底中山

温泉开幕后，中山生产急剧变化，乳鸽生产从原来年产 1.5 万对增至去年年产 45 万对；副食品供应充裕，很多以前需配给的生活必需品已逐渐放宽；个体户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国营、集体企业的有力的补充。企业经营方式不断改良，树立起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概念；贸工农体制逐渐形成；人的积极性得以更大发挥，大量年轻人就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精神面貌改变；人们的经营管理、科技知识和服务水平都有所提高。年轻的管理班子逐渐形成。总而言之，改革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对绝大多数人是受惠的，即使少数人受影响，但对整个社会经济是促进的、有益的。

1980 年我搞中山温泉时投资是非常少的，但是有一条很重要，我这个宾馆当时只有 5 个星期时间就要开业，但东西还在美国，有几万种东西，而当时国内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要兄弟单位支援才卖给你，包括水杯和毛巾。只有筷子不用进口，别的都要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要开业，在当时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办得到，但最后中山温泉还是如期开业了。这说明中国人会办事，问题是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山温泉宾馆从设计施工到投入服务，经营管理，全部由国内部门承担，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旅馆虽然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从它的规模、布局风格及建设速度等方面均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好评，而且这个宾馆是由中山县自己经营管理的，它的员工从总经理到服务员都是在宾馆建造时才开始学习的，但它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已进入国内的先进行列，相信经过学习、改进和提高，是能够达到国际水平的。由此可见，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亦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关键要继续改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克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福利，鼓舞爱国主义精神，调动群众积极性，注重增产节约。

（整理自霍英东：《改革开放二十年我的参与》一书收录的三篇文章：《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在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典礼上的学术演讲》《在内地投资的经历和体会——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广东团讨论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投资内地的几点感想》。）

后记

156

中山市不仅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也是全国党史资源大市。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这片热土上我们党都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为了资政育人，传承党史，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数年如一日，不断编撰内部期刊《中山党史》，不知不觉间已达 50 余期。翻开期刊，发现有许多革命老前辈以及党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跳动的文字生动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读来让人倍感亲切。这可是研究中山党史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只是不集中，分别载于各期期刊中，无论是寻阅还是研究都不太方便。

为此，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门把这些珍贵史料，从《中山党史》期刊中摘出，按照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汇编成册。新中国成立前的，荟萃成《革命无悔：战斗在中山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的，荟萃成《岁月留声：激情年代的中山奋斗故事》。所摘出的每篇故事，除个别文字有修改之外，基本保持原貌，而且每篇文章都标注了作者以及《中山党史》所刊载的具体期数，以便查阅和引用。此外，为了加深读者对某一中山党史事件的印象，在相关文章后面还附有“延伸阅读”，而这个“延伸阅读”就不一定局限于《中山党史》，来源比较广泛，如中山政协文史资料、《红广角》等。

感谢各位老前辈的亲历回忆，为党史传承提供了生动的党史素材。感谢相关党史爱好者以及工作人员，你们的研究和努力，为读者提供了陶冶情操的精神食粮。

编者

2016 年 12 月

岁月留声

激情年代的
中山奋斗故事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098-3968-3



9 787509 839683 >

定价：25.00元